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崁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杨伟民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黄奇帆
辜胜阻	韩永文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编辑部副主任 李蕊

• 本刊专论 •

智库要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曾培炎 (005)

发挥城市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和辐射作用 韩永文 (008)

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陈文玲 (013)

• 国际经济 •

经济复苏动能减弱 未来运行更趋艰难

——2018 年世界经济回顾及 2019 年展望 国家统计局释经组 (033)

全球服务业市场开放国际规则演变历程与趋势 杨玉英 任安娱 (044)

中国提出加入 CPTPP 的可行性与实施策略分析 刘向东 李浩东 (057)

关于中美基础设施合作的调研与建议 颜少君 (070)

迪拜健康城发展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杜振华 (081)

• 宏观经济 •

“双轨合一”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杜金富 张红地 (090)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 产业发展 •

中国大豆产业发展：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建议 肖卫东 杜志雄（105）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9）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6）



CONTENTS

Think-tanks should provide strong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Zeng Peiyan* (005)

Giving play to the leading and radiating rol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n Yongwen* (008)

The world economy is at the historical crossroad *Chen Wenling* (013)

The momentum of economic recovery weakens and the future operation
becomes more difficult
——World Economic Review in 2018 and Prospect in 2019
Interpretation Group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033)

Evolution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opening global service market
Yang Yuying and Ren Anyu (044)

Analysis on the feasibility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China’ s proposal
to join the CPTPP *Liu Xiangdong and Li Haodong* (057)

Investigation and suggestions on Sino-US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Yan Shaojun* (070)

Enlightenment of Dubai Healthy City Development on China’ 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u Zhenhua* (082)

“Two-track integr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reform in China *Du Jinfu and Zhang Hongdi* (090)

Development of China’ s soybean industry: Main problems, reasons and suggestions
Xiao Weidong and Du Zhixiong (105)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9)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6)

智库要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曾培炎

摘要：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带一路”致力于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径，以促进全球经济有序健康持续发展。未来需要“一带一路”各参与方共同关注进一步凝聚共商共建共享的共识、不断提升政策信息的透明度、完善规划标准协议等规则、坚持工程项目建设可持续性、重视数字技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应用等五个方面。全球智库则要发挥登高望远、脚踏实地、去伪存真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智库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曾培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各参与方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跨越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明，共同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各国智库从不同方面研究、宣介，做了很多建设性工作，架起了促进各方扩大沟通、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的桥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遭遇挫折，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世界经济复苏步伐放缓。地缘冲突、消除贫困、气候变化等挑战层出，各国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严峻。

^{*} 本文摘自作者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分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带一路”致力于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径，以促进全球经济有序健康持续发展。

从近六年的实践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形成了一批有益做法和经验，让沿线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也为经济全球化赋予了新的理念和内涵。传统全球化特征是国际资本与产业的跨境流动，使少数利益集团获得大量财富；而“一带一路”则是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辐射效应，全面带动要素流动和文化交融，激发各经济体的内生动力，消除地区隔阂，实现包容发展、利益共享和共同繁荣。

习近平主席指出，经过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五年，共建“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未来“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聚焦高质量发展，需要各参与方共同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凝聚共商共建共享的共识。“一带一路”是一项由沿线国家共同参与的经济合作倡议。“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大家事大家来办”，倡导通过对话、协商、沟通凝聚共建理念，倡导通过发展战略、规划对接形成建设合力，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国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义利并举、义在利先，坚持商业原则与社会责任并重，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

第二，不断提升政策信息的透明度。“一带一路”是大家共同参与的开放平台，各方需要了解有关情况，努力做到信息对称。出台相关政策，要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共享信息数据，促进供需双方顺利对接；公开项目招投标程序，对各国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在阳光下运作实施，杜绝腐败。

第三，完善规划标准协议等规则。无规矩不成方圆，需要有大家认可的游戏规则。“一带一路”建设遵守现行的国际规则体系，不是另起炉灶。在现有基础上，可以根据实践情况不断完善革新，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程度，在发展规划可行性、技术环保标准、贸易投资协议等方面形成一套更适用实际需要的规则，使未来共建“一带一路”更加顺畅并有所遵循。

第四，坚持工程项目建设的可持续性。“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相关工程项目必须重视可持续性，兼顾效益、质量与生态环保。项目建设要考虑投资收益和回报，工程质量也应经得起时间和自然灾害的考验。实施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遵守国际标准和项目所在国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

第五，重视数字技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应用。以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互联

网和数据处理技术为引领的产业革命正风起云涌。“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此为契机，借助电子商务、智慧物流、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搭建丝路网络化平台，上载项目建设、商贸、投融资、招投标等各种信息，便于各国企业成为“一带一路”参与主体，促进跨国贸易投资升级和产业融合，充分发挥各种资源设施效益，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带一路”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需要全球智库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是登高望远，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在全球化体系下共同发展的新探索。智库应该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为未来的实践提供指导；从全局分析发展状况，合作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建设信息数据库，打造世界了解“一带一路”的窗口；分析成功案例、出台投资指南，规避风险；智库还可以通过搭建平台、举办论坛、研讨会等多种方式，促进人员沟通 and 交流往来。

二是脚踏实地，为政府和企业务实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很多共识和合作协议，未来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落实。一些国家和企业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但对于具体政策和国别环境缺乏了解。智库可以发挥资政建言作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政府间合作提供可操作的实施方案；可以为企业提供投资环境评价、投融资方案设计、法律咨询等服务，更好地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三是去伪存真，为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氛围。智库在理念传播、政策解读、民意通达方面具有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应当站在为全人类谋福祉的高度，全面客观地介绍“一带一路”发展状况，澄清误解或不实报道，消弭认知差距。“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智库应将在有关国家了解到的具体项目情况和实践成效更多地分享给公众，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

责任编辑：李 蕊

发挥城市群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 引领和辐射作用

韩永文

摘要：城市群的发展以及城市群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城市群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趋势，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群的崛起与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大城市群发展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要制定和落实好城市群产业发展的引导规划；积极跟进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形成有效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引导和促进中心城市在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动与辐射作用。

关键词：城市群 经济 高质量发展 辐射作用

作者简介：韩永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经济发展是各类市场主体通过要素资源配置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需求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并形成有效的投入产出效益。经济活动中的资源配置，最终将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形成产业配置，进行市场生产、经营活动；二是形成资源的地域空间配置，产生要素配置流动，商品服务交换与流通。两种形式中，资源的地域空间配置是基础性的。任何项目建设、产业布局与企业落地、要素流动与交易活动都必然植根于地域空间。我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主要是由两个轮子支撑的，即产业发展规划和

区域发展规划，而产业发展规划及其产业发展布局，以及为产业发展服务的各类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公共服务活动，都将具体落实到区域发展规划、空间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之中。换言之，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涵盖着产业发展规划和生产力布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更具有综合性和宏观性。城市群的发展以及城市群发展规划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

一、城市群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历和经验，不难看出，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城市群特别是大城市群在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及其辐射功能。

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由于拥有良好的教育、科研资源，良好的现代化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体系，巨大的市场空间、就业空间和社会发展空间，以及相对于一般地区拥有更加优裕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消费水平与服务环境等等。因而具有吸引优秀的科研教育资源、资本要素、人力资源要素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向大城市集聚的比较优势。经济学上曾有过论述：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一般情况下总是由中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集聚，重要的科研机构 and 科研人员、工程技术研发人员也总是先向大城市流动和配置；而技术成果则是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流动，并引领资金、资本、技工人才和技术人员流向中小城市，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从而引致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高端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融产学研于一体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纷纷布局于大城市，技术成果应用及产业化，以及与之相契合的相关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则由大中城市向中小城市流动的规律。这种现象应该说，既是经济发展与创新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城市群发展的一般规律。

城市群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现代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趋势，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群的崛起与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引擎作用就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有效地吸引、集聚优秀的高等教育资源、高科技研发要素、高质量的资本要素、高素质的各类人才；高效调动和发挥各类要素资源优化组合的效用，产出技术创新，实现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发散经济活力，拓展市场边界，形成合理的产业布局在地域上的合理分工配套，延伸产业链条，形成区域性辐射；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资源流动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在成本比较和市场逐利的作用下，导流知识溢出和技术成

果应用外延扩散。

二、城市群是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中国的经济决策层早就认识到，城市群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城市群发展的战略思维也越来越清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提出了建设 19 个城市群，包括 5 个国家级城市群，8 个区域性城市群，6 个地方性城市群。这 19 个城市群，其国土面积占全国的 22.1%，人口占全国的 54%，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 75% 以上。2014 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8 年 11 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意见》明确，“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城市群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2018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大城市群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追求高速度增长和数量扩张，转向推进高质量发展和讲求经济增长质量、效益的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总量稳步扩张、结构不断优化、效益有效提升，创新动力不断增强，发展可持续和发展结果合理共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宏观、中观或微观层面，都必须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真正实现创新成为内生动力，协调动态均衡成为内生机制，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高质量的城市群发展无疑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的区域空间载体。它既是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和动力之源。

三、深入推进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推动我国城市群特别是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使之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长久、持续稳定的动力源，应该按照 2018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2019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所要求的，“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制定和落实好城市群产业发展的引导规划

经济特别是产业发展是城市群发展的关键，也是城市群持久发展的基础支撑。产业集聚和就业空间、现代化城市社会服务功能，又是实现城市群人口有效集聚的关键因素。没有产业和产业发展，没有高素质、较大数量人口集聚的城市群，是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生命力的。城市群的发展必须有产业发展作支撑，而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又必须形成内在和外在的经济联系，以及各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因此，政府在组织制定规划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理清、理顺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区域城市、节点城市之间的关系，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合作、产业链布局，进而形成科学合理、协同落实的发展规划。为此，需要中央有关部门或者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依据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批准的区域发展规划和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组织编制详细规划，制定有利于推进规划实施的法规政策。在制定和细化城市群发展规划时，要高度重视分析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的资源禀赋和资源比较优势，推进产业分工细密化和多元化，细致规划上下游产业链和城市群内部合理布局，打破传统的城市群内部各自相对独立的产业分工体系。注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运用规划、法规和政策引导市场主体依据资源比较优势联手大学、科研机构进行技术研发，形成产学研融合创新和市场开发，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成为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利益联系为纽带，探索实行国民收入、税收、利润收益分享的机制，协同布局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配套延长产业链条，构筑多元化和合理分布的产业结构体系。要在协商、合作、共享经济利益机制的推动下，超前谋划布局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本区域具有优势的新兴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创新创业，为经济的长期稳步发展创造源动力。

（二）积极跟进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形成有效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

一是建立由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牵头协调城市群发展规划落地的协调机制。通过有效有力的协调机制，推动城市群及城市群内部走内涵式发展路子，戒除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升、盲目扩大城市群范围、忽视城市群内部联系的现象；协调推进落实产业布局和产业分工，经济科学地布局产业链条，形成产业分工互补、有效合理竞争，打破协同无序、经济联系松散、产业结构同质化和产业布局散乱的困局；协调推动落实城市群间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对接与互通规划，协调推进建设与管理必要的中央政府投资引导与支持；建立协调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的信息共享平台和信息通报机制，定期分析研究、

统筹推进城市基础设施衔接、产业结构差异互补、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边界性生态环境保护等建设。二是深化经济体制和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有效和高效的合作机制，打破阻滞要素流动的门户封锁，突破区域协同发展的行政边界制约，推动资本、技术、人才、劳动力按照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布局有效流动，实现按市场需求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形成城市群内部有序合作，多元化、互补式良性竞争，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格局。

（三）引导和促进中心城市在城市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动与辐射作用

城市群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不同城市，因资源分布不同，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但有着密切的内在经济联系，以及人民群众因生存、发展与社会交流交往需要，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形成的城市组合和集聚，是各类资源要素按照一定规律在城市群内部流动、配置以及外溢的网络化城市体系。资源配置的高效性和要素流动的充分性是城市群发展活力所在。中心城市具有天然的资源汇聚优势，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内敛发展优势。经济活动中的成本收益比较规律，总是引导市场主体理性地将布局于中心城市的要素资源向相对成本低、收益率更高的周边城市流动。但是，现行以行政区划为主体的区划格局，以及以行政区划为发展边界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得不少中心城市不自觉地推行内敛式发展，不愿意甚至尽可能地阻滞资源要素外流。在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中，中心城市的自身发展固然十分重要（因为它毕竟是城市群发展中最关键的增长点）。但是，中心城市更重要的作用应该是对周边城市发展的带动辐射作用。为此，必须坚持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注重在推进发挥中心城市对城市群乃至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上下功夫。要通过市场的力量，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用好用政府主导制定的发展规划来约束、引领中心城市提升开放水平，推进包容发展、增强外延发展活力。要引导提升中心城市的教育发展水平和科研开发的能力，不断扩大其在经济、教育、科技开发方面的外延辐射能力。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和有效的政策激励，建立起有效推动中心城市知识外溢、技术外溢、资本外溢和人才外溢的市场机制，畅通知识外溢、技术流动、资本扩散的渠道，使中心城市真正成为辐射带动城市群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世界经济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陈文玲

摘要：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影响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因。世界经济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到了与全球同频共振的时代，国际贸易格局、国际制造业格局、全球能源格局、全球金融体系和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看，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发生了根本变化，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最大变量是中国，中国将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稳定之锚”的地位。

关键词：世界经济 全球经济格局 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规划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习近平主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刚刚走过了改革开放 40 年的历程，即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70 周年，蓦然回首，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谓沧海桑田亦是如此。从 20 世纪后半期到 21 世纪初，由于中国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使世界格局特别是经济格局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基础性变化，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最大变量是中国。近年来，由于一些国家施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霸凌主义、分裂主义和军国主义，引发了处于稳定、和平、持续发展的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极大风险，而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各国到了与全球同频共振的时代，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调整和演化。认识这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认识这个充满希望的时

代，站在人类道德道义的制高点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我们在当前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选择正确方略的基点。

一、深刻认识当今世界存在的十大矛盾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有延续既往的，也有不断增加的，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影响世界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因。

（一）贫富矛盾

世界经济发展最不公平的问题是贫富之间的矛盾，既表现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矛盾，也表现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贫富差距从来没有如此严重。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有的国家是西方发达国家，用经济霸权、经济武器一轮又一轮地剪发展中国家的“羊毛”；有的国家是利用天赐资源，可以轻易地收获财富；有的国家则是靠正确的战略选择、道路选择，靠人民的智慧和努力付出获得快速发展。总体来看，富国越来越富，穷国越来越穷。加入联合国的 197 个经济体中，排在前 10 位的经济体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80%；排在前 11 位到 20 位的经济体的 GDP 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10%；剩下的 170 个国家产生的 GDP 共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10%。全球排在前 20 位的经济体，其 GDP 总量占了全球经济总量的 90%，世界经济的增量和财富量越来越向发达国家和后来快速发展的国家集中。据瑞士信贷研究部门发布 2017 年财富报告，全球财富已经达到 280 万亿美元，比 10 年前增长了 27%，其中 50% 来自美国。富人与穷人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英国《卫报》2018 年 4 月 7 日报道，到 2030 年，世界最富有 1% 的人，将掌握 2/3 的财富；2008 年以来世界最富有 1% 的人的财富，以每年 6% 的增速增长，预计到 2030 年持有的财富将从目前的 140 万亿美元增长到 305 万亿美元，占世界财富的 64%。应该指出，贫富矛盾是当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民粹主义的重要根源。

（二）南北矛盾

南北矛盾即大多数地处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和大多数地处北半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般把发达国家称为北，发展中国家称为南，因此，南北关系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二战之前，南方国家大部分是北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北方国家奴役、殖民和剥削。二战以后，发达国家 GDP 曾占全球 70% 左右，主导建立三大国际机构的是发达国家，形成的国际机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代表和维护的是发达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发言权。近几十年以来，南北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持续快速发展，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到目

前为止,GDP 总量占到全球 60%,而发达国家则下降到 40%。世界上出现了“金砖五国”“灵猫 11 国”和“E11 国”等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会晤机制”“上合组织”等机制或组织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推动原来的南北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的时点上,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发展上的话语权、主导权、规则制定权的竞争与博弈非常激烈。

(三) 新旧矛盾

新旧矛盾主要指新旧动能转换中产生的矛盾和纠结。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云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导致了新经济、新动能的产生,旧的经济形态、旧的产业业态和旧的发展动能正在被新经济、新动能、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所替代。一方面,国家之间和地区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产生了包容发展、共享发展和共同发展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旧的管理思维习惯、旧的管理方式、旧的管理流程与新经济、新业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1996 年,中国开始引进沃尔玛、家乐福等零售企业,至今,中国市场引进了几乎所有国外的商业业态,中国新的商业业态迅速发展。2017 年年底,中国移动支付率就达到了 77.2%,2018 年已超过 80%,中国老百姓和大部分商家是全球使用现金最少的群体。中国在 37 个城市进行国家跨境电商试点,2017 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 29.16 万亿元,2018 年将突破 37 万亿元。美国互联网革命走在全球前列,著名的摩尔定律正在失效,更快的更新速度早已超过了摩尔定律,芯片已经从 60 多纳米,降到 28 纳米、12 纳米、7 纳米,美国高通、英特尔开始研究生产 5 纳米芯片。原创性技术和最高端的产品大部分在美国,中国拥有商业应用技术最广泛基础和最大市场,全球进入独角兽企业前十名的有 6 个是美国企业,4 个是中国企业。当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的时候,美国特朗普政府打击的正是这种新业态,加大对亚马逊征税,加大包裹邮寄的资费,尽管国际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已经形成,但仍旧使用 1809 年的原产地原则、1930 年的关税法、1974 年的贸易法来制定全球贸易政策。中国在新旧动能转换中,一些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方式、管理流程和管理思维固化,在一定情况下,起到的不是推动而是阻滞作用。

(四) 收支矛盾

全球性的收支矛盾,即高债务和财政支出能力之间的矛盾愈益突出。据国际金融协

会统计，目前全球债务已经高达 247 万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根据该机构 2018 年 10 月份公布的数据，美国的主权债务达到 21.8 万亿美元，政府主权债务占 GDP 的 106%；日本债务规模占 GDP 的 260%。欧洲债务规模平均占 GDP 的 95%，其中一些国家债务率更高，如希腊达到 179%，意大利达到 138%，英国达到 89%。中国政府债务规模总体可控，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债务，占 GDP 的 37%，家庭债务也在可控范围内，但企业债务在 250%~260%之间，总杠杆率 249%。总体看，全球性财政支出拮据。美国要保持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财政支出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大，且每年债务增加 1 万多亿美元，预计到特朗普总统第一任卸任时债务将达到 25 万亿美元；如果特朗普连任，卸任时将达到 30 万亿美元。欧洲特别是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正在减少老百姓的福利，但遭到了强烈抵制并不断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在一些贫困国家，财政支出能力更加不足。

（五）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矛盾

当今世界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博弈空前激烈。二战之后，美国等国家主导建立了世界银行、IMF 和 WTO，构建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总体上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发展多边关系，使全球保持了几十年和平发展的环境。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加快发展，美国认为原有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不能保障自己的权益和利益最大化，于是走向它的反面，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做法，基本上都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美国国内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作为处理全球问题的依据和规则，凌驾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凌驾于全球规则之上。美国原来是经济全球化及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的旗手，现在变成了破坏全球秩序和规则的搅局者。世界经济受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最大风险源，恰恰来自原国际秩序及规则的构建者、主导者和建设者。美国在全球处理贸易关系时，正从在多边框架下解决问题，转向一对一地进行双边谈判、极限施压、各个突破。原来的美加墨自由贸易区（NAFTA）瓦解，美国先跟墨西哥进行双边谈判，然后与加拿大进行双边谈判，达成新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区。同韩国一对一重新谈判美韩自贸区，与中国一对一地进行多轮贸易谈判，未来和欧盟、日本、印度等主要贸易对象都将采取双边的方式。通过这种单边主义的做法使美国利益最大化，以求在此基础上重构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全球性制度安排。

（六）开放和封闭的矛盾

世界上开放和封闭之间的矛盾比过去更加显性化。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走的是坚持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道路。自 1978 年最早在广东承接第一单加工贸易起，实行从试点开始、从东南沿海开始、从三来一补的国际贸易开始的渐进式开放，到 2001 年 12 月 21 日

中国正式加入 WTO，开始了制度性、高标准的与世界市场和规则全面接轨的开放。中国非常好地履行了对 WTO 的承诺，废除了 20 多万部地方法律法规，废除了 2000 多部国家和相关法律法规。2006 年 12 月 21 日，中国加入 WTO 五年期满的时候，关税总水平从 15.3% 降到了 9.8%，目前降到了 7.5%。到 2006 年，中国的开放领域就达到 102 个。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绝不会关上，并在 2018 年 4 月博鳌论坛上提出从四方面推进开放的重大部署；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宣布了金融领域 11 项开放措施；国务院发布 22 个领域的开放措施。而有些国家，原来是开放的经济体，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现在却正在走封闭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道路。修墙是物理上的隔离，高关税是在关税上铸就的“高墙”，限制或禁止高技术产品出口是人为地切断全球产业链。这些做法是按照传统的、工业化时代的、世界没有深度联系的经济形态和封闭的思维来处理当代问题。开放代表着前进，代表着动力，代表着未来，代表着光明，代表着发展；而封闭代表着后退，代表着落后，代表着守旧，代表着将走向孤立。

（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的矛盾，引发的全球性问题甚为严重。世界当代经济由两种基本经济形态构成，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但是两者必须是匹配的，实体经济是产生虚拟经济的基础，而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产生的增量或者变量。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也不存在应该有谁、不应该有谁的问题，两者必须有但不能失衡。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球性经济“脱实向虚”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国家过度服务化和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一些后发国家正在效仿并将其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一些国家过度金融化和衍生化，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新的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又在加快堆积；一些国家房地产过度投机化和脱离价值及使用价值，形成“吸金”狂魔，这种经济循环绑架了政府政策。当虚拟经济超过实体经济而过度膨胀的时候，虚拟经济的大厦就会坍塌。现在虚拟资本市场上流动的货币是实体经济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即资本经过商业资本，然后到生产资本，再到增值的资本这样从资本到资本的过程，货币必须充当其中的媒介，才能完成实体经济的运行过程。而现在的货币特别是虚拟货币和金融衍生品，不再需要经过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和生产过程，金融市场的主体成为从货币到货币的直接交易。最极端的是在一些国家盛行比特币，即虚拟数字货币，与实物和作为媒介的货币已经没有任何联系。比特币炒得最高的时候，1 比特币相当 20000 美元，一些炒家用区块

链技术做比特币，把这个虚拟的大厦建设得非常宏伟，有人赚了钱退出来了，没赚钱的人如果继续呆在里边，肯定将被这无形的、坍塌的大厦永远地淹没。

（八）老龄化和社会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

这个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2000 年全球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0 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 10%，65 岁老人占 7% 以上，之后老龄化速度加快，目前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已有 100 多个。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1950 年即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 1970 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美日欧目前是“深度老龄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比例高达 27%；其次是意大利 23%，德国 21%，法国 20%，英国 19%，加拿大 17%，澳大利亚 16%，美国 15%，俄罗斯 14%，中国 11%。中国未富先老，正在并将经历人口快速老龄化、急速老龄化、深度老龄化和重度老龄化阶段，到 21 世纪中叶，老年人口将从 2017 年的 2.4 亿人增加到 4.9 亿人，人口老龄化水平将高达 49%。众多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急速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福利能力不足的矛盾非常剧烈，北欧国家原来从摇篮到坟墓全流程社会福利制度遭到严重挑战，成为导致欧债危机的重要动因，老龄化排在全球前十位的国家，几乎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近期，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对人口年龄划分标准作了调整，1~17 岁为未成年人，18~65 岁为青年人，66~79 岁为中年人，80~99 岁为老年人，100 岁以上为长寿老人，人们的预期生命周期大大延长，社会福利的支付周期也将随之大大延长，全球性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凸显。

（九）大国竞争与博弈越来越激烈

世界主要大国都不甘心居人之下，每个国家都在做强国梦，都走在强国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肯在大国之间绝对地选边站。为了别国利益牺牲本国利益，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二战以后，先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抗衡与冷战，1982 年里根任美国总统之后，冷战的一方前苏联解体，世界经济形成了“一超多极”，一个超级大国是美国，多极为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印度、东盟 10 国等国家和地区。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强人时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梦想是两个第一、一个伟大，即美国第一，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届总统中排在第一的领导者，让美国再次伟大；俄罗斯普京总统任职之初，发出“给我 20 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豪言壮语，目前他已任三届总统，第四届任期结束正好是 20 年；印度莫迪总理在自己家乡学习中国改革开放，被称为印度的邓小平，当选总理后的目标是把印度建成一个强国，直接目标是超过中国，印度是近 10 年经济增速和军事武器购买额增速最快的国家；安倍晋三实行“俯瞰地球”外交，极力将日

本由战败国恢复为正常国家，特朗普候任美国总统时，安倍赶去游说其不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美国毅然退出后，日本扛起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大旗；英国脱欧、德国与法国推动建立欧洲军队等，世界主要大国都在寻求复兴之路或强国之路。在激烈的竞争博弈中，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核心关切，不断地进行基于利益的排列组合，这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和变动的重要动因。现在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关系，中日、中印关系走向改善，中欧关系、中非关系、中阿关系日益紧密。大国关系调整结束了全球发展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独善其身时代，也结束了传统盟友的捆绑关系，世界更加多元、多极、多样和多边，大国之间更像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在新的国际竞争与发展格局中，世界经济发展的回旋空间不是被压缩了，而是扩大了。

（十）多元文明和文化的冲突

当今世界，多元文明和文化既有融合但更多地表现为冲突。有不同文明之间的鸿沟和冲突，有不同宗教之间的鸿沟和冲突，有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鸿沟和冲突，有不同的文化习俗之间的鸿沟和冲突，也有代际之间的鸿沟和冲突。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中，没有一个文化可以替代另一种文化，但有的国家把其他国家的宗教、意识形态乃至文化习俗作为打击对象，引发了全球动荡和所在国的激烈反对。有的国家制定“长臂管辖”法律，对具有文化宗教纠纷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不允许其他国家与之做生意，否则“大刑伺候”，不惜动用国家力量针对其他国家的某个企业，封杀企业或者逮捕企业高管。有的国家在一些地区挑起宗教争端，引发地区局部战争，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凋敝，人民流离失所。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冷战后导致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是文明的冲突。世界存在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能否处理好多元文明与文化的相通性，是保持全球经济增长造福于世界人民的重要着眼点。在中国周边国家中，近 50% 是穆斯林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和中国没有宿怨？因为中国在多元文明中尊重了其发展生存的权益和文化价值观。哪一个国家没有加快经济发展和过富裕生活的要求？哪一个国家没有发展的梦想？而各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应该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之中。

二、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变化与调整

2019 年新年伊始，主要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预期。1 月 8 日，世界银行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 2019 年和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

值分别下调至 2.9% 和 2.8%；1 月 21 日，IMF 发布报告将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也分别下调至 3.5% 和 3.6%，4 月份，进一步调低至 3.3% 和 3.6%。世界经济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向何处去？是前进还是后退，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多边还是双边，是经济全球化还是极端保护主义，是构建命运共同体还是把一个国家的利益凌驾在全球利益和全球规则之上？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美国以及中美竞争博弈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经济未来的未来，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未来。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两种道路、两种命运的激烈博弈，世界正在上演一场非常曲折的、具有生动故事情节的大剧，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

（一）国际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贸易形态的改变，加之美国近两年对全球发动的贸易战，全球贸易规则、贸易机构乃至贸易体系均遭遇严峻挑战，国际贸易格局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要演化。

1. 国际贸易规则处于新一轮变革和重构期。当前，国际贸易规则改革从酝酿期到了爆发期。美国从 2017 年开始，一直宣称 WTO 和贸易规则对美国不公平，主张取消 WTO 规则中的差别对待原则。2019 年 1 月 15 日，美国向 WTO 提交了题为《一个无差别的世贸组织：自我认定的发展地位威胁体制相关性》的报告，要求取消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成员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权力，否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WTO 多边贸易体制和贸易规则正在受到挑战。与此同时，美国正在通过双边而非多边展开贸易谈判，从而重构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新的贸易规则。一些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如 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CPTP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贸易谈判，正在成为构建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的重要平台，更加注重议题的广泛性和规则的高标准。奥巴马在卸任美国总统前一年，在西点军校演讲时指出，美国至少还要领导世界 100 年，制定国际规则必须由美国人说了算，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制定国际规则时说了算。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更加霸道，威胁如果不能保障美国利益，就要退出 WTO，转而又发动一些国家企图把中国请出 WTO。美国主张的 WTO 规则改革，其核心是取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别化对待的规则，取消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力图把二战之后发达国家“剪羊毛”剪到的“战利品”的回馈部分再一次吞吃到自己的胃口里。WTO 改革到底向何方去，国际贸易秩序、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如何重构，这对国际贸易格局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2. 全球贸易品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间品贸易比重快速增加成为最重要的表

现。一战时期，甚至到二战时期，世界贸易中的货物贸易商品基本都是最终产品。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重构，基于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世界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量国际贸易标的物由中间产品构成。WTO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表明，全球中间产品贸易已经达到世界贸易总额的 2/3，东亚国家高达 4/5。传统贸易理论论述一个国家贸易的比较优势，是指这个国家内部资源产生贸易效能与其他国家比较的优劣，而在新的贸易结构中，则指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要素集成能力的比较，是一个国家搭载的平台吸收优质资源综合优势的比较。目前，某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还能找到全部要素是本国的吗？从各国出口的商品，有很多零部件、很多模块、很多产品，已经不是这个国家制造的，而是世界制造。笔者曾在苏州工业园区调研，该园区生产的一个计算机模块，已经过 13 次进出口了。这个产品从中国出口，但是其中有的零部件是在马来西亚生产的，有的是在越南生产的，有的是在菲律宾生产的，这就是全球产业链上中间产品的出口与进口。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美国第一批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的 500 亿美元，其中 70% 是中间品和投资品；之后对 2000 亿美元加征 10% 关税，其中 78% 是中间品和投资品。中间品贸易，实质上是全球产业链的跨国贸易，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征，切割产业链惩治基于制造业链接的贸易，必将遭到惩罚。

3. 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呼之欲出。E 国际贸易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产物，是当今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科技革命、业态变革等变量相互作用形成的贸易形态的演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贸易流动呈现出跨国界、多边化、多元化、多样化和网络化的链接状态，将全球范围内分离的生产过程和环节，将单一、分散的生产商、供应商、中间商和消费者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市场集成力量。包括生产商集成、供应商集成、中间商集成和消费者集成，由此产生巨大的贸易规模、贸易流量，并不断改变着贸易方向，产生了更加智能、便捷、快速和自由的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使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这是国际贸易方式颠覆式演化或变革。下一代贸易方式与下一代制造业业态，共同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制造业时空界限、地理界限日渐模糊，最终产品的生产和价值通常不再由一个国家独立完成。国际贸易一方面链接生产消费的跨国分离，另一方面又通过全球价值链和 E 国际贸易平台重新链接。以往的国际贸易方式有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小额边境贸易、采购贸易等，由单一企业或个体来组织，而未来的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会保留原有的贸易内容，但贸易方式则完全不同。全球跨境电商、数字贸易、贸易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迅速，正在加快催生下一代贸易方式——E 国际贸易。比如，形成跨国界的无障

碍流通体制、大通关体制和认证认可制度。中国已经在 37 个城市进行跨境电商试点，跨境电商正在向下一代贸易方式演化；美国的数字产品贸易迅速发展，形成了数字贸易先发优势；各国贸易方式发生着贸易数据化和数字化贸易之变。这种由参与贸易的个体和新群体形成的贸易流动，将打破传统的地理和行政疆界，使无形的网络链接、贸易的数字化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联系的推进器，推动国际贸易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推动形成对国际贸易治理机制如 WTO 的改造和提升，以推动下一代贸易方式朝着普惠、公平、自由、便利、共享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制造业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

制造业发展和格局演化直接影响世界经济，全球制造业生态系统和产业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五轮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加快，第四轮经济全球化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并驾齐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价值链正在深度调整。

1. 第五轮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加快进行。从全球范围的制造业布局来看，大体经历了四轮大规模转移。第一轮在 19 世纪初，制造业中心主要在英国，制造业产值曾经占世界制造业产值 30% 左右，之后开始向美国转移；第二轮制造业中心在美国，美国制造业产值从 1895 年取代英国，曾经占世界制造业产值 50% 以上，20 世纪 50 年代钢铁、纺织等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第三轮制造业中心在日本、德国，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日本制造业产值曾经占世界 16%，日本、德国开始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产业；第四轮制造业中心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将劳动力密集型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第五轮产业转移已经开始，正在从中国向东南亚、南亚、非洲、拉美一些国家和地区转移，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等，很多转移到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等国家。导致产业大规模转移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变革；二是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成本驱动。全球五轮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每一轮都有它内在的机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 33%，中国不到 2%；到 2016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世界 25.5%，美国则下降到 15%，就是因为上述 3 个主要原因，世界产业几度转移的结果。第五轮产业转移则主要基于后两个原因，即资源环境难以支撑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和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的抬升。2019 年中国贸易顺差比 2017 年收窄 18.3%，产业转移再加上扩大进口，预测未来 5 年内将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

2.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将重新布局。一方面，全球产业布局会形成链状链

接，虚拟链接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成为更具有黏性、更具有依赖性的经济联系。这种产业联系和经济联系的调整不是靠政府命令、政府规划，而是由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形成的内在联系，产业的高端会越来越集中在创新能力强的地方，产业的中低端则会越来越集中在那些资源密集的地方，产品最终配置或集成的环节一定会靠近市场。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人为因素打断产业链的风险，诸如在美国发起的全球性贸易战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中，采取单边主义、封闭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的态度，采取切断产业链联系的做法，这必然伤及产业链上庞大的虚拟企业群体，也包括美国企业本身，在一定条件会倒逼产业链进行调整和再调整。2018年8月，美国贸易谈判办公室征求美企业家对中国输美500亿美元加征高额关税的意见，95%的美国企业表示强烈反对，就因为这些企业与中国企业已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他们考虑的是企业可以承受的转移成本。还有一方面，产业链特别是处于中低端的产业链，正在向具有劳动力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和市场红利的国家转移，形成新的产业链布局。2018年中国13.9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38岁；印度13.2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28岁；非洲12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为27岁；印度尼西亚2.58亿人口，劳动力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中国之外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力月工资平均在100~150美元，比中国的工资水平低5~8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几亿农民进入城市，基本上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者，以低工资、低福利和产品的低价格进入产业链中低端，现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口红利释放空间被大大压缩，全球产业链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自动迁移或再次重构。

3. 智能制造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扑面而来，高速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AI），下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从替代人的体力劳动到部分地替代人的脑力劳动，使制造业形态发生非常大的变革，出现了智能工厂、智能车间、智能生态系统、智能工作流程等。特别是5G技术的应用，加速形成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可视和万物智能，产业互联网普遍应用，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进化，将重塑产业形态和产业结构。采取国家战略或产业政策支持智能制造发展，成为国际通行的做法。德国政府率先在2011年推进工业4.0，2018年推出《德国工业战略2030》，加强国家干预，加快培育龙头企业，全面推进智能制造。美国先是在奥巴马时期紧跟德国，推出工业互联网和先进制造业振兴计划，2016年以来白宫科学技术办公室连续发布《为人工智能未来做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和《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三份重要报告。特朗普政府更将其提升为国家加快发展AI战略，2019年2月11日，特朗普签署了《维持美国人工智能行政领导力的行政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次日美国国防部网站推出《2018国防部人工智能战略摘要：利用人工智能促进国家安全与

繁荣》。中国先后推出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战略、中国制造 2025、加快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规划，2019 年将围绕基础理论、关键共性技术、新型感知、智能芯片等方面，继续在 5G 以及后 5G 更高速的移动互联网布局研发项目和基础能力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制造业转型同步进行，支撑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中国已具有世界最完备的制造体系，中国制造业正在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一些领域正在迈向高端或者顶端，智能制造将是下一个突破口。日本、韩国、法国、英国、瑞士、意大利等国智能制造各有所长，智能制造将成为现代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4. 高端制造在向知识高地、创新高地和知识产权保护高地转移。产业链高端、顶端和新材料、新技术、核心关键零部件等，在向知识高地和创新高地转移。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是个城市型国家，在 2016 年世界银行关于全球营商水平评价中，新加坡排在全球第一位，营商环境全球最优，是全球知识高地、创新高地和知识保护高地，有利于大金融家、大企业家、大科学家投资和居住，集聚了现代金融中最高端的企业，全球 1/10 的芯片企业集聚在新加坡，全球 40% 的高端硬盘产品也产自新加坡。再以中国深圳为例，从 40 年前的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创新型城市，GDP 已经超过香港，将成为在世界率先开展 5G 试点的城市，成为国家、省级试验室等创新载体最多的城市，成为超前布局物联网、智能网联汽车的城市，成为最先建设全面感知体系和基础设施智能化的城市，形成高端制造的创新高地，聚集了一大批无人机、电动汽车、基因工程等制造行业和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高端制造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18 年全球创新指数》，通过统计 80 个指标，对世界 126 个主要经济体的创新能力进行评价，排名前 20 位的为瑞士、荷兰、瑞典、英国、新加坡、德国、爱尔兰、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卢森堡、法国、中国、加拿大、挪威和澳大利亚，中国是唯一进入前 20 位的发展中国家，这与中国深圳、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等创新型城市崛起，聚集了一大批高端制造与创新载体密切相关。为保证中国制造业稳步迈向中高端，中国构建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了 3 个知识产权法院（分别在北京、上海、广州）、16 个知识产权法庭、200 多个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三）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

全球能源转型与布局调整处在历史的关键转折期，能源将从总体上的短缺状态转向总体上的供大于求，能源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供求的地域分布将产生重大调整，新能源将逐步替代传统能源。

1. 能源将从总体上的短缺状态转向总体上供大于求。世界石油需求增速逐步放缓，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16 世界能源展望》报告，全球能源需求 2040 年将比 2016 年增

长 30.1%，年均增长率仅为 1%。经济合作组织（OECD）研究数据显示，全球从 2012 年开始，能源需求呈疲弱态势，分别为 1.4%、2.0%、1.1%、1.0%。预测到 2035 年全球将产生 36% 的能源增量，而 GDP 增量仅为 17%，能源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速。2019 年 2 月 15 日英国石油公司（BP）发布《世界能源展望 2019》称，从 2017 年至 2040 年全球能源消费有所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导致的能源需求增加 1/3，印度、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加起来占增量的 2/3，且仍有 2/3 的人口生活在人均能源消费较低的国家。基辛格曾说：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谁就掌握了世界。在全球能源是稀缺性、战略性商品的时代的确如此，发生在中东地区的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科威特战争，无不是围绕着在中东抢夺石油进行的大战。随着全球性能源供求关系的调整，需求方将成为决定能源市场价格走势的决定性力量。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40 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长都来自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将保持能源第一需求大国的地位，2040 年之后将被印度超越，这些国家将成为具有市场优势的一方。

2. 能源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将继续深化。全球能源结构向多元、低碳、清洁、高效、安全的方向演进，能源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从来没有停止过，总的趋势是化石能源占比不断下降，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上升，石油和煤炭在一次能源中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全球煤炭储量已经从 20 世纪末的 1 万亿吨，下降到目前不足 0.9 万吨，过去 10 年煤炭满足了几近 50% 的全球能源增长，石油替代煤炭成为世界主要能源经历了几十年，目前占全球能源比重达到 33%；煤炭、石油正在被快速发展的天然气替代或部分替代。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称，煤炭是全球消费增长最慢的能源，年均增幅 0.6%，2030 年天然气将取代煤炭，成为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能源，2050 年煤炭、油气和非化石能源将出现三分天下的局面，能源需求增量的 90% 为清洁能源。锂电池、石墨烯等可再生能源增长最为迅速，BP 预测，可再生能源将成为增长最快的能源，到 2035 年之前年均增长 6.6%，到 2035 年在全球发电中占比达到 16%，将提供全球 1/3 的发电增量。核电、水电、生物质能、其他可再生能源，到 2035 年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将达到 23%，太阳能将比 2016 年增加 8 倍，风能将增加 4 倍。原来能源短缺的国家，由于能源结构的调整变成了能源富集的地方。老挝几年前还是一个极其缺电的国家，自 2013 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来，中国的十几个能源企业在此开发水电，使老挝成为电力自给国和输出国，开始向缅甸、泰国和越南出售电力资源。

3. 能源生产和需求的地域发生重大调整。能源生产和需求地域总体上呈供给西移、需求东移的特征，世界能源贸易中心正在从大西洋盆地转向亚太地区。随着美国页岩气

革命，美国、加拿大、巴西、委内瑞拉等美洲地区国家将成为非常规油气开发输出的地区，美国 2019 年成为油气的最大生产国，目前日产油气量超过 1300 万桶，超过了沙特和俄罗斯，美国还将在近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欧美 2035 年之后对能源的需求将停滞，中国、印度成为需求增长最快的国家。未来 10 年，印度能源消费量将翻一番，年均增长 5%~6%；中国能源消费量将增加 40%左右，年均增长 5%左右。加上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市场需求，到 2035 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石油天然气的消费中心和贸易中心。2018 年中国推出人民币石油期货，石油期货交易可以用人民币结算，与黄金挂钩。欧洲布伦特期货市场份额从全球 60%到 2018 年末降为 52%，美国纽约石油期货从 38%下降到 32%，人民币石油期货占比 14%，新加坡、迪拜等石油交易所经过几十年发展，目前占全球 2%。

4. 石油价格将在震荡中持续走低。近几十年以来，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产品价格是石油价格。1973 年和 1979 年两次大的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 3 美元/桶上升到 13 美元/桶，不到 7 年又上升到 36 美元/桶。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石油价格暴跌至每桶 10 美元以下。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石油有了明显的资源、政治和金融三重属性，这一轮石油价格上涨是一个较长的历史周期，从 9.8 美元/桶持续上升，一直涨到 146 美元/桶，之后掉头而下，到 2016 年最低降到 28 美元/桶。2017 年、2018 年石油价格在一定区间宽幅震荡，最高点达到 86 美元/桶，最低点降到 40 美元/桶，并有持续走低的趋势。影响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石油价格的主要因素：一是成本的原因，由于美国页岩气革命的持续推进，大大降低了能源开采成本，从开始每桶 55 美元降低到目前的 15 美元，水能、核能、太阳能的成本也不断降低；二是石油美元松动的原因，独立于美元的欧元支付体系、俄罗斯石油结算方式和十几个石油输出国去美元化，使美国通过石油美元结算体系控制价格的硬约束松动；三是供给侧的原因，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能源多元供给的结构已经形成，能源输出国亦从原来集中在中东地区转向美国、俄罗斯、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原来欧佩克组织通过控制生产从而控制价格的机制逐步失效。美国未来作为最大的油气输出国，将逐步改写石油天然气作为战略性、储备性资源的特性，石油被赋予的政治、资源、金融三重属性也将渐渐失去，争夺需求市场将成为生产者的共同选择，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应指出，当前美国对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制裁等非市场因素也会导致石油价格出现大的跌宕起伏。

（四）全球金融体系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经济，美国依靠美元霸权地位成功地转嫁了危机和风

险，美国 34 家大银行经过抗压和风险测试平安着陆，美元依然锋芒如故。近两年美国四处出击，既打贸易战，也打金融战，继续用美元、美债、美元石油、美元期货收割战利品。但他们忘却了一个基本事实，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早已经成为靠国家信用支撑的虚拟货币。美国国家的信用缺失和损耗，使国际金融体系开始了新一轮扬弃，美元信用遭到质疑，美元结算体系松动，美债风光不再，多元货币结构逐步形成，国家重拾黄金作为避险工具。

1. 以美元为基准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了质疑。17、18 世纪英国金融体系形成并逐渐居于世界霸主地位，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1944 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替代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美元霸权地位成为支撑美国霸主地位的重要支柱。当时美国经济实力最强，制造业、贸易、科技、军事力量雄踞全球第一位，全球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美国黄金储量达到 2.3 万吨，占全球黄金储备的 80%，美元与黄金挂钩，各个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1971 年 8 月 15 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已经成为信用货币，由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和经济实力仍在，加之各国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路径依赖，美元实质上仍然充当着世界货币。而实际上美元已经变成一张张的绿纸片，它不再与黄金挂钩，不再与任何实物商品挂钩，加上美国主导的全球石油美元结算体系，保障了没有任何内涵的美元继续充当准国际货币，美国印一张价值几美分的美元，就能换到同等价值的实物量。近两年，由于美国极端霸凌、霸道、霸权，加之特朗普政府出尔反尔，极大损耗了美国政府信用，正在导致美元霸权地位受到空前挑战。例如，美国不仅单方面废止“伊核协议”，还勒令所有国家不得在 2018 年 11 月 5 日之后与伊朗做生意；制裁委内瑞拉、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导致十几个国家放弃使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这层原先没有捅破的窗户纸，已无法继续阻隔人们对美元实质的认识，形成了“去美元化”“去美债化”的全球性行动。尽管美元在国际结算币中还占近 40%，在国际货币储备中高达 62%，但由于美国国家信用的降低，这将开启美元由盛转衰的周期。如果没有这个转折，美元霸权地位可能还将延续 40~50 年，现在则可能大大缩短被替代的过程。

2. 世界上众多国家重拾黄金作为避险工具。随着美元信用的递减，越来越多的国家大幅度增加黄金储备，已经或正在运回存放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境外黄金储备。2000—2008 年，全球黄金储备从 3.3 万吨下降到 3 万吨，2008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特别是近两年黄金储备急剧增加。中国从 2008 年的 600 余吨上升到 2018 年的 1852.5 吨，俄罗斯从 2008 年的 500 吨上升至 2018 年的 2113 吨，印度、巴西、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匈牙利、波兰也在增持黄金。目前，美国黄金储量 8133.5 吨，居全球第一位；德国

3369.7 吨，居全球第二位；意大利 2451.8 吨，居全球第三位；法国 2436.8 吨，居全球第四位；俄罗斯居全球第五位；中国大陆居全球第六位；瑞士 1040.0 吨，居全球第七位；日本 765.2 吨，居全球第八位；荷兰 612.5 吨，居全球第九位；印度 598.6 吨，居全球第十位。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是近半个世纪中全球黄金储备增长最高的年份，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增加了 74%。德国、荷兰、比利时、土耳其等 9 个国家已经或准备启运存在他国的黄金。纵观全球，美国作为排在第一位的黄金储备国的地位短期难以撼动，增加黄金储量也不一定可以满足黄金作为结算货币、储备货币的需要，但各国重拾黄金储备，确实是在用脚投了对美元的不信任票。

3. 全球多元金融体系和货币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国际金融体系从世界银行、IMF 等国际金融机构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银行等区域性金融机构长期并存，到 21 世纪初以来，渐次加入了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益和金融需求的新的金融机构。2015 年中国倡议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目前自愿加入的成员已经达到 93 个，成为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多边金融机构。印度是该行的最大受益者，亚投行投资的项目中 1/4 用于印度发展。2015 年在南非德班成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避免在下一轮金融危机中受到货币不稳定的影响，计划构筑共同的金融安全网，一旦出现货币不稳定，可以借助这个资金池兑换一部分外汇以应急。2010 年成立的上合组织，正在筹建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将进一步扩大本币结算合作，推动形成上合组织银联体机制。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出坚实的步伐，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并驾齐驱的国际货币，2016 年 10 月 1 日，人民币正式加入 IMF 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国央行公布 2018 年金融数据，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 3.66 万亿元、1.45 万亿元、0.80 万亿元、1.86 万亿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 5.11 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业务发生 2.66 亿元。根据 IMF 数据，截至 2018 年四季度，各经济体持有的外汇储备中，人民币资产上升到 1.89%。2019 年 1 月人民币国际支付比例提升到 2.15%，排名第五位。中国已经与近 40 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金额超过 3 万亿元。欧元正在谋求建立独立于美元的结算体系，俄罗斯大量使用卢布进行军售和贸易结算，石油生产国开始使用欧元、人民币、卢布和本币进行贸易结算，多元货币体系和结算体系正在重构。

三、中国将长期保持世界经济“稳定之锚”的地位

从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看，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战以后长达几十年时间里，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是美国。从 1978 年到 2017 年，美国对世界经

济增量的年均贡献率 18.4%，中国是 17.9%。但是从 2008 年之后，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到 2018 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率 10 年年均为 30.6%，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都将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

（一）中国将会延长“四个周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到 21 世纪中叶要实现的宏伟蓝图，2035 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谓强国不应只是强调本国特色，而是在国际比较、横向比较中的强国。瞻望未来，中国经济会延长“四个周期”。

1. 会继续延长战略机遇期。2000 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从现在起未来 20 年中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到 2020 年，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没有结束，新的战略机遇期正在开始。党的十九大和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大势并未逆转，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产生爆发力量，破解世界性难题迫切需要国际合作，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并没有根本性改变。经过建国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认知和响应，成为服务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产品。短短 6 年，中国与 124 个国家、29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本，形成了互联互通、携手发展的格局。国内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和雄安新区等一系列新区域发展布局，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空间。美国战略转向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成为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外部压力，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党的十六大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体量、国际影响力、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还都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今日之中国以更大的胸襟和实力获得了新的战略机遇期。

2. 会继续延长经济发展周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的发展周期已持续了 40 年，40 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9.4%。2010—2015 年平均增长速度 7.2%。近 3 年保持 6.5% 左右的增速，但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就相当于 5 年前的 1.5 个百分点、10 年前的 2 个百分点。按照 2018 年中国实现 GDP 达到 13.6 万亿美元的目标，中国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绝对量为 1360 亿美元，6.6% 的增速绝对量为 1.4 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俄罗斯、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十三五”期间，中国确定 GDP 增长速度为 6.5%，2019 年政府确

定增速为 6%~6.5%，2020 年只要完成 6%，就可以实现五年目标的同时，实现党的十八大人均 GDP 翻两番的目标。“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未来 10 年中国如果能够持续 5% 以上的增长速度，经济高速增长和中高速增长将保持半个世纪，这确实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周期还会延长，如果发生了颠覆性产业革命或者技术革命，中国创新驱动获得突破性进展，把目前还落后于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的共性技术、基础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短板补上来，中国经济增长不仅会更快发展，而且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周期会延长，还在于改革开放重塑了经济微观主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迈入国际一流企业的行列。中国的企业充满了活力、动力和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长期保持发展动力的重要基础。地方政府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大助力和动力，这些年中国的地方政府形成了竞争机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对微观主体的支持态度和力度上，地方政府比中央一些部委更大、更直接。如果加大生产关系的调整力度，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加快上层建筑改革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长周期会进一步延长。

3. 会继续延长制造业繁荣周期。按照联合国分类的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和 225 个小类，中国是拥有所有门类的国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包括美日欧都没有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制造业在 2018 年已达到全球制造业产值的 30%，而且正在稳步迈向中高端。如果说过去一段时间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一些地方曾经出现了偏差，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中，不断缩小制造业比重，增加服务业比重，并以此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盲目追求服务业占比。这一次中美贸易摩擦，使我们懂得了一个道理：贸易摩擦是一个表象，而制造业发展水平才是竞争核心。制造业作为强国之基、强国之要、大国之重器受到空前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将得到越来越大的支持，中国渐次形成的巨大产能，将成为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将大大拉长中国制造业的繁荣周期。2018 年中国高端制造业增长速度达到 19%，而传统产业不到 3%，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高技术产业发展也更加迅速。

4. 会继续延长消费者的生命周期。中国消费者的预期寿命延长将带来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8 年中国人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6.4 岁，北京、上海超过 80 岁。按照中国健康 2030 规划，到 2020 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 77 岁，到 2030 年达到 79 岁。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人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消费者全生命周期的消费需求，将成为拉动中国不断产生市场红利的基本动因，健康消费、医疗消费、体育消费、养老消

费、休闲旅游消费、文化消费、时尚消费、颜值消费、网络消费等，这些满足人们吃穿用住基本消费需求之外的潜在消费需求，将成为中国保持世界第一强劲市场的新增长点。中国餐饮业年销售额已超过 4 万亿元，外卖成为主要生活方式；中国旅游 2017 年达到 50 亿人次，2018 年超过了 55 亿人次；中国汽车销售和生产都达到 3000 万辆，多年居世界第一位。中国人生命周期的延长、购买力水平和生活品位的提高，将使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市场红利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吸引全球投资及资源配置的耐力和底气。

（二）中国将实现“四个 100%”

中国将继续拉长四个周期，随着量的积累将在一定时点产生新的飞跃，在可见的未来 10 年之内，中国将实现“四个 100%”。

1. 将会实现 100% 的人口脱离贫困。1978 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 97.5%，改革开放 40 年使 7.4 亿人脱离了贫困。按照现行贫困标准，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分别使 1650 万、1232 万、1442 万、1240 万、1289 万、1386 万人脱离贫困。2019 年还剩 600 万贫困人口，届时将全部脱离贫困。一个 14 亿人口的国度，实现 100% 脱离贫困，这确实史无前例，在当今所有国家也绝无仅有。这是世界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认知并赞赏的原因。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用了 70 年，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可以预期。中国发展的道路及成就，与全球还有 8 亿多人处于绝对贫困和饥饿之中形成对照，甚至与一些发达国家尚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形成对照。

2. 将会实现 100% 的社会保障全覆盖。中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框架，将实现 100% 的社会保障全覆盖。作为现代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中国已经通过立法制定了保险、救助、补贴等制度，保障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特别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的特殊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制度，正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和社会优抚制度。按照党中央部署，到 2020 年“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这意味着，2.55 亿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险、13.9 亿人的医疗保险将实现 100% 的全覆盖。

3. 将会实现 100% 的 5G 网络全覆盖。中国将聚焦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重大项目，率先实现 100% 的 5G 全覆盖。中国将加快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服务、AI 技术等下一代信息技术，实现数据的本体化、标准化、一体化，中国的高能计算、智慧城市、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eWTP）、移动支付等走在了世界前列。随着万物互联、万物感知、万物可视、万物智能时代的到来，制造业业态、服务业态、贸易业态乃至人们的生活、生存方式将出现新的变革。在 960 万平方公里黄色国土加上海域 340 万平方公里蓝色国土上，中国将再次出现翻天覆地的巨变。

4. 将会逐步实现祖国山川水域 100% 的治理。中国启动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加快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推进森林城市、森林城市群、森林公园、国家湿地、国家级生态保护区建设，实行河长制、湖长制，治理空气污染，加大祖国生态治理。到 2020 年，中国森林覆盖率将达到 23.04%，2035 年达到 26%，21 世纪中叶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19 年 2 月《自然可持续》杂志发文，一项跟踪 17 年的研究表明，自 2000 年之后，中国和印度大约贡献了全球绿化增长面积的 1/3，中国植被面积仅占全球 6%，但在全球绿地增长面积中贡献了 25% 的增长率。中国的荒山断流正在变为“绿水青山”，还将进一步变成“金山银山”，一个美丽的中国正在还原并书写更加美丽的篇章。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求是网，2017 年 11 月 1 日。
2. 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3. 陈文玲：《中国与世界：以中国视角解析国际问题（上、下）》，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6 年版。
4. 陈文玲：《推进“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开放导报》2019 年第 1 期。
5. 陈文玲：《“一带一路”建设开启新全球化伟大进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 年第 8 期。
6.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E 国际贸易——下一代贸易方式的理论内涵与基础框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8 年版。
7. 陈文玲：《变动中的世界与作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的中国》，《南京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0 期。

责任编辑：李 蕊

经济复苏动能减弱 未来运行更趋艰难

——2018 年世界经济回顾及 2019 年展望

国家统计局释经组 *

摘要：2018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十年，也是极不寻常的一年，美国通过采取“减税+加息+缩表+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组合，给世界经济复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贸易、投资、工业生产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疲态。2019 年，美国系列政策仍将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叠加全球债务水平高筑、地缘政治冲突等一系列负面因素的影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增加，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

关键词：世界经济 动能减弱 增速放缓

2018 年世界经济环境深刻调整，经济运行并未延续上年的复苏势头，呈现疲弱态势。“美国优先”通过美元霸权、贸易霸凌、经济制裁、零和思维辐射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全球化经历挑战，世界贸易及跨境投资受到阻滞，世界经济复苏动能减弱；冷战思维、民粹主义泛起，地缘政治更趋紧张，加大世界经济下行压力。2019 年，世界经济运行环境更趋严峻，经济增速将会进一步放缓。

一、主要经济体经济运行情况

（一）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但年末呈放缓态势

2018 年，受益于周期性因素及税制改革、财政支出增加等政策，美国经济实现高速扩张，居民消费、工业生产、失业率等主要经济指标在上年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但年末

* 国家统计局释经组成员包括：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张军、郑泽香、石婷、张国洪、陈璇璇、李婧婧、胡晨沛、郝悦。

随着政策刺激因素的减弱，经济增速有所回落。

1. 经济增速冲高回落。2018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 2.9%，增速比上年加快 0.7 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来最高增速，其中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增长 4.2%，创 2014 年三季度以来新高，但三、四季度增速有所回落（图 1）。从贡献构成来看，2018 年个人消费支出拉动 1.80 个百分点，继续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私人投资拉动 1.02 个百分点，比上年提高 0.21 个百分点；政府消费与投资改善明显，由上年拖累因素变为拉动 0.26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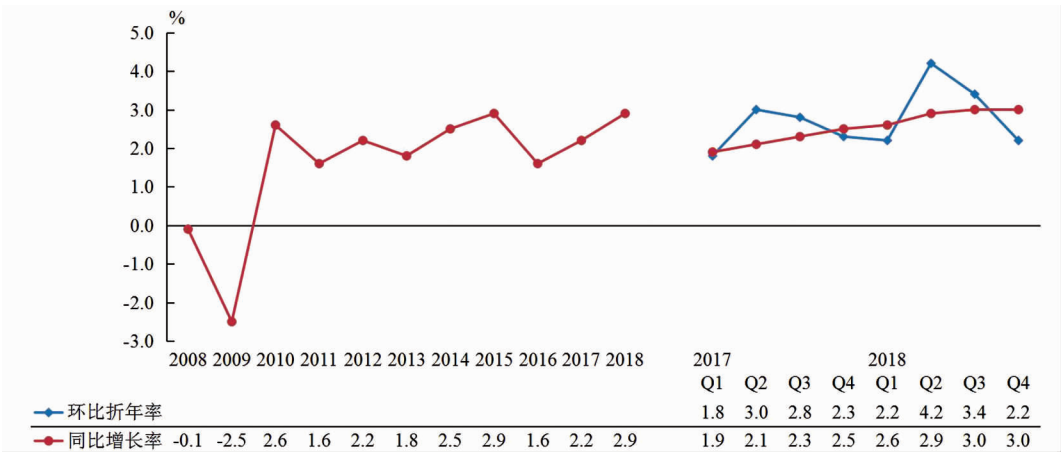


图 1 2008—2018 年美国 GDP 增长率 (%)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2. 工业生产强劲扩张。2018 年，在“制造业回归”战略的助推下，美国工业生产增长 3.9%，增速比上年加快 1.6 个百分点，是 2011 年以来最高增速，其中制造业生产增长 2.3%，加快 0.3 个百分点。全年工业产能利用率达 78.7%，为 200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3. 消费市场总体向好。美国税制改革通过降低美国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税负，对美国消费市场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2018 年，美国零售额增长 4.9%，为 2013 年以来最高增速，但受国内消费者信心趋弱、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年末零售额增速显现放缓迹象。

4. 对外贸易活跃但逆差继续扩大。2018 年，美国对外贸易总体保持活跃。其中，出口额 25008 亿美元，增长 6.4%，增速比上年加快 0.3 个百分点；进口额 31229 亿美元，增长 7.6%，加快 0.8 个百分点。贸易逆差 6221 亿美元，为 2009 年以来最高水平。

5. 就业市场持续改善。2018 年，美国就业形势继续改善。一方面，全年失业率 3.9%，是 2010 年高点（9.6%）后连续第八年回落，降至 1970 年以来最低水平；全年新增非农就业人数 267.9 万人，为近三年新高。另一方面，劳动参与率在 2018 年有所回升，

12 月份劳动参与率 63.1%，比年初 62.7%提高 0.4 个百分点，表明美国就业状况实质性的改善。

6. 房地产市场表现低迷。2018 年，美国 30 年期按揭贷款平均利率达 4.54%，为 2011 年以来最高水平。贷款利率的上升提高了买家购房成本，导致房屋销售疲软。2018 年，现房销量下降 3.1%至 534 万套，为 2015 年以来新低，其中 12 月现房销量创 2015 年 11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7. 价格温和上涨。2018 年，美国消费价格上涨 2.4%，生产者价格上涨 2.9%，均为七年来最大涨幅；核心消费价格上涨 2.1%，涨幅比上年扩大 0.3 个百分点，基本达到美联储 2.0%的目标值。2018 年 1—7 月消费价格和生产者价格涨幅呈扩大态势，从 8 月份开始，出现明显回落。

(二) 欧元区经济复苏疲弱

2018 年，欧元区总体延续复苏态势，但增速持续回落。美国加息政策、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导致欧元区实体经济不振、金融风险上升，而英国脱欧悬而未决、意大利财政预算危机未消、欧洲右翼势力卷土重来等因素严重打击市场信心和投资，欧元区内外风险相互交织，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发展前景蒙上阴影。

1. 经济增速低缓。2018 年，欧元区 GDP 增长 1.8%，增速比上年回落 0.6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二季度环比分别增长 0.4%，三、四季度环比增速回落至 0.1%、0.2%；同比增速逐季放缓，由一季度的 2.4%持续回落至四季度的 1.1%（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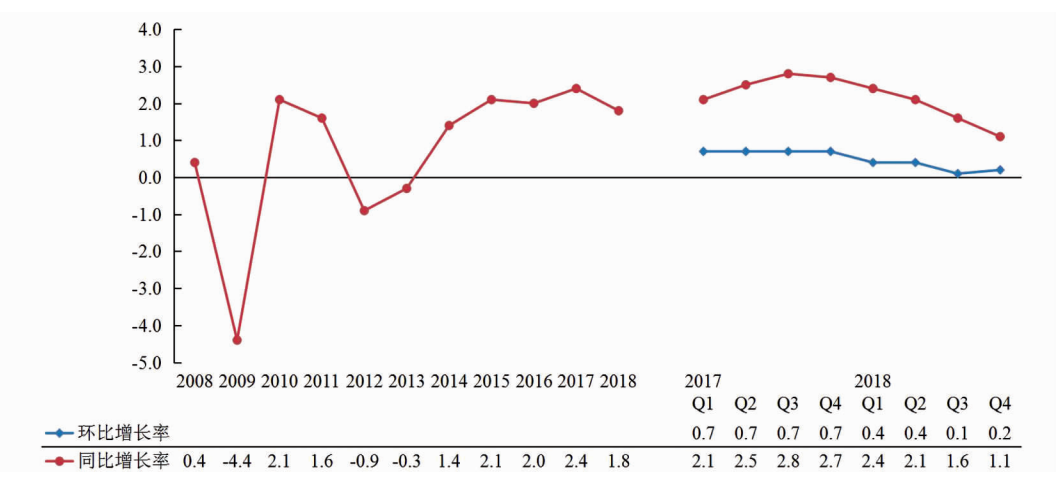


图 2 2008—2018 年欧元区 GDP 增长率 (%)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2. 工业生产低速增长。2018 年，欧元区工业与制造业生产分别增长 1.1%和 1.3%，

增速比上年回落 1.9 和 1.8 个百分点；月度增速呈现放缓态势并由正转负，年末降幅分别达到 4.2% 和 4.0%，为 2009 年 11 月和 2012 年 11 月以来最大降幅。

3. 消费需求疲弱。2018 年，欧元区消费活力减弱，商品零售总量增长 1.5%，增速比上年回落 0.8 个百分点；新车登记数增长 0.8%，回落 4.9 个百分点，受全球需求下降及欧盟实施新的汽车排放标准影响，下半年新车登记明显下降。

4. 对外贸易增速放缓。受全球贸易局势紧张影响，2018 年欧元区对外贸易增速放缓。货物出口额 22763 亿欧元，增速由上年的 7.1% 回落至 3.7%；进口额 20821 亿欧元，增速由 10.0% 回落至 6.2%。

5. 通胀水平温和。主要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2018 年欧元区价格水平继续温和上涨。其中，消费价格上涨 1.7%，涨幅比上年扩大 0.2 个百分点，创六年来最高水平；但剔除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通胀仍然低迷，持平于上年的 1.0%。生产者价格涨幅由上年的 3.0% 扩大至 3.2%。

6. 就业市场稳步改善。2018 年，欧元区就业形势稳步改善。全年失业率 8.2%，比上年回落 0.9 个百分点，为 2008 年以来最低水平，月度失业率保持下降趋势；失业人数持续下降，全年累计减少 117.4 万人。

7. 景气指标下降。2018 年，欧元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与服务业 PMI 分别从 1 月份的 59.6 和 58.0 降至 12 月份的 51.4 和 51.2。消费者信心指数明显恶化，由 1 月份的 -3.7 降至 12 月份的 -8.3。

（三）日本经济艰难前行

2018 年，受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日本经济艰难前行。三季度，酷暑、地震、台风等灾害不断冲击日本工业生产及进出口贸易，同时也令国内消费呈疲弱态势，消费者信心持续下降。

1. 经济低速增长。2018 年，日本 GDP 增长 0.8%，增速比上年回落 1.1 个百分点。全年经济波动明显，一季度环比下降 0.1%，二季度小幅反弹至 0.5%，三季度受贸易摩擦和国内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拖累，GDP 下降 0.6%，四季度由于灾后重建需求，GDP 增长 0.5%（图 3）。

2. 工业生产波动下滑。2018 年，日本国内一系列自然灾害对工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增速大幅波动，全年工业生产增长 1.0%，增速比上年回落 2.1 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在通用、机械工业以及汽车零件和设备等部门快速增长的拉动下，工业生产实现稳步增长。但酷暑、地震、台风的接连发生令部分地区生产被迫停滞，工业生产增速出现波动下滑，三季度下降 0.1%，创两年来最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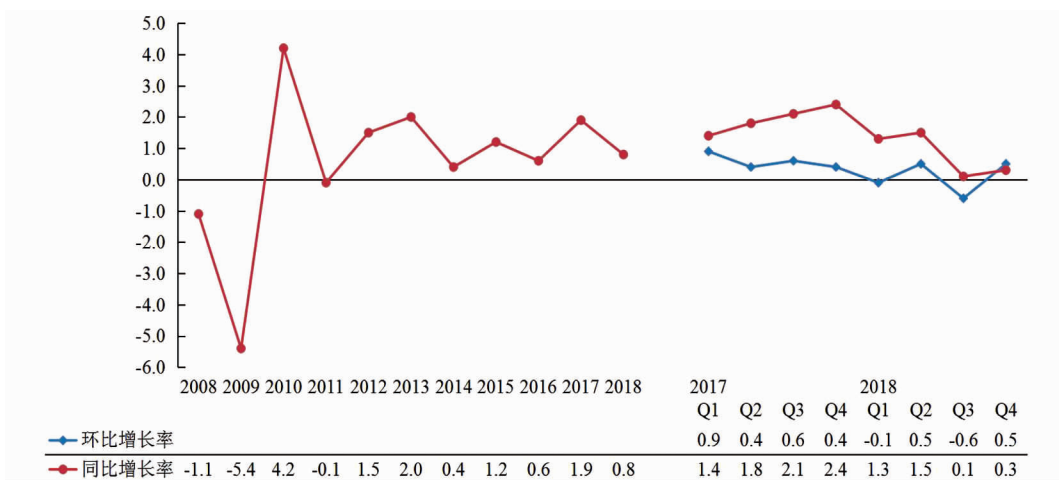


图3 2008—2018年日本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日本内阁府。

3. 消费需求疲弱。2018年，日本零售额增长1.7%，增速比上年回落0.2个百分点；新车登记增长0.7%，回落5.0个百分点。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年初的44.7降至12月份的42.5，创2017年以来新低。

4.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2018年，日本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新房开工量94.2万套，比上年下降2.3%，其中自有新房28.3万套，下降0.4%；租赁用新房39.6万套，下降5.5%；销售用新房25.5万套，与去年持平。分月度看，1—3月新房开工量连续同比负增长，4月份后有所好转但仍处于低位。

5. 出口持续低迷，进口相对活跃。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中美经贸摩擦以及国内自然灾害影响，2018年日本出口表现低迷，全年出口增长4.1%，增速比上年回落7.7个百分点；但进口相对活跃，增长9.7%，在二季度小幅下跌后，三、四季度增速回升至较高水平，增速分别达到12.4%和11.2%。

6. 价格微幅上涨。2018年，日本消费价格上涨1.0%，涨幅比上年扩大0.5个百分点，连续两年上涨；核心消费价格上涨0.9%。尽管价格微幅上涨，但距离日本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仍有一定距离。生产者价格上涨2.5%，扩大0.2个百分点。

7. 劳动力供给不足。2018年，日本失业率2.4%，创28年以来新低。求人倍率为1.61，比上年上升0.11点，达到仅次于1973年的历史第二高水平，劳动力严重短缺。分类别看，2018年日本老年人与女性就业人数有所增长，65岁以上老人就业人数达到862万人，女性就业人数达到2946万人，均创历史最高。

（四）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大多放缓

2018 年，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加拿大、英国、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 GDP 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表 1）。

表 1 2017—2018 年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 单位：%

经济体	2017 年	2018 年	2018 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加拿大	3.0	1.9	2.2	1.7	1.9	1.6
英 国	1.8	1.4	1.3	1.4	1.6	1.3
韩 国	3.1	2.7	2.8	2.8	2.0	3.2
新加坡	3.6	3.2	4.5	4.1	2.4	1.9
中国香港	3.8	3.1	4.6	3.5	2.8	1.3
中国台湾	3.1	2.7	3.2	3.3	2.4	1.8
巴 西	1.0	1.1	1.2	0.9	1.3	1.1
南 非	1.3	0.8	0.7	0.1	1.3	1.1
印 度	6.7	7.3	7.7	8.0	7.0	6.6
印 尼	5.1	5.2	5.1	5.3	5.2	5.2
马来西亚	5.9	4.8	5.4	4.5	4.4	4.7
越 南	6.8	7.1	7.5	6.7	6.8	7.3
土耳其	7.4	2.6	7.4	5.3	1.8	-3.0
俄罗斯	1.6		1.3	1.9	1.5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各个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二、主要经济领域运行情况

（一）世界工业生产增速回落

2018 年，世界工业生产增长 3.5%，增速比上年回落 0.2 个百分点，年内月度同比增速呈明显回落态势，12 月份增长 1.8%，远低于上半年 4.2% 的平均增速（图 4）。

（二）世界贸易增速放缓

1. 货物贸易量增速回落明显。2018 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增长 3.3%，增速比上年回落 1.4 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增长 2.4%，回落 1.5 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增长 4.6%，回落 1.3 个百分点。
2. 货物贸易额增速有所下滑。2018 年，世界货物出口额增长 9.4%，增速比上年回

落 1.0 个百分点；货物进口额增长 11.6%，回落 0.5 个百分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图 5）。

3.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冲高回落。2018 年，BDI 一度达到 1774 点，创近四年来最高水平，但在年末回落至 1271 点，远低于 2000 点的海运平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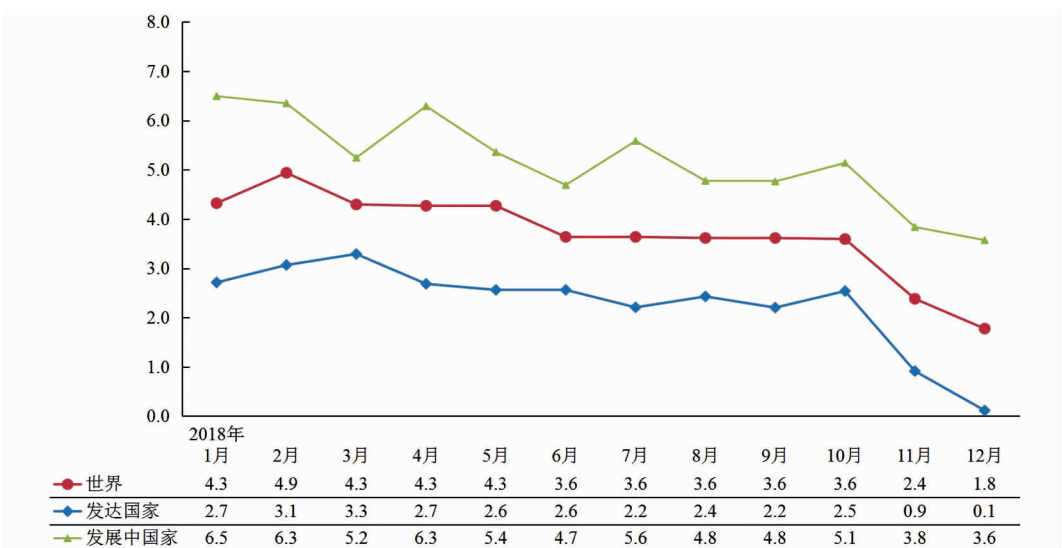


图 4 2018 年世界工业生产月度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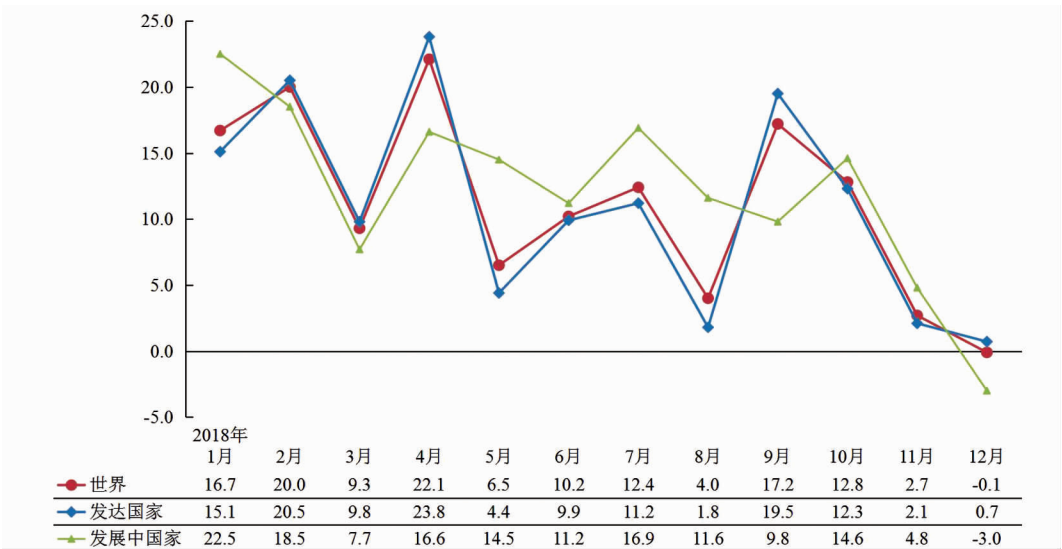


图 5 2018 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月度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三）全球价格涨幅基本稳定

2018 年，全球消费价格上涨 2.3%，涨幅与上年持平。其中，发达国家上涨 1.7%，涨

幅比上年扩大 0.1 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上涨 3.2%，回落 0.2 个百分点。

（四）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回落

2018 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先扬后抑。能源价格全年上涨 27.8%，2018 年 10 月份达到峰值，但最后两个月大幅下跌 25.0%。非能源价格全年下跌 8.1%，其中：农产品价格下降 0.3%，原材料价格上涨 0.3%，化肥价格上涨 11.1%，金属和矿产价格上涨 5.5%。国际油价冲高回落。2018 年，国际油价先涨后跌，全年上涨 12.4%。2018 年前三季度，受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减产、中东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等影响，油价一路走高。第四季度，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及贸易局势紧张，叠加 OPEC 达成增产协议、美国对伊朗贸易制裁不及预期等影响下，2018 年 12 月份 OPEC 一揽子原油价格为 56.94 美元/桶，较 2018 年高点下跌 28.3%。

（五）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

1. 债市震荡下跌。2018 年，美国、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最大跌幅分别达 21.2% 和 30.9%。日本、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2019 年初一度跌至 -0.037% 和 0.152%，均创 2016 年 2 月以来新低。

2. 汇市大幅动荡。部分新兴经济体本币在 2018 年出现大幅贬值。其中，委内瑞拉货币崩溃，阿根廷、土耳其、巴基斯坦货币全年贬值幅度高达 50.66%、28.17% 和 20.84%。

3. 股市集体重挫。美国道琼斯、标普 500 和纳斯达克三大股指全年分别下跌 5.6%、6.2% 和 3.9%，日本、德国和英国股指下跌幅度分别达到 12.1%、18.7% 和 11.7%。新兴市场股指全年处于震荡下跌走势，累计下跌了 23.0%，最高振幅达到 26.5%。反映全球股市心态的恐慌指数呈大幅波动走势，全年上涨了 1.3 倍，最大振幅达到 335%。

（六）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继续低迷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8 年全球 FDI 下降 19%，从 2017 年的 1.47 万亿美元降至 1.2 万亿美元，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其中，发达国家 FDI 流入量 4510 亿美元，比上年减少 39.8%，为 2004 年以来最低水平；发展中国家 FDI 流入量 6940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3.1%。

三、影响 2018 年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

（一）全球化进程受阻

1. 保护主义兴起。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不断破坏各种国际规则，频繁上演“退群”戏码，先后同多国开展双边贸易谈判，意在形成一套有利于自己的贸

易规则和秩序。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全球贸易仲裁者的权威性面临严重削弱，导致国际贸易市场失去可靠和稳固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2. 民粹主义崛起。2018 年，美欧出台了限制移民的反全球化政策、英国脱欧、欧洲右翼势力卷土重来等，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地区格局及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全球化进程面临更多挑战。

3. 贸易自由化水平倒退。2018 年，贸易摩擦令全球价值链遭到破坏，企业运营成本增加，企业生产、投资、创新等一系列活动均受到不利影响。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六年来全世界出台的限制自由贸易的政策在数量上翻了四倍。

（二）美国系列政策外溢冲击加大

2018 年，美国采取“减税 + 加息 + 缩表”政策组合以保持其经济增长，但对世界经济负面冲击显现。税制改革致使大量海外资金回流美国，全球 FDI 流入量大幅下降；美联储加息使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出加剧，金融市场动荡；美元升值导致非美元货币大范围贬值，全球 50 多种主要货币中，有 40 多种出现不同程度贬值；美债中短期收益率倒挂加剧全球股市震荡，投资者信心受到重创。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成为影响 2018 年世界经济增长、扰动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源头，美元霸权的负面影响强烈显现。

（三）冷战思维沉渣泛起

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理已发生明显变化，冷战思维泛起，热衷零和博弈。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油价、围剿高科技通讯技术企业发展、实施“印太战略”“新非洲战略”等对新兴大国进行打压；另一方面，主要大国将零和博弈思维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延续至经济、政治层面，阻挠新兴大国的发展步伐。

（四）地缘政治更趋紧张

2018 年以来，地缘政治风险使国际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大。美重启对伊制裁引发风波，俄罗斯乌克兰冲突明显恶化，叙利亚局势加速演变，南海局势再度升温。以美国、欧盟、俄罗斯为首的经济体不断围绕大国地缘安全博弈，以及沙特、伊朗、土耳其等中东国家对地区领导权的争夺，造成全球地缘冲突不断，国际局势动荡不宁。

四、2019 年世界经济展望

（一）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增加

1. 全球债务水平高企，政府债务风险持续积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

测，2019 年发达经济体政府总债务占 GDP 比重将达到 103.6%，净债务占 GDP 比重将达到 73.8%；新兴市场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总债务占 GDP 比重将达到 52.2%，净债务占 GDP 比重将达到 38.9%。目前，世界经济仍主要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撑，随着政府债务的攀升，经济体在未来制定相关财政政策时将面临更大掣肘，财政政策的空间已被压缩到最小，宏观经济和财政运行均具有较高的脆弱性。

2. 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贸易摩擦阻碍经济稳定复苏。2018 年，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旗帜，在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摩擦，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更大风险和变数。从最新数据来看，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冲击正在显现：2019 年 2 月，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一度下跌至 595 点，与年初相比下跌 53.6%，创近三年来新低；WTO 发布的 2019 年一季度全球贸易景气指数为 96.3，是 2010 年 3 月以来的最低值；韩国、巴西、中国香港、印尼等新兴经济体 1 月最新出口数据显示世界贸易前景并不乐观。尽管美国延后原定于 2019 年 3 月 1 日提高中国商品关税的计划，但延后并不意味着取消，再加上美欧、中澳双边贸易关系的恶化，贸易环境的不确定性仍将是 2019 年阻碍世界经济复苏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3. 限制性投资政策增加，投资自由化进程受阻。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一期《国际投资协定监测报告》显示，2018 年 1—10 月，全球新出台的国际投资协定中，30%为限制或管制协定，是 201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限制和管制协定比重的上升使投资者跨境投资的信心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中国作为第二大 FDI 流入国，2018 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由上年的 1.83 下降至 1.76（满值为 3），英国、新加坡、印度等主要外资流入国家的 FDI 信心指数较上年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

4. 地缘政治风险发酵，政治博弈冲击经济发展。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近年来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2019 年，以欧亚地区为主的全球地缘风险不确定性可能会继续增加。欧洲方面，英国“脱欧”逐渐演化为“拖欧”、法国“黄背心”运动、德国迎来“后默克尔时代”等政治事件，都将为欧洲发展前景增加更多变数；亚洲方面，沙特、伊朗、土耳其围绕中东地区领导权的争夺、印巴南亚冲突在短期内的快速升级以及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再添波折，都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动荡局面。

（二）2019 年世界经济初步预测

近两年，正是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受到当年金融海啸席卷的国家已经走出低谷。但 2018 年一系列事件的发生，破坏了世界经济运行的良好势头，正如 IMF 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认为的，目前正是一个全球国际关系框架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在此背景下，世界贸易、制造业及投资领域的复苏遭遇

瓶颈，世界经济的脆弱性显著增加。因此，主要国际组织纷纷下调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近期，IMF 将 2019 年世界经济增速再次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3.5%；世界银行下调 0.1 个百分点至 2.9%。

表 2 近年世界经济主要指标的年度预测 单位:%

指标	预测机构	2017	2018 估计值	2019 预测值	指标	预测机构	2017	2018 估计值	2019 预测值
经济增长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¹				通货膨胀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	3.8	3.7	3.5		发达国家	1.7	2.0	1.7
	发达国家	2.4	2.3	2.0		发展中国家	4.3	4.9	5.1
	美国	2.2	2.9	2.5		英国共识公司			
	欧元区	2.4	1.8	1.6		世界	2.5	3.0	2.7
	日本	1.9	0.9	1.1		美国	2.1	2.4	1.9
	发展中国家	4.7	4.6	4.5		欧元区	1.5	1.7	1.5
	世界银行					日本	0.5	1.0	0.9
	世界	3.1	3.0	2.9	货物贸易量增速	世界贸易组织			
	发达国家	2.3	2.2	2.0		世界	4.6	3.0	2.6
	发展中国家	4.3	4.2	4.2		发达国家			
	联合国					出口	3.6	2.1	2.1
	世界	3.1	3.1	3.0		进口	3.3	2.5	1.9
	美国	2.2	2.8	2.5		发展中国家			
	欧元区	2.4	2.0	1.9		出口	5.6	3.5	3.4
	日本	1.7	1.0	1.4		进口	6.8	4.1	3.6
	印度	6.7	7.4	7.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²			
	英国共识公司					世界	5.3	4.0	4.0
	世界	3.2	3.2	2.9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9 年 1 月）；英国共识公司《共识预测》（2019 年 1 月）；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19 年 1 月）；联合国《2019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19 年 1 月）；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2019 年 4 月）。

注：1. 购买力平价法 GDP 加权汇总；
2. 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

应对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及外部环境恶化，我国仍需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外部风险应对能力，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责任编辑：沈家文

全球服务业市场开放国际规则 演变历程与趋势^{*}

杨玉英 任安娱

摘要：为深入研究我国新时期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思路、步骤和任务，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系统梳理了全球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形式和内容、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演变历程，并对全球服务业开放发展的趋势、国际规则演变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分析，对发达国家服务业开放的经验规律以及国际规则的演变特征进行了总结，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积累充分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服务贸易 市场开放 国际规则 演变趋势

作者简介：杨玉英，三亚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任安娱，广东新空间旅游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开放促进体制机制变革和产业发展，中国服务业呈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规模不断扩大、新动能快速成长的良好态势，服务业对外开放正成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随着国内外形势变化，我国服务业起步晚、底子薄、经验少，服务业质量、结构、效益有待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公共服务提供、垄断行业改革、科技研发创新等服务领域体制机制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凸显。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内外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内看，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面临新任务，服务业结构优化

^{*} 本文为三亚学院《“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课题研究成果。

升级面临新形势。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发展进入经济秩序重构时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趋势面临新挑战，我国扩大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对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一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服务业内部既有关系人民生活质量的消费者服务，也有支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生产者服务，还有关系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稳定的公共服务，“十四五”时期要建立起适应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要求、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品质优良的服务业供给体系，需要在开放条件下促进发展，也需要通过扩大开放满足多层次的生活服务需求，需要通过开放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业经验。二是“十四五”时期全球化收缩是大概率事件，全球贸易收缩势必影响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水平和服务贸易规模，影响服务业开放进程。这就要把握中国进入新常态的阶段特征，立足服务业提质增效，探索建立起适应国际新形势的新型服务业开放体系。三是“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要把握“一带一路”推进的有利时机，探索服务贸易新形势，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规模，培育服务业竞争新优势。本文梳理发达国家服务业开放发展的规则、演变历程和趋势，总结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

一、全球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国际规则发展历程

（一）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内容

传统的货物贸易以商品为核心内容在各国间进行交换。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后期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结构中服务的投入及成分比重加大，使生产过程形成软件化、信息化、柔软化的量变，最终质变为服务化（后工业化）。随着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支撑，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65%以上，但在其他国家这一比例却相差甚远。各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国际服务贸易成为可能，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国际服务贸易成为现实，服务贸易甚至推动国际竞争逐渐从资源和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知识和教育资源的比较优势。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分类，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小组在乌拉圭回合中期审评会议后，提出了以部门为中心的服务贸易分类方法，将服务贸易分为12大类，分别为：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和相关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与健康相关的服务和社会服务，旅游和旅游相关的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其他服务。^①

^①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服务贸易有哪些分类方法，分别是如何进行分类的》，http://www.chinaservice.org.cn/nd.jsp?id=72#fai_12_top，2017年10月26日。

（二）服务贸易规则的本质

国际贸易规则是全球贸易治理结构的发展基础，以贸易规则的创建为基础，各国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得以快速发展。贸易规则的载体，是某一区域乃至全球各国共同协商签订的国际贸易协定，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1947 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WTO。

国际贸易规则的本质是各国家间利益博弈的结果，其内容涵盖了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议题。近年来，投资、劳动、环境保护和竞争政策等议题也纳入到区域贸易规则的谈判中。国际贸易规则的内涵和谈判紧随着全球政治经济环境力量角逐而变化，其影响力开始逐渐深化，甚至影响到了全球经济治理的非贸易领域。“贸易是各国经济交流的主要渠道，贸易往来使一国的国内政策受到国际相关利益方的考量，使国际贸易规则从贸易领域更多地向各国传统的由国内政策管辖的领域延伸，这使近年来全球贸易治理规则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中的地位加强。”^①

（三）服务贸易国际规则的特点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规则相比，其交易标的具有多样性、无形性的特点。因此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原则的谈判涉及到更多的法律规定，除国内外的货物买卖法、合同法外，还要受各国及国际上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所管辖，包括工业产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垄断法、公平贸易法、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法等法律规范。

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原则的另一特点是更加注重边境后原则。边境后原则是指货物或投资进入一国关境之后面临的经营环境政策，包括但不限于非关税壁垒，包括技术贸易壁垒、环境措施、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② 边境后原则与服务贸易的投资与供应紧密相关，随着服务贸易在全球比重上升，其将成为服务业市场开放原则谈判的重中之重。

（四）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国际原则发展历史

1. 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原则发展的第一阶段（乌拉圭回合谈判）

20 世纪 30、40 年代，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各国在恢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经过多次谈判，美国等 23 个国家于 1947 年 10 月 30 日在日内瓦签订了 GATT，要求“实质性地降低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GATT 成为各国共同遵守的贸易准则，是当时协调国际贸易与各国经济政策的唯一的多边国际协定。

^① 东艳：《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第 45～64 页。

^② 泐国义：《如何看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动向》，《学习日报》2013 年 12 月 24 日。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发达国家尚未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世界贸易的主流是货物贸易。因此在 GATT 中，并没有明确将服务贸易作为重要议题，而是将关税壁垒问题作为 1947—1962 年前五轮谈判的核心。^① 这一时期建立的以消除对国际贸易活动的歧视性待遇的互惠、互利协定，奠定了二战之后世界贸易发展规则的基本原则。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1970 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仅为 710 亿美元，1999 年则高达 13400 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产业结构逐渐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因此在服务贸易开始腾飞的 20 世纪 80、90 年代，发达国家希望打开其他国家的服务业市场，以服务贸易顺差来弥补日益扩大的货物贸易逆差，推动经济增长。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重要作用引起了贸易协定谈判者的关注。因此在 1986—1993 年期间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问题被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新议题引入谈判，该回合最终达成了 GATS 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GATS 第一次为服务贸易提供了机制上的安排与保障。在市场开放原则方面，由于参与各方在服务业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各方谈判重点集中在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主要议题。GATS 对服务业市场开放最终采取了正面清单的方式，并允许发展中国家通过逐步自由化，使市场准入与各国的目标政策保持平衡。在协定条款中，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以及国民待遇等规则影响最为深远。

最惠国待遇：对于本协议的任何措施，每一缔约方给予任何缔约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其他任何成员的相同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与 GATT 不同的是，GATS 中该原则不仅适用于服务产品，还包括服务的提供者。^② 在 GATS 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最惠国待遇的使用也存在例外和豁免，并将最惠国待遇与各国关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具体承诺结合起来，使各国具体承诺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构成最惠国待遇的具体内容。

市场准入：指缔约方以其承诺清单中所列举的服务部门及其准入条件和限制为准，对其他缔约方开放其本国的服务市场。市场准入是一种经过谈判而承担的义务，实施对象既包括服务也包括服务的提供者。市场准入是 GATS 中的关键性条款，而其中的承诺表是各国在谈判的基础上达成开放市场的承诺。^③

国民待遇问题（National Treatment）：指每一成员方应在其承诺表所列服务部门或分部门中，依照表内所述的各种条件和资格，就所有影响服务提供的措施方面，给予其

① 东艳：《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第 45～64 页。

② 王春晖：《GATS 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电信业开放的若干问题》，《中国律师 2000 年会论文》，2000 年。

③ 王春晖：《GATS 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电信业开放的若干问题》，《中国律师 2000 年会论文》，2000 年。

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低于他所给予本国国内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GATS 中的有关国民待遇的内容并不像最惠国待遇那样纳入普遍义务原则，而是采取具体承诺的方式，仅仅用于一国作出具体承诺的服务部门。

GATS 为之后服务业市场开放基本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服务贸易的发展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技术与新服务，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危机感也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态度也从抵制转变为逐步接受。必须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如果不积极参与到服务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和谈判中来，就只能被动接受更倾向于发达国家利益的相关规则，在之后的国际竞争中将承受更大的利益损失。

2. 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原则发展的第二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在服务贸易结构上，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以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为主，如金融、电信、数据处理、保险等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多为旅游、劳务等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在服务贸易领域存在着激烈竞争。^① 2001—2005 年期间 WTO 的多哈谈判旨在继续削减贸易壁垒，但由于参与方众多且利益不同，导致多边框架下的服务贸易谈判难以为继。^② 发达国家希望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市场准入和更多的国民待遇，并要求在一些敏感产业（金融、电信）等实现全面自由化。基于此，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旨在吸纳更多 WTO 成员参与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的谈判（TISA），最终谋求在 WTO 框架下的多边适用，以改善 GATS 对全球服务贸易的治理；二是基于区域贸易安排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重构了新一代服务贸易国际规则，追求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并在意愿一致的成员之间先行先试。

从时间上看，区域性的贸易谈判早于 TISA 的谈判。在 2002 年，TPP 的前身就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到 2009 年美国正式宣布加入 TPP 谈判，借助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全方位主导 TPP 谈判。2017 年美国退出 TPP，剩余 11 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秘鲁）在 2018 年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名称为“全面且先进的 TPP”（CPTPP）。该协定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生效。

^①韩玉军：《世界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兼评中国服务业的开放与对策》，《国际贸易》2006 年第 10 期，第 39～45 页。

^②张悦：《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演进中的角色变迁》，《贵州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第 111～116 页。

TTIP 则可以追溯到更远。欧美之间跨大西洋自由贸易的理念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经产生, 90 年代《跨大西洋新纲要》和《新跨大西洋市场计划》是这一理念的具体推进, 但由于当时美欧双方对 WTO 的高度关注, 双方并未就此持续推进。直到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之后, 双方终于在 2013 年下定决心重新推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的新型伙伴关系。TTIP 的推进对于双方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发展, 更重要的是掌握在世界贸易发展中的话语权。根据 2017 年的《欧美 TTIP 进展联合报告》,^① 双方谈判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 交换关税减让出价, 97% 的关税将被消除, 且大部分会在协定生效之日实施, 或在很短的过渡期后生效; 明确了减少企业不必要负担和跨境货物延迟问题的路径; 就协定包括保护环境、基本劳工权利的义务达成一致, 强调欧美伙伴关系需要支持更高的劳工保护和环保标准; 一致同意协定包含中小企业章节, 促进网上信息交流和建立欧美合作新机制; 就贸易救济措施、竞争政策的程序和透明度的重要性达成一致。

TISA 的谈判开始于 2012 年, 由美国与澳大利亚等 WTO 服务业真正之友集团 (RGF) 展开。与 TPP 和 TTIP 这两大强调区域自由贸易的协定相比, TISA 更注重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到 2016 年底, TISA 已经进行了 21 轮谈判, TISA 谈判内容以及文本并不对外公开, 外界仅能从欧盟的相关报道中了解谈判进程及部分内容。目前来看, 其重点谈判的领域包括金融服务、通讯服务、电子商务、国内管制、“模式四”相关问题 (模式四指的是自然人跨境流动的相关问题)、海陆空运输服务。

就亚太地区而言, 除 11 国已经达成的 CPTPP, 东盟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也是区域内重要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2017 年以来, 始自 2012 年的 RCEP 谈判进程开始全面“提速”。在 2018 年的第 6 次部长级会议中, 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力争在 2019 年达成最终协议。

二、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演变的影响因素

(一)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对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提出新挑战

自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 世界货物贸易持续低迷, 而服务贸易增速明显加快, 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 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产生巨大变化。有学者认为, 新兴经济体崛起所引发的全球贸易主导力量的变动, 以及由此引发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经济运行中价值观念的差异和冲突, 都对现有的全球经贸治理体系结构

^①资料来源:《欧美联合公布 TTIP 进展报告》, 新浪网, 2017 年 1 月 26 日。

提出严峻考验。^①

对于以欧美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一方面一直强调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角色，试图捍卫其在全球贸易治理结构中的领导权，坚持其建立的“开放、公平、自由”的贸易规则体系。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普遍认为新兴经济体对其传统贸易竞争优势构成威胁，认为新兴经济体成为先行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热衷于“搭便车”，并且以多种形式扰乱了国际贸易经济秩序。^②因此，发达国家强烈热衷推动国际经贸体系的重塑，其目的是要求新兴经济体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并巩固和保障自身优势地位。

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则希望切入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改变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不再是单纯的规则接受者，而是具有一定发言权的规则制定者。长期以来，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对外开放是基于劳动密集型资源与全球制造业资本的融合，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互联网、新智能以及由此催生出的制造业服务化概念创造了改变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渠道与可能。^③

虽然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均有着重塑国际贸易治理体系的诉求，而基于 WTO 框架下的国际贸易治理体系，采用“一个成员国、一个投票权”的协商一致原则，这样的多极化治理框架，调整极其缓慢，不再适应新兴经济体崛起的经济贸易格局。

（二）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对传统国际贸易规则提出新要求

传统的贸易模式以货物贸易为主，以商品作为消费品在国家主体间进行交换。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及运用，全球经济的产业分工及价值链愈加一体化，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逐步构造了新型的全球贸易模式，即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商品、投资、服务、知识、数字信息以及人员要素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跨境流动，这种模式中国家之间联系合作更加紧密，利益相关性更高，生产环节紧扣。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要求有更加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来规范和应对新兴的贸易模式中产生的问题。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WTO 多边贸易框架停滞不前，叠加近三年来冲击欧美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国际经济贸易政策更难协同，表明全球价值链与多边贸易规则发展从根本上难以匹配。^④

①东艳：《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第 45～64 页。

②杨广贡、杨正位：《全球经贸体系重塑的动因、趋势和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1 期，第 121～131 页。

③张悦、崔日明：《服务贸易规则演变与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开放经济》2017 年第 5 期，第 39～43 页。

④管传靖：《全球价值链扩展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外交评论》2018 年第 6 期，第 35～75 页。

全球价值链模式下的全球贸易意味着新型的贸易商品。以数字产品产业为例，其对于全球价值链具有颠覆性影响，而数字产品在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的归类至今存在争议，GATS 中没有数字产品概念，也没有专门的数字产品贸易规则。基于数字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数字产品贸易规则的制订成为国际贸易新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有些学者认为 21 世纪的贸易规则说到底就是数字贸易规则。^①

总而言之，全球价值链的崛起，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本质。多哈谈判中，各国的关注点还局限在农产品补贴、关税减让等贸易问题，与如今的全球价值链下催生的贸易模式已经开始脱节，传统规则已经无法协调基于互联网的服务贸易，需要各国实现国内规则的一致性与互融性，国际贸易规则的边界向边境内扩展。因此，亟需新的贸易规则来规范与协调全球贸易发展。

（三）全球化新问题出现，对现有规则覆盖范畴提出新需求

除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诸如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站、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门类对现有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带来的新要求之外，知识产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人权、反腐败、劳工等多方面问题也逐渐与经济贸易相关联，成为经济贸易谈判的新的焦点问题，越来越多的问题没有被现存规则覆盖。这些问题亟需被解决，同时这也是经济体国家竞争的动力之一，希望在新兴领域占据制度优势，以抢占竞争优势。

三、国际服务贸易未来规则演变的趋势

（一）新规则涵盖范围广，涉及标准高，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和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出现了新的加速发展的趋势。美欧积极推动的 TTIP 以及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等成为其打造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区域主义”代表，谈判所涉及到的高标准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措施成为新一轮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主题。^② 服务贸易规则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水平提升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在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的行业范围，并提出更高要求。一些高端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被逐步解决，在 CPTPP 和 TTIP 中，都对该些行业部门的敏感性进行承认，同时逐步解决包括会计咨询、软件设计、影视娱乐、金融保险、医疗药品

^①沈玉良、金晓梅：《数字产品、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规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第 90～99 页。

^②张悦、崔日明：《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演进中的角色变迁》，《贵州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第 111～116 页。

等在内的高端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①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也被新的贸易协定覆盖，同时规则中还相应地对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等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比如新规则中加入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知识产权）、延长著作权的保护时间、规范临时性的侵权行为等高要求条款。^② TISA 谈判中还特别强调所有企业在市场准入能力方面都不得受到限制和歧视。^③

其次，服务贸易提供模式更加广泛。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原先 GATS 框架中的四种服务贸易提供方式，占主要份额的商业存在提供模式，已经逐步被跨境提供的模式取代，成为主要服务贸易提供方式，这主要得益于互联网为媒介的科学技术的进步。面对这一新的发展形势，TISA 在 GATS 的基础上增加了新规则和市场准入承诺，而且特别强调，不应预先排除任何部门和服务提供模式，尤其提出服务贸易提供模式四的自然人移动，指出在签证、办理流程以及国外居留时间等方面应给予商务访客、专家、相关技术人员及公司内部调任人员更大的便利性。^④

再次，更高标准的一般义务。TISA 谈判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承诺方式上采取了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混合形式，即市场准入采取“正面清单”的模式，国民待遇采取“负面清单”的模式。^⑤ 这一举措使得国民待遇原则在新的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中转变成为近于“一般义务”原则，意味着一成员除非在其国民待遇承诺中明确排除相关部门或做出保留，否则就有义务在所有服务部门给予外国服务和提供者普遍国民待遇。TISA 还采用了“棘轮条款”，使得现有自由化水平被锁定，未来自由化水平只能更高。CPTPP 也力推准入前国民待遇 + 负面清单原则：要求给予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限制政府对服务部门本地化的强制要求，除清单明确列出的经济部门外，其余部门都予以开放。

（二）边境内规则成谈判焦点，呈现国际经贸由边境开放向边境内开放发展趋势

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关注商品或投资进入关境后所面临的经营及商业竞争环境。主要的边境后谈判议题包括：一致监管、竞争中立、知识产权、可持续发展等。^⑥

①祝明侠：《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及我国的因应对策》，《烟台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第 114～122 页。

②张萍：《服务贸易规则重构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世界经济和贸易》2017 年第 6 期，第 24～33 页。

③张悦、李静：《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演变新趋势与我国的对策》，《经济纵横》2017 年第 5 期，第 123～128 页。

④张悦、崔日明：《服务贸易规则演变与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开放经济》2017 年第 5 期，第 39～43 页。

⑤杜琼、傅晓冬：《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的进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外资经贸》2014 年第 11 期，第 24～26 页。

⑥刘志中、王曼莹：《国际经贸规则演变的新趋势、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经济纵横》2016 年第 6 期，第 106～110 页。

首先,“竞争中立”是关于服务贸易边境后措施的核心问题,在 CPTPP 等谈判中,发达国家,之前以美国为主,日益关注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问题。竞争中立是指不受外来因素干扰的市场竞争,旨在重新规划现存国际经济规则或制度,从而保证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实现公平竞争,它包括税收中立、债务中立、规则中立。该政策主要是为了规范国有企业,要求国有企业应保持企业股东、组织架构等信息的透明度,政府应在国民待遇基础上公平对待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尤其是在税收、信贷、采购等政策方面。“竞争中立”原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是国际贸易投资市场的未来朝向,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竞争无法逾越的规则。^①

其次,关于监管的一致性,是指国际经贸伙伴国监管体制和标准的一致性。国家间由于监管体制和标准的不同,会极大地提高国际贸易的成本,商品或服务需要经过多重审核才能进入对方的市场,尤其是涉及与卫生、健康有关的行业。TTIP 谈判中,其重点内容之一就是监管一致性,强调推动削减监管分歧、减少贸易壁垒、提高透明度。为此,各国政府要加强监管合作,在产品测试、认证、动植物检验检疫等方面削减或调整监管差异,减少贸易障碍,降低贸易成本。

再次,关于知识产权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博弈的关键议题,在 TRIPs 协定签订后,知识产权保护就纳入到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随着签订时间的推移,发达国家认为 TRIPs 的标准过低,于是在 2010 年达成的《反假冒协定》中对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提出更高要求。另外,近年来国际贸易中单边主义不断抬头,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盛行,知识产权保护引发的贸易纠纷不断增加。^②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则将成为未来经贸规则谈判的重要内容。

最后,关于可持续发展规则。一些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利用环境后发优势、较低的环境成本、较低的劳工成本等条件,对其造成了“绿色倾销”“社会倾销”,因此发达国家积极要求在新的贸易治理体系中纳入关于环境、劳工、气候变化、碳排放等方面的条款。发达经济体在自贸协定中不遗余力的约束可持续规则方面缔约方的国内政策,CPTPP 还设立了惩罚机制。^③

①刘静:《TPP“竞争中立”规则对我国国企的冲击及对策》,《宜宾学院学报》2016年第16期,第68~71页。

②李楠、黄卫平:《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个研究综述》,《现代管理科学》2018年第1期,第6~8页。

③杨广贡、杨正位:《全球经贸体系重塑的动因、趋势和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1~131页。

（三）新规则将进一步强化发达经济体竞争优势，规则制定权争夺战将长期持续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积极推动新的国际经贸治理体系，以促进其经济增长，保障本国就业。更重要的是，通过构建对发达经济体有利的治理体系，重构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对新兴经济体影响力进行抑制，以维持发达经济体的国家经济竞争力，占领国际竞争制高点。

一方面，在区域性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力争将其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领域扩大市场准入，占据先发优势，引领行业的全球技术标准，令新兴经济体作为后进入者，很难逾越已形成的标准。另一方面，在与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的电信、金融、物流、专业服务、人员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业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长期居于优势地位，谈判平台已脱离 WTO 框架下的 GATS，谈判由多边转向双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在利益相同或相近的国家之间建立区域和超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来扩大谈判议题，提高规则标准，以此固化其在全球产业链和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①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新规则的高标准将超越其发展水平，因此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制定，极力避免在未来新一轮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中被边缘化。目前，以中国及东盟推动的 RCEP 突出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过程中的博弈。短时期内，新兴经济体还难以形成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议程设置能力，在国际经贸规则，特别是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中仍然总体上处在被动防守自身利益多、积极进攻争取利益少的局面。从这个方面来看，在新一轮的服务贸易规则谈判中，新兴经济体国家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两者之间的博弈将会长期存在。

四、服务贸易国际规则变化与中国的应对

（一）美国主导的服务贸易三大协定谈判进展缓慢

服务贸易正在推进的三大协定的谈判均以美国为主导，是美国推动世界服务贸易规则变革的三大举措，以确保其在下一轮国际规则重建中的中心地位，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排除在谈判之外。^② TPP、TTIP、TISA 均对服务业提出了相较于 GATS 更为高规格、高标准的开放要求。例如，TISA 要求全部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取消设立合资公司的各种要求。TTIP 强调推动削减监管分歧、减少贸易壁垒、提

^①陆燕：《美欧谋求自贸协定对世界经贸的影响与中国应对策略》，《国际贸易》2014 年第 2 期，第 49～52 页。

^②刘旭：《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建议》，《全球化》2014 年第 9 期，第 39～47 页。

高透明度。此类服务贸易的新规则将在各参与国中率先施行，并逐步扩大影响，甚至可能独立于 WTO 之外，成为新的世界服务贸易主要规则。

但随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2017 年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特朗普总统以美国的单边主义为突出代表，以公平贸易为核心诉求，以“双反”“301 条款”“337 条款”等非关税措施为主要手段推动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① 受此影响，加之美欧双方面临着各国国内大选、谈判议程重置等问题，TTIP 谈判目前进展缓慢。

（二）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

面对单边主义的挑战，我国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在亚太地区积极推进 RCEP 的谈判，在当前国际形势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上升的背景下，对外发出支持基于规则的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明确信号，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全球化。面对多变的国际局势，我国的服务业发展必须遵循对外开放的大趋势，并有必要对以上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新协议保持关注。一方面要利用自身市场规模优势，积极关注、参与新的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要持续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作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国内服务业加速健康发展。此外，要鼓励企业的服务出口，以主动姿态迎接国际化竞争。

（三）进一步推进服务业市场扩大开放

目前，我国服务业开放的名义水平较高，在 WTO 设定的 160 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中国已经开放 100 多个。但从实际开放水平看，中国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与生活服务业，技术服务领域较为迟缓。其部分原因是我国在外资进入形式、股份比例、业务范围、资质门槛等方面管制较多，同时国内在知识产权保护、外资服务配套政策等方面有一定滞后。但目前这些情况都在发生积极改变。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随着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将上升。同时，在构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中，未来我国有必要大幅度减少市场准入限制。通过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开放，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通过逐步扩大教育、文化、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丰富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通过积极稳妥推进金融领域开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通过“一带一路”持续推进中国服务业的“走出去”，使中国经济更好地融入世界。

^①郝洁：《美国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逻辑》，《中国发展观察》2018 年第 10 页。

参考文献:

1. 东艳:《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 1 期。
2. 冼国义:《如何看国际经贸规则的新动向》,《学习日报》2013 年 12 月 24 日。
3. 王春晖:《GATS 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电信业开放的若干问题》,《中国律师 2000 年会论文》,2000 年。
4. 韩玉军:《世界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兼评中国服务业的开放与对策》,《国际贸易》2006 年第 10 期。
5. 张悦:《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演进中的角色变迁》,《贵州社会科学》2018 年第 2 期。
6. 郝洁:《美国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逻辑》,《中国发展观察》2018 年第 10 期。
7. 《欧美联合公布 TTIP 进展报告》,新浪网,2017 年 1 月 26 日。
8. 杨广贡、杨正位:《全球经贸体系重塑的动因、趋势和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5 年第 1 期。
9. 张悦、崔日明:《服务贸易规则演变与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开放经济》2017 年第 5 期。
10. 管传靖:《全球价值链扩展与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外交评论》2018 年第 6 期。
11. 沈玉良、金晓梅:《数字产品、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规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
12. 张悦、崔日明:《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演进中的角色变迁》,《贵州社会科学》2018 年第 3 期。
13. 祝明侠:《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及我国的因应对策》,《烟台大学学报》2015 年第 6 期。
14. 张萍:《服务贸易规则重构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世界经济和贸易》2017 年第 6 期。
15. 张悦、李静:《国际服务贸易规则演变新趋势与我国的对策》,《经济纵横》2017 年第 5 期。
16. 杜琼、傅晓冬:《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的进展、趋势及我国的对策》,《外资经贸》2014 年第 11 期。
17. 刘志中、王曼莹:《国际经贸规则演变的新趋势、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经济纵横》2016 年第 6 期。
18. 刘静:《TPP“竞争中立”规则对我国国企的冲击及对策》,《宜宾学院学报》2016 年第 16 期。
19. 李楠、黄卫平:《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个研究综述》,《现代管理科学》2018 年第 1 期。
20. 陆燕:《美欧谋求自贸协定对世界经贸的影响与中国应对策略》,《国际贸易》2014 年第 2 期。
21. 刘旭:《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建议》,《全球化》2014 年第 9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中国提出加入 CPTPP 的可行性与 实施策略分析*

刘向东 李浩东

摘要：2017 年美国退出 TPP 后，日本等 11 个成员国继续推动 CPTPP 谈成生效，部分成员国期望中国能适时加入，中国政府对此持开放态度。有智库提议中国应尽早准备加入，有学者也担心加入会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从发展趋势看，加入 CPTPP 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但当下仍面临着诸多的规则挑战。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改革开放大局，提出加入时既要处理好与推进 RCEP 和维护 WTO 规则的关系，还要与日本等成员国保持密切沟通，并在国内处理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关系。加入 CPTPP 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亟需明确实施策略和路线图，如采取并行推进双边和多边 FTA 的谈判策略，加快推进 RCEP 谈判和 WTO 现代化改革，积极为参与 CPTPP 谈判腾出空间，争取日本等成员国的理解和支持，加快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 BIT 或 FTA 谈判。

关键词：CPTPP 自贸协定 经济伙伴关系 谈判策略 路线图

作者简介：刘向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李浩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2017 年初，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日本、澳大利亚等其他 11 个成员国继续推进这一协定谈判，并将其更名为“全面且先进的 TPP”（简称 CPTPP 或 TPP11）。2018 年底，CPTPP 在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墨西哥和新加坡六国正式生效。2019 年以来，越南、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和秘鲁逐步完成内部审批程序

* 本文为 2018 年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基金重大课题《我国适时提出加入 CPTPP 可行性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并开始执行该项协定。扩容谈判也被提上日程，泰国、韩国、英国、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等国有意愿加入。目前看，支持中国加入 CPTPP 的呼声此起彼伏，已有机构对中国加入的可行性开展研究。笔者认为，中国适时提出加入 CPTPP 时机窗口临近，有必要抓住有利时机接触沟通，主动对标，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构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一、各方对中国提出加入 CPTPP 的态度

美国主导 TPP 谈判时，各方对中国加入 TPP 的态度较消极，普遍分析美国不会让中国参与 TPP 的谈判。当美国退出 TPP 后，各方对中国加入 CPTPP 的态度有所分化，有的认为中国加入的可行性较大；还有的认为中国加入尚面临内外部诸多障碍，短时期内加入的可能性较小。

（一）部分成员国对中国加入 CPTPP 持欢迎态度

对中国申请加入 CPTPP，其成员国的心态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都持有正面态度，至少不会特别反对。当前已有部分成员国对中国加入持欢迎开放态度。如澳大利亚、智利等曾发出过邀请。如在美国退出后的 TPP 成员国会议上，智利等成员国就曾邀请中国作为观察员国家参与。日本官方并未表态欢迎中国加入，但日本国内对中国加入并不持否定态度，也有不少支持者。如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就持欢迎态度。近期，日本经济产业省通商交涉官筱田邦彦认为，中国申请加入是个感兴趣的话题，中国如有兴趣提出申请，他可以向政府传达。新加坡虽认为中国的加入为时尚早，但也对此持开放态度，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曾表示，日本应率先邀请中国加入。

（二）中国政府对加入 CPTPP 持积极态度

自由贸易优于保护主义是目前经济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虽然经济全球化能很好地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效率，但是并不总能很好地解决一国经济的公平发展问题。对中国加入 CPTPP 而言，能否帮助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是是否提出加入的重要考量之一。^① 从官方表态看，中国政府始终欢迎 TPP/CPTPP 等促进构建自由开放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安排。早在 2015 年 8 月，时任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就表示，亚太地区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谈判的自贸协定，包括 TPP，均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路径，是为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② 2018 年初，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不管

^①周睿：《中国加入 TPP 的经济效应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 年第 2 期。

^②人民网：《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1009/c1004-27674458.html>。

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还是 CPTPP，只要顺应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向，符合透明、开放、包容原则，有利于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方都持积极态度。^① 近期，商务部在回应中国是否考虑加入 CPTPP 问题时表示，对于推动区域 FTA 安排相关的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只要符合 WTO 的原则，开放、包容、透明、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都持积极态度。^②

（三）国内学界关注 CPTPP 带来的影响

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CPTPP，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是持赞成态度。中国应加入 CPTPP 这样高标准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使其成为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③ 理由在于中国主动提出加入 TPP/CPTPP 可以缓解由其带来的负面影响。^④ 二是持不赞成态度。中国可以加快推动 RCEP、中日韩自贸区（FTA）乃至亚太自贸区（FTAAP）等多边贸易机制，应对 CPTPP 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理由是 CPTPP 的生效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小，通过推动 RCEP 生效可以抵消 CPTPP 带来的不利影响。^⑤ 另外，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也能大幅缓解 TPP/CPTPP 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带动中国高耗能行业出口。^⑥ 三是开放心态看待 CPTPP。自由贸易是个发展的过程，各个经济体发展阶段不同，其适应和接受的 FTA 标准也存有差异。CPTPP 作为高标准的多边贸易协定，有其借鉴和参考之处，中国应转变观念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看待。^⑦

（四）国内智库建议中国应尽早加入 CPTPP

国内有智库提出，中国抓住美国退出 TPP 的有利时机，适时提出加入 CPTPP，尽早实现新一轮的高水平开放。例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提出，在与推进 RCEP 等自贸区战略不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应适时提出加入 CPTPP，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于 2019 年初发布《CPTPP，中国未来自由贸易发展

①人民网：《王毅回应“新版 TPP”中国维护以 WTO 为核心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308/c1002-29856169.html>。

②观察者网：《当前中国要推动 RCEP，还应加入 CPTPP？商务部回应》，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18_10_18_475992.shtml。

③孙玥：《TPP 到 CPTPP：背景、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商业文化月刊》2017 年第 33 期。

④王孝松、何欣悦：《TPP 达成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探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 年第 3 期。

⑤王孝松、武皖：《CPTPP 建立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探究》，《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 年第 3 期。

⑥崔连标、洪雪雯、宋马林：《“一带一路”倡议能否缓解 TPP 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财经研究》2018 年第 8 期。

⑦樊莹：《CPTPP 的特点、影响及中国的应对之策》，《当代世界》2018 年第 9 期。

的新机遇》提出，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积极接触使得中国早日成为这一更高标准自贸体系的成员。^①

二、中国加入 CPTPP 的主要利弊分析

CPTPP 涵盖了 11 个成员国拥有 5 亿多人口的低关税和高水平开放的经济区域，其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 13%、贸易总量占到全球贸易量的 15%（见表 1）。若中国不考虑加入，由此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对中国不利。CPTPP 保留了 TPP 大多数的高标准条款，但毕竟冻结了 22 条门槛较高的条款，增强了其扩容的吸引力。随着国际贸易形势的复杂变化，中国应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出发适时提出加入的可行性，权衡加入的利弊和时机，做出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的抉择。

表 1 CPTPP 和 RCEP 涵盖区域情况比较

		CPTPP	RCEP
人口（百万人）		499（7%）	3495（46%）
GDP 总和（十亿美元）		9838（13%）	22878（31%）
贸易总额（十亿美元）	出口	2548	5166
	进口	2597	4667
占全球贸易份额（%）	出口	17	30
	进口	15	27
占亚太贸易份额（%）	出口	40	81
	进口	44	79

数据来源：摘自 ESCAP, *Asia – Pacific Plurilateral Trading Blocs: intra – and extra – bloc trade trends*, APTIAD Briefing Note, June 2018。

（一）加入 CPTPP 符合中国发展整体利益

当前，中国通过深入参与国际市场已成为自由贸易的实践者、维护者和引领者，中国已有条件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有意愿建设促成高水平的开放格局，有能力抵御当下泛起的各类保护主义，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一是提升中国整体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适时提出加入 CPTPP 有助于改善中国发展

^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PTPP，中国未来自由贸易发展的新机遇》，[http://www.ccg.org.cn/Event/View.aspx? Id=10552](http://www.ccg.org.cn/Event/View.aspx?Id=10552)。

的外部贸易条件，提高中国制造产出水平和扩大进出口规模，^① 提升中国自由贸易整体发展水平，推动自贸区战略目标的尽早实现，促使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变得更加顺畅，乃至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二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冲击。在美国退出 TPP 的情况下，中国如能在确保 RCEP 谈判进程的前提下启动加入 CPTPP 谈判，不仅能够免受冲击，还能获得加入带来的额外增长。据测算，由于美国退出 TPP，中国出口受到冲击由原来的 0.89% 下降到 0.29%；中国进口受到的冲击会由原来的 1.92% 下降到 0.47%。^② CPTPP 签署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降 0.2%，CPTPP 之外签署 RCEP 则会部分抵消 CPTPP 的冲击。^③ 倘若选择加入 CPTPP，中国对日本、东盟、北美地区的机电产品出口将会增加，消除不加入带来贸易转移影响。如果选择不加入，日本将成为主要贸易转移方向，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会出现下降。^④

三是借鉴先进规则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CPTPP 建立了高标准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规则，中国选择加入后，客观上会倒逼中国改革原有对外贸易投资规则和机制，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例如，中国需要遵循 CPTPP 中有关电子商务相关条款，在确保保护个人信息等合法公共政策目标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确保全球信息和数据自由流动，禁止对电子传输征收关税，以驱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确保个人隐私和其他消费者权益在 TPP 缔约方市场得到充分保护。^⑤ 选择加入意味着还要落实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的商业规则，以消除其他成员国对中国国有企业不公平竞争的疑虑和担忧。这可借鉴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有企业经营经验，保证国有资产不受损害。^⑥ 此外，中国也有必要借鉴 CPTPP 条款，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进行微调。^⑦

①赵灵翡、郎丽华：《从 TPP 到 CPTPP：我国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模拟研究——基于 GTAP 模型的分析》，《国际商务》（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

②张璐、展金永：《CPTPP 和 RCEP 对亚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效应差异研究——基于 GTAP 模型的分析》，《亚太经济》2018 年第 3 期。

③Kawasaki, K. *Economic Impact of EPAs beyond TPP11, Policy Analysis Focus 18-2*,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GRIPS), 2018, <http://www.grips.ac.jp/cms/wp-content/uploads/2018/07/PAF18-2-Economic-Impact-of-EPAs-beyond-TPP11.pdf>.

④许培源、朱金芸：《TPP 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潜在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16 年第 9 期。

⑤李斌：《互联网环境下跨境数字化产品海关估价征税的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

⑥王芳：《CPTPP 投资规则对中国外资政策的启示》，《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 年第 2 期。

⑦朱秋沅：《中国视角下对 TPP/CPTPP 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条款的考量及相应建议》，《电子知识产权》2018 年第 3 期。

（二）加入 CPTPP 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当前，中国构建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正在瞄准更高标准和更大范围发展。现实情况看，中国自贸区战略尚面临三方面问题：一是自贸区总体层次不高，二是实际经济效益比较有限，三是区域深度一体化发展有限。^① 作为高标准范本的多边贸易协定，CPTPP 设定的规则更容易被发达国家所接受。作为后来进入者，中国加入将可能面临较强的规则约束，倒逼国内改革开放，也可能会对现有区域合作机制构成竞争挑战。

一是不具有规则调整的议价能力。由于 CPTPP 已生效实施，其扩容计划不会让后来者通过谈判修订已达成的规则。中国要加入，就需要遵循现有规则要求，很多规定与中国现行的政策法规不符，要求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在关税减让、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自由流动等多方面法律政策框架做出调整。这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能做出适应性调整，而不能参与规则议定。

二是知识产权立法和政策实施成本加大。当前，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上与 CPTPP 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要求仍有一定距离。对比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 CPTPP 的相关条款要求，可以这些条款划分为持平条款、追赶条款和距离条款三类。持平条款说明中国已做到或实行；追赶条款说明中国虽暂时尚未有相关规定，但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距离条款意味着中国既没有相关规定，依照现实条件也是很难实现的。^② 例如，CPTPP 对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就是追赶条款。具体来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驰名商标进行了跨类保护，但是并没有对未注册驰名商标进行跨类保护，^③ 中国现有保护标准与 TRIPS 的最低标准一致，但是距离 CPTPP 的要求还有距离。在国有企业和互联网开放方面，中国现有标准与 CPTPP 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如 CPTPP 要求各缔约国要相互分享各自国有企业的信息，以消除国家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要求禁止或限制对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或优惠待遇；禁止国有企业向其他地方企业提供优惠；要求确保跨境数据自由流、保证互联网自由开放及禁止地方性规定等。

三是对中国参与的其他多边框架构成一定挑战。相较于 CPTPP 的强约束力，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软约束力的机制，CPTPP 势必会削弱 APEC 成员国间的凝聚力，对中国区域贸易发展形成挑战。^④ CPTPP 与 RCEP 覆盖区域有大量重合，除美国之外的亚太地区主要发达经济体基本都涵盖在内。如果中国启动 CPTPP 谈判，可能会动摇东盟国

①朱福林：《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现状、趋势与战略思路》，《全球化》2015 年第 10 期。

②郭雨洒：《TPP 最终文本之 TRIPS—PLUS 条款探究》，《电子知识产权》2016 年第 1 期。

③黄洁、陈香凝：《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研究》，《理论观察》2018 年第 8 期。

④余盛兴：《TPP 非贸易因素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WTO 经济导刊》2018 年第 7 期。

家对中国推进 RCEP 谈判信心，影响到 RECP 谈判进度。

四是一定程度上冲击中国的弱势或幼稚产业。加入 CPTPP 后意味着零关税大市场，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和电子信息行业将会受到一定冲击。日本在机电产品制造等领域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而中国相关产业的竞争力还不强，在外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可能濒临破产倒闭，而有些加工制造业可能会加速转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例如，零关税情况下，日本汽车具有竞争优势，对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的销售会有负面影响。

三、中国提出加入 CPTPP 的实施策略和建议

作为 CPTPP 非初始成员国提请加入，中国参与 CPTPP 谈判意味着更多地合规性审查，可能要经历较长过程。中国官方并不排斥高标准的 CPTPP，而是愿意主动对标 CPTPP 的高标准条款。笔者分析的结果是当前中国研提加入 CPTPP 时机较好，可能是解决国内外复杂经贸问题的一条路子，有必要趁此机会加快可行性研究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为参与和适应新一轮的 WTO 规则改革提供支撑。

（一）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目前看，中国对加入 CPTPP 并不排斥，而且持开放的态度。这其中既有对加入的利弊和条件成熟度评估的考虑，也有处理好与加入其他双边多边自贸区安排的优先顺序和轻重缓急，也要平衡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一体化的关系。包括处理好 CPTPP 与 RCEP 和 WTO 等多边机制的关系，处理好国内改革与区域开放对接的关系，以及处理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之间的关系。

一是处理好推进 CPTPP 与 RCEP 谈判的关系。之前，中国自贸区战略的路线图是优先推动并早日结束 RCEP 谈判，加快 FTAAP 和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若中国另起炉灶，同时主动申请加入 CPTPP，可能会拖慢 RCEP 谈判进程，引发东盟等成员国的不满。宣布申请加入之前，中国应处理好多边自贸区谈判的优先时序，统筹考虑，不要打击到 CPTPP 和 RCEP 谈判成员国的积极性。为了抵御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带来的冲击，RCEP16 个谈判成员国政治意愿非常强烈，在双边、多边场合形成共识，提议要加快 RCEP 谈判进程，尽早完成主体内容谈判。CPTPP 在现已生效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进行扩容，将会对 RCEP 的谈判起到促进作用。研提加入并不意味着立马就要加入，要有一个较漫长的谈判过程。对于 RCEP 的谈判，适宜的做法是分阶段处理，先就贸易投资等主体内容达成谈判，有关劳工和环境标准、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核心议题可以采取打补丁的方式逐步完成。发达经济体都希望达成更高水平的 RCEP，特别是向 CPTPP 的高标准看齐。鉴于当前阶段各成员经济发展阶段和国内市场成熟度的差异，

达到全面高质量的协定尚有难度。在前期完成阶段性协定的基础上，应进一步针对具体领域如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升级谈判，使其更适应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规则。在推动谈判方面，可以创新谈判方式，如在具体领域或地区先行先试，针对服务贸易可以限定在某个经济特区内，推进 RCEP 成员国中没有建 FTA 国家的相互开放高水平开放市场，如中国—印度，中国—日本，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二是处理好加入 CPTPP 与维护 WTO 规则的关系。随着美欧发表零关税联合声明和日欧签署零关税自贸协定，占全球经济总量 55% 以上的美欧日有望达成零关税同盟。面对新一轮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贸易规则重塑，中国始终坚持推动以 WTO 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与欧盟共同推动 WTO 规则升级更新，支持 WTO 进行必要的改革但不期望推倒重来，特别是坚持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关税约束、透明度、特殊与差别的待遇原则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总体方向。中国主动顺应国际贸易高标准发展方向，积极参与 CPTPP 等区域多边 FTA 谈判，使两者并行不悖。倘若区域多边贸易规则突破 WTO 核心原则，对加入区域多边 FTA 安排就要谨慎行事，如在边境税收调节规则上虽要促进各经济体提供平等竞争环境，但也得使国内企业产品出口不用承受双重征税压力。考虑到 CPTPP 已冻结了 22 项条款，而且与 WTO 的基本原则并不冲突。提出加入 CPTPP 并不会违背 WTO 的核心精神，反而为 WTO 规则的改革提供了小范围内的试验样本。适时提出加入 CPTPP 将会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中国坚决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也可以借机了解发达国家对 WTO 规则改革的动向。

三是处理好与日本等利益相关国家的关系。美国退出 TPP 后，日本实际上是 CPTPP 的主要推动者。随着中日关系逐步转好，中日都表示要捍卫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共同立场，维护以 WTO 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在此共同利益驱动下，日本至少不会完全排斥中国提出加入 CPTPP 的意愿。表达加入 CPTPP 意愿之前，中国应积极做好与日本的沟通和交流，摸清日本的态度和要价，努力取得日本的理解和支持。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 CPTPP 中的发达经济体都有高标准的诉求，而且在推动 CPTPP 上表现比较积极。目前，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已有双边 FTA，并且已经商谈升级的可能性，而与加拿大商谈也在探讨推进 FTA 谈判的可能性，为此借助双边 FTA 谈判的经验，中国可以争取在提出加入 CPTPP 方面的认可和支持。此外，还需处理好与 CPTPP 中发展中成员国的关系。CPTPP 谈判结果基本保障了发展中经济体的核心利益及获得更多保留和灵活性，如越南、马来西亚等发展中经济体享有相应的例外条款，比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中国应借鉴他们的谈判策略，争取在国有企业等相似议题上获得相应的例外条款。根据 CPTPP 规定，在 7 年路线图期限内，所有

的商品关税降至零，而越南这一期限可能放宽至 7~10 年，即有一个宽松的过渡期。提请加入 CPTPP 还要处理好与越南、马来西亚等的双边关系，要借鉴其参与谈判的经验做法，争取获取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权益。

四是处理好国内改革提速与高水平开放对接问题。中国加入 CPTPP 首先要求国内各行各业做好准备。CPTPP 标准虽然有所降低，但核心条款仍是竞争性政策、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等条款，保持了原有的高标准、高质量、高层次的总基调。日本已先走一步，关于知识产权、技术转移方面是有技术诉求的，环保、劳工、数据流通、政府采购、国企歧视性等条款也更多地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就没有利益。满足这些条款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整体步伐与之匹配，即加快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新时代。加快国内改革以适应高水平开放的要求，做好第二次“入世”谈判的准备。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从未动摇，长期高度重视改革开放在国家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在多边场合多次表达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主张建设开放透明、互利共赢的区域自由贸易体制，愿同有关各方推动多边自由贸易谈判进程，而不是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中国长期把扩大市场开放作为深化改革的动力，相继出台了若干重大政策措施，包括出台《外商投资法》，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汽车、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外资股比限制，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研究提出海南分步骤、分阶段建设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加快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进程。这些举措均表明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意志，并且以实际行动响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要求，推动中国国内的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区域合作中，中国努力促成双边多边政经良性互动的局面，例如采取“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策略，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关系，强调互利共赢，而且加强沟通交流，积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负责任国家角色推进 WTO 改革进程和全球治理机制完善，使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二）明确实施策略和路线图

不论双边还是多边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和区域繁荣发展，中国应积极表明心态，申请参与，有必要及时提请加入 CPTPP，助力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

一是双边多边并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双边、区域多边 FTA 的谈判。这是中国自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战略选择，即逐步构筑起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

网络，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同时采取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的策略并不冲突，甚至可能相得益彰。双边 FTA 和多边贸易安排两者的属性不同，倘若提高市场开放度、降低关税、提高投资便利化水平，双边 FTA 是很好的制度安排；若要推进通关便利化和解决贸易争端或投资纠纷，多边 FTA 可能是个比较好用的机制。对于中国推行的双边 FTA 谈判，中国正采取两种策略：一种是仍积极与未签订 FTA 的国家继续开展 FTA 谈判；另一种是同时对已签署的 FTA 进行升级，今后尤其重视投资、服务业以及数字经济领域的后续 FTA 谈判。对于中国参与的多边自贸谈判，一方面是积极立足周边，推进中日韩 FTA 和 RCEP 谈判进程；另一方面是积极拓展经贸合作空间，适时提出加入 CPTPP 和推动 WTO 改革谈判进程，在扩量求质的基础上，加快高标准新议题的谈判进程。CPTPP 谈判应属于立足周边多边高水平自贸区网络建设的重要部分，与推进 RCEP 和中日韩 FTA 谈判是并行不悖的。可以预期的是，不管各类多边谈判机制以什么样的优先顺序进行，各类多边贸易机制终会谈判成功。倘若多边机制多数签署之后，之前相互交叉重叠以及融合升级，将会在更广泛范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和区域一体化，终将会走向 FTAAP。值得警惕的是，各种大小的多边机制的融合并非一厢情愿或自然融合，可能会因某些条款而相互排斥并呈现碎片化迹象。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倘若亚太地区的各类多边贸易机制纳入“毒丸条款”这类条款，并引入排他性的政治因素，即便将双边和多边绑架在一起，也可能会造成多边贸易机制很难兼容整合，更使得各种多边机制之间形成难以逾越的非竞争性壁垒，甚至形成各种利益自顾的贸易集团，反而不利于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在推进中日韩 FTA、RCEP 和 CPTPP 过程中，中国既要力争与毗邻国家和地区建立 FTA，推进形成以周边自贸区网络为基础的区域一体化市场，还要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建自贸区，争取同有意愿的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区域经济集团建立 FTA，依托各类 FTA 协定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 FTA 网络。

二是采取“入世姿态”和循序渐进谈判策略。中国适时加入 CPTPP 谈判时机比较成熟，当前应积极接触试探加入 CPTPP 可行性，尽早将中国纳入这一亚太地区的经济体系，构成依赖中国完成内循环的高标准一体化市场。作为后来者，中国应遵循既定规则参与 CPTPP 谈判。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将会成为 CPTPP 中的极其重要的经济体。日本作为 CPTPP 的主导者有其主导规则制定意图，可能担心中国这样具有威胁性的经济体加入会危及其主导权和发挥的带头作用。鉴于此，最好的策略是遵循 CPTPP 的既定规则，即作为 CPTPP 的新进成员加入，消除 CPTPP 初始成员国的担忧，不喧宾夺主成为规则的主导者，不主动说服相关成员国为中国的特例进行规则修改，增加他们对中国构建高标

准自贸区网络的信任。对加入 CPTPP，中方应以当年“入世”姿态、决心和勇气，认真学习履行相关规则。CPTPP 的影响力虽与 WTO 不可相提并论，但在现有的多边贸易体系中 CPTPP 仍是最具先进性和高标准的自贸协定，这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面向全球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的目标是相一致的。提出加入 CPTPP，中国应表明遵守既有规则的态度，借此高标准要求倒逼国内改革，特别是服务业和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自主的能力建设逐步达到 CPTPP 的高标准要求。此次 CPTPP 降低了一些标准，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上取得了显著进步，两者差距有所缩小，有必要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开放的心态看待 CPTPP，借鉴和参考其有益之处，循序渐进地提出加入 CPTPP 的谈判，借助谈判进一步熟知 CPTPP 的标准规则，通过加快深化改革开放，逐步适应这种国际规则变化。加入 CPTPP 并不是最终目的，这其中有很多不确定影响因素，但加入 CPTPP 的谈判可以保持开放心态，通过主动参与谈判，增加与外界的沟通理解，在理念和行动上取得更广泛认同和共识，克服对开放的过敏反应，以加入谈判促进合作。

三是采取更加务实的实施路线。提出加入 CPTPP 谈判，与开展的双边和多边 FTA 谈判并行不悖，与推动的 WTO 改革谈判也并不冲突，也可以避免 CPTPP “印太化”。当前形势下，亟待加快研究提出加入 CPTPP 谈判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争取尽早规避 CPTPP 生效后被排斥在外对中国推进区域一体化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一步，加快研提加入 CPTPP 可行性方案。考虑到与推进 RCEP 的进程并不冲突，对加入 CPTPP 的相关议题，应尽早研提可行性方案，重点摸清楚 CPTPP 各项条款与国内实际情况的不一致性，找出差距和短板，并结合国内深化改革开放的行动方案，对标时间表和路线图，设定加入 CPTPP 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建议这项准备工作最好 2019 年就完成，借助日本大阪召开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时机由高层领导开展沟通磋商，为开启后续谈判工作奠定基础。第二步，适时启动加入 CPTPP 谈判工作。在 2019 年开展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在 2019 年下半年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宣布启动加入 CPTPP 相关谈判工作。韩国和中国台湾已有意愿加入谈判。中国台湾尽管因禁止日本核灾区食品进口而遭到日方对其加入 CPTPP 的拒绝，但加入的可能性仍然较大。随着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中国率先允许日本新潟大米进口，经贸关系向好发展。此时，与日本等相关成员国商谈加入事宜，将会是比较合适的时间窗口。在此有利条件下，中国应尽早启动谈判工作，争取赶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之前。最佳时间窗口可能是 2019 年底至 2020 年之间。第三步，争取在 2022 年底前加入。在充分研讨和磋商谈判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已启动的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逐步落地实施，到 2022 年之前中国将完全具备加入条件，届时 CPTPP 的扩容谈判日趋成熟，特别是美国已更换新总统（特朗普也有可能留任），韩国、英国等经济体可能已就加

入 CPTPP 谈判达成结果，而美国也有可能考虑重返 CPTPP 谈判。届时中国在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上取得重大进展，其中加入 CPTPP 谈判应成为重要成果之一。建议用 3~4 年时间推进加入 CPTPP 的谈判达成，争取尽可能早地达成高标准、高质量的协定。最佳时点是争取在 2022 年举办北京冬奥会时宣布中国完成谈判。

（三）提出加入 CPTPP 的建议

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调和，而美国保护主义做法使得日欧等同盟不堪其扰。日欧等积极寻求自主的多边贸易政策，如日本主力推动的 CPTPP 已生效实施，而日欧已签订经济伙伴协定，RCEP 的谈判仍在持续之中，虽然中印、日韩等国家间围绕关税减让问题仍有争论，但推动意愿依然强烈。中国虽可以并行推进双边和多边 FTA 谈判，但谈判议价空间不同，可能不会平均用力。目前看，CPTPP 基本瓜熟蒂落，中国有必要提出申请，积极提出参与其扩容谈判，而不是作为看客坐失良机。

一是加快推动 RCEP 谈判，为 CPTPP 谈判腾出空间。在申请加入 CPTPP 之前，应加快推动 RCEP 谈判进程，积极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谈判成员国开展合作，共同做印度的工作，同时适当降低标准，分阶段处理，有关劳工和环境标准、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核心议题可采取打补丁方式逐步完成。一旦 RCEP 谈判成功后，中国可启动加入 CPTPP 谈判。

二是做好加入 CPTPP 谈判前期准备。加强与 11 个成员国的高层沟通交流，适时表达加入兴趣和意愿，支持研究机构加强对新规则的研究，重点引导国内研究机构与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研究机构或智库开展前瞻性联合研究，尤其是对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工业补贴、电子商务、数据跨境流动等都要做好预案并明确底线（确定哪些能改哪些不能改）。鼓励中资企业研究分析 CPTPP 的实施生效对自己在海外业务的影响，适时增强企业合规意识，特别是有意遵照 CPTPP 的高标准要求，一旦涉案要积极应诉，及时充分利用 WTO、CPTPP 等多边框架下申诉机制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三是对接参照 CPTPP 高标准要求深化国内改革。围绕高质量发展任务，加快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速，深入分析核心条款，对接参照其标准要求，深化国内改革，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相关制度，主动扩大各行业对外开放力度，维护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投资体系，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和相关制度，增强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适应能力。

四是争取日本的理解和支持。继续推动中国高层访日，争取日本对中国加入 CPTPP 的理解和支持。以市场开放作为条件，争取日本对中国加入的支持。争取在 2019 年习近平主席参加大阪 G20 会议和正式访日期间，可表达有意加入的强烈兴趣，促成更高层次的经贸合作。

五是积极借机参与推动 WTO 现代化改革。借助加入 CPTPP 的谈判时机,积极参与 WTO 现代化规则改革。通过与日欧在经贸规则谈判上的合作,就 WTO 相关规则修改问题共做美国工作,让 WTO 规则修订中更多反映国家发展权益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

六是以双边谈判为突破口推动区域一体化。适时提出加入 CPTPP 意味着中国追求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表达降低或取消商品关税、规制国有企业行为、减少容易引起市场扭曲的工业补贴等方面的改革决心。适时启动中美 FTA 谈判,明确更高水平对美开放的路线图、时间表和责任部门,利用中国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政策,以此为谈判条件和标准,尝试推进中美 FTA 谈判进程,使其发挥更积极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

1. 周睿:《中国加入 TPP 的经济效应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 年第 2 期。
2. 孙玥:《TPP 到 CPTPP:背景、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商业文化月刊》2017 年第 33 期。
3. 王孝松、何欣悦:《TPP 达成对中国贸易发展的影响探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 年第 3 期。
4. 王孝松、武皖:《CPTPP 建立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探究》,《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 年第 3 期。
5. 崔连标、洪雪雯、宋马林:《“一带一路”倡议能否缓解 TPP 对中国的负面影响?》,《财经研究》2018 年第 8 期。
6. 樊莹:《CPTPP 的特点、影响及中国的应对之策》,《当代世界》2018 年第 9 期。
7. 赵灵翡、郎丽华:《从 TPP 到 CPTPP:我国制造业国际化发展模拟研究——基于 GTAP 模型的分析》,《国际商务》2018 年第 5 期。
8. 张璐、展金永:《CPTPP 和 RCEP 对亚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效应差异研究——基于 GTAP 模型的分析》,《亚太经济》2018 年第 3 期。
9. 许培源、朱金芸:《TPP 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潜在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16 年第 9 期。
10. 李斌:《互联网环境下跨境数字化产品海关估价征税的问题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
11. 王芳:《CPTPP 投资规则对中国外资政策的启示》,《区域与全球发展》2018 年第 2 期。
12. 朱秋沅:《中国视角下对 TPP/CPTPP 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条款的考量及相应建议》,《电子知识产权》2018 年第 3 期。
13. 朱福林:《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现状、趋势与战略思路》,《全球化》2015 年第 10 期。
14. 郭雨洒:《TPP 最终文本之 TRIPS-PLUS 条款探究》,《电子知识产权》2016 年第 1 期。
15. 黄洁、陈香凝:《未注册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研究》,《理论观察》2018 年第 8 期。
16. 余盛兴:《TPP 非贸易因素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WTO 经济导刊》2018 年第 7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关于中美基础设施合作的调研与建议

颜少君

摘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战略的重要支柱。重振美国基础设施成为热门话题，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美基础设施合作的潜力和巨大空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笔者对美国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情况进行了为期 23 天的专题交流访问，在调研基础上形成了对美国基础设施总体状况、中美基础设施合作前景的相关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美国交通 基础设施 中美合作

作者简介：颜少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教授、副处长。

特朗普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在未来 10 年内利用 2000 亿美元联邦资金“撬动”1.5 万亿美元的基建支出，推动美国的交通系统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这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扩建和现代化改造计划。基于此，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美基础设施合作的潜力和巨大空间。受美国国务院邀请，2018 年 11 月笔者作为国际访问者领导项目（IVLP）访问学者，对美国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情况进行了为期 23 天的专题交流访问，重点考察了华盛顿特区、纽约、纽约州府奥本尼、芝加哥、底特律和西雅图等城市交通与公共基础设施，主要拜访了美国国务院、兰德公司、美国航空协会、全球汽车协会、美国汽车政策委员会、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纽约州史塔克议员、纽约州交通部、纽约州府地区公交公司、劳伦斯学院环境工程学院、芝加哥多式联运协会、通用汽车、底特律市长办公室、密歇根交通研究与商业化创新中心、东南密歇根州政府委员会、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港务局、西雅图交通部等机构及负责人代表，在调研基础上对中美基础设施合作形成如下个人看法及建议。

一、对当前美国基础设施状况的总体评估

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战略的重要支柱，重振美国基础设施成为热门话题，国内外很多公众和研究者普遍认为，由于年代久远和投资不足，美国基础设施已经破败不堪。实际上，美国基础设施并非全都破败不堪，美国基础设施总投资并没有显著下降，依然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资金来源主要来自税收，早期建设阶段联邦政府扮演重要角色，但州和地方政府承担大部分责任，具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广泛利用免税融资和联邦政府统筹的复杂网络等典型特征。

（一）支出水平稳步增长，总体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20 世纪 40—50 年代，美国开展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70 年代基本建成了完备的基础设施体系。尽管年代久远，许多地方的公路、桥梁和水利等基础设施系统亟待翻新改造和维修，但过去 60 年来，美国基础设施方面国家总支出并没有显著削减，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基本上与美国经济增长保持同步（见图 1）。数据显示，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无论是交通运输还是水利设施，相关的公共支出总额和人均支出都普遍上升，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许多地方的支出再次回升。到 2016 年底，市政债券发行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比 1996 年翻了一番还多。据行业分析师预测，仅水利和污水公用事业部门的支出在未来 10 年将超过 5320 亿美元，比过去 10 年增长 28%。^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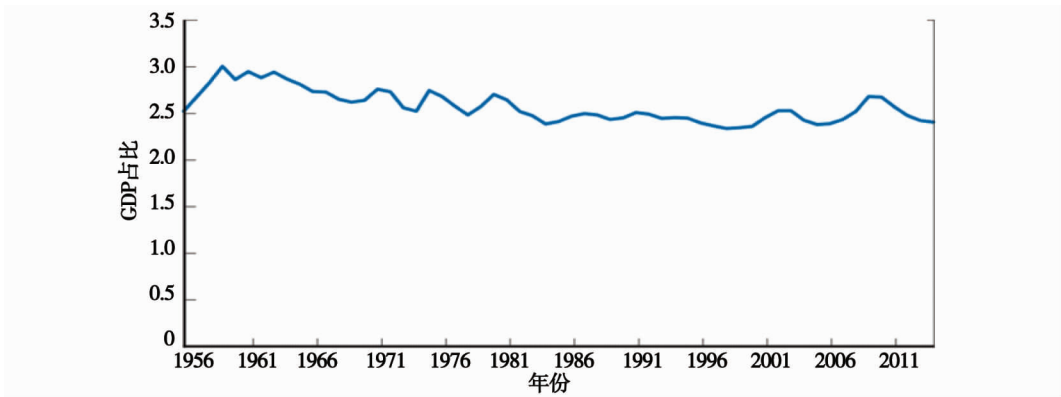


图 1 1956—2014 年美国联邦、各州和地方的基础设施支出总额占 GDP 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兰德公司。

^①Debra Knopman, Martin Wachs, Benjamin M. Miller, Scott G. Davis, Katherine Pfrommer, Not Everything Is Broken: The Future of U. S. Transportation and Water Infrastructure Funding and Finance, 2017.

另据美国交通部统计，最近十多年来，美国高速公路系统路面状况并没有显著恶化（见图 2），国家高速公路系统路面好的所占比重从 2005 年的 60% 上升至 2015 年的 61%；尽管差的所占比重也确有一定上升，从 6% 上升至 11%，但 61% 的路面状况处于好的状态。机场路面状况方面，好的部分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从 2005 年的 75% 上升至 2010 年的 79% 和 2015 年的 80%；差的部分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从 4% 下降至 2015 年的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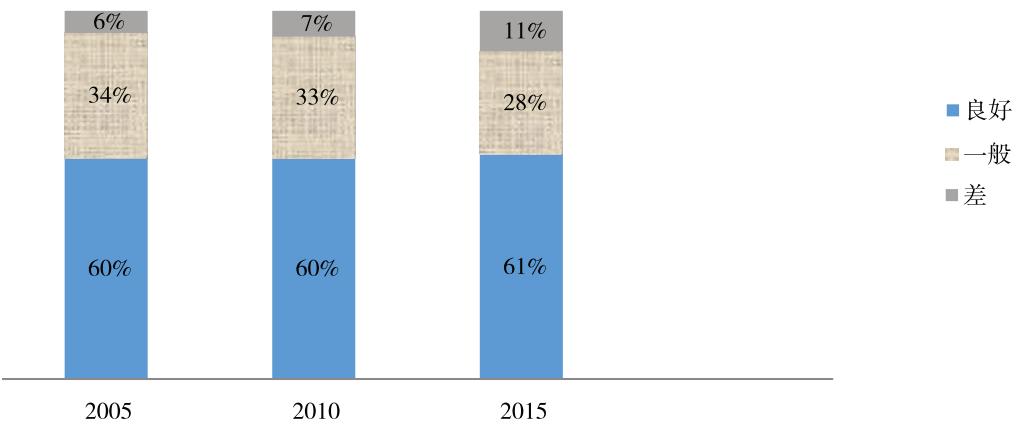


图 2 2005—2015 年美国国家高速系统路面状况

资料来源：美国交通部 2017 年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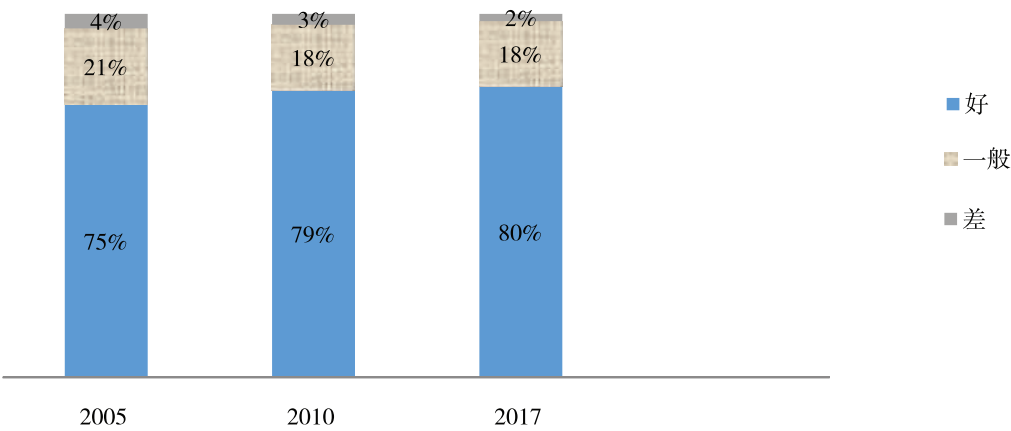


图 3 2005—2017 年美国机场路面状况（NPIAS 跑道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交通部 2017 年统计年鉴。

美国基础设施总体水平依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据美国交通运输部的统计，美国约有近 420 万英里的道路，超过 19000 个公共和私人使用机场，更有超过 60 万公路桥梁，约 138000 数英里的货运和客运铁路，25000 英里的通航水道，近 270 万英里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美国亚特兰大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尽管没有高铁，美国铁路货运系统仍为世界第一，全年运送货物占美国货运的近 40%；地铁方面，美国纽约和芝加哥地铁系

统全年无休，24 小时运营，纽约地铁拥有 425 座车站，总长度 1335 公里，地铁车厢 6400 多辆，仍为全球第一。大众公交运输方面，美国公交准点率较高，车站设有公交线路到站的具体时间，公共出行十分便捷。另据 2018 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发布的 2017—2018 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美国基础设施竞争力总体排名第 9 位，中国名列 46 位；在基础设施总体质量、公路质量、铁路基础设施质量、港口设施质量、航空运输质量等方面美国分别位于第 10、10、10、9、9 位，中国分别位于 47、42、17、49、45 位。美国基础设施总体仍远远超过中国，位于世界先进水平行列。

（二）资金主要来自税收，早期建设阶段联邦政府扮演重要角色，如今州和地方政府承担大部分责任

税收是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维护的主要资金来源。具体而言，美国基础设施传统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汽油税、车辆注册费和联邦税收，另外还有少部分来自财产税、债券、销售税、所得税和过路费。按照每单位资本收益计算，2015 年美国基础设施平均单位资本支出为 536 美元，其中来自汽油税、车辆注册费和联邦税收为 344 美元，来自财产税、债券、销售税、所得税和过路费等方面支出为 188 美元。早期建设阶段联邦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今州和地方政府承担大部分责任。联邦政府主要制定政策，根据各州面积、人口以及国会确定的政治公式和程序等确定分配到各州的联邦财政资金，并通过债券收益免税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不直接投资、建设、运营基础设施。州和地方政府是美国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主体，广泛利用联邦政府资金、自筹资金（主要包括市政债券、基金收益、汽油税、使用者付费等）和公私合营等方式筹集的资金自行决定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事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2015 年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承担了 62% 和 88% 的运营和维护费用。

特朗普政府提出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但目前还仅停留在计划层面。美国纽约州参议员史塔克认为，近几十年来，基础设施建设不是美国联邦政府关注的重点和优先解决的事项。尽管联邦政府鼓励各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州和地方政府还需很多资金用于满足教育和医疗资金缺口，无能力全面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三）重大基础设施投资公有制占主导，私人部门投资建设仅限于竞争性领域，以及通过公私合营方式参与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

美国基础设施建设以政府投资为主，各级政府资金占绝大部分比重，具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典型特征。据统计，美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97% 的资金来自联邦和各级政府部门。调研发现，联邦政府拨款和州税收收入是纽约州基础设施主要资金来源，每年 44 亿

美元的基础设施预算有 40%来自联邦拨款。东南密歇根州政府委员会代表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当前东南密歇根州道路状况老化严重，好的道路从 2003 年的 29%下降至 2017 年的 20%，坏的道路从 2003 年的 14%上升到 40%，未来 25 年需要投入 120 亿美元的资金才能使该地路面好的和一般的部分恢复到 80%，密歇根州基础设施投资来源主要还是通过联邦政府拨款和州的税收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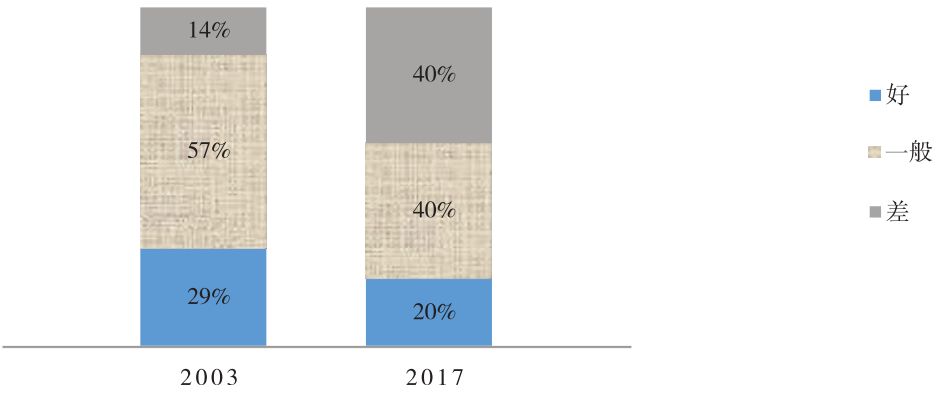


图 4 2003—2017 年美国东南密歇根州路面状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在美国东南密歇根州政府委员会座谈交流整理而得。

美国政府关注的核心目标是安全，投资首要考虑的也是安全。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侧重于策略性投资，以纽约州为例，美国纽约交通部每年对铁路、公路等进行安全性检查。纽约巴士校车每年检查 2 次，铁路的设备、指示灯等也是 6 个月检查一次。纽约州交通部主要是策略性投资。近年纽约州推出了未来 5 年 10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用于修建路、桥梁、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治理拥堵，以提高纽约在全球的竞争力。

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仅限于带有竞争性的行业和领域，以及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参与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目前，美国能源、电信、航空和铁路货运主要由美国私人企业主导，其他以政府公共部门主导为主。尽管如此，美国能源、电信、航空和铁路货运也主要由美国国内企业垄断，国外资本介入并不多。以能源为例，美国能源公司是涉足电力、燃气等多领域的混合能源公司，涵盖从能源生产、制造至服务，提供全流程、全产业链企业。因此，大多能源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也由企业根据自身实际需求提出，经政府批准即可开工建设。私人部门更多以公司合营方式参与基础设施的运营和维护。以纽约州府奥本尼公交公司（CDTA）为例，这是一家私人企业，其每年资金预算为 8500 万美元，其中只有 25%来自车票收入，其他主要来自州财政预算，该公司每年向州政府办公室申请年度预算以维持公司基本运营。

（四）美国各界普遍认同需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但在资金需求缺口、公共支出以及如何满足公众基础设施需求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

美国各界一致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对美国经济、社会和民众福利有积极影响，需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据美国交通运输部统计显示，2015 年美国 18.4 万亿美元的 GDP 中，交通运输共计约贡献了 10333 亿美元，其中出租运输贡献了 5432 亿美元（占 GDP 的 3.0%）。空运、铁路、卡车和水运等运输服务额外贡献了 1699 亿美元（占 GDP 的 0.9%）。有关资金需求缺口、公共支出以及如何满足公众基础设施需求等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比如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支持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但传统上民主党支持投入大量资金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主张通过增加税收和政府投资提升基础设施水平；共和党则倾向于低成本的投资。在资金需求缺口方面，兰德公司帕迪研究生院首席研究员德布鲁·诺曼博士认为，根据美国联邦交通部门最近预测，美国州和联邦层面只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1.5%~2% 的资金就能解决过去 10 年的基建需求。而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的最新研究则表明，未来 10 年美国基础设施领域总资金需求为 4.59 万亿美元，资金缺口为 2 万亿美元。

表 1 2016—2025 年美国基础设施所需资金及缺口 单位：10 亿美元

未来 10 年基础设施系统	资金总需求	估计筹集的资金	资金缺口
路面交通系统	2042	941	1101
水/污水处理	150	45	105
电力	934	757	177
机场	157	115	42
内陆水道及海港	37	22	15
水坝	45	5.6	39.4
公园及维护	114.4	12.1	102.3
铁路	154.1	124.7	29.4
学校	870	490	380
防洪堤	80	10	70
危险固体废物	7	4	3
合计	4590	2526	2064

资料来源：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对于增加政府公共开支满足公众需求也存在广泛争议。以汽油税为例，汽油税是美国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和维护资金的主要来源，但美国公众认为开车是美国公民的权利，

普遍反对增加税收。同时，由于科技发展，汽车油耗下降以及混合动力汽车的出现及增加，汽油税税基逐年下降，税收收入不增反降。目前，围绕重大基础设施投资达成共识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社会中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往往有多个公共目标并存，且经常相互冲突。作为美国政府权力制衡机制的一部分，行政程序旨在让利益相关方能够以保护健康、安全 and 环境为由参与、审查和干预监管决策，试图以加快基建项目的名义来绕过公众参与和破坏受到广泛支持的保障与标准，可能会导致项目延迟或陷入僵局。

二、中国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挑战

2017 年 11 月，中美首脑会晤期间双方就曾达成 2535 亿美元的合作大单，但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升级影响，很多合作项目被搁置。当前，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新契机，中美双方将重新开启谈判，基础设施合作可能重新提上日程。实际上，一直以来美方大量参与了我国有关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建设，中美双方在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领域的双向投资悬殊巨大，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规模远远超过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规模。根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荣鼎咨询的联合统计，1990—2015 年，美国对我国在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直接投资累计达 76 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在美国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总额不足 2 亿美元。特别地，自特朗普提出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以来，国内很多学者关注到美国基础设施领域资金的巨大缺口，并提出了中美基础设施合作领域的巨大合作空间。诚然，从长远来看，中美基础设施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很大。但是在当前中美局势背景下，中美基础设施合作面临巨大的挑战。

（一）中美贸易摩擦与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不利于中国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

中美贸易摩擦给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影响，也给中美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蒙上了阴影。当前中美双方各自存在一些误解和误判，迫切需要加强交流与对话。美国国务院经济与商业事务局顾问格雷戈里先生认为，当前中美关系进入了关键时期，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有着广泛深入的利益，尽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但竞争并不表明有冲突，美国并不是要和中国对立和冲突，希望双方能在有兴趣的领域共同合作。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商业事务办公室高级顾问汤姆森先生认为，中美双方政府应通过对话而不是对立来应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双方要找到共同利益点和兴趣点。通用汽车经济学家凯莱博士认为，目前中美关系现状不利于中美基础设施合作。从贸易和经济角度看，全球经济具有可持续性，中美合作能为全球带来好的进展，否则将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双方都要认识到中美之间需要携手合作。

此外，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也不利于中国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在特朗普“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内顾倾向经济政策影响下，特朗普政府倾向于鼓励美国本地公司参与基础设施项目，要求企业购买美国本土的原材料等相关产品和服务，关注给美国带来了多少就业等。

（二）美国社会各界对中国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持不乐观态度

美国社会各界普遍认为，尽管资金缺口很大，国外或私人资本很难进入美国基础设施领域。纽约州交通部主管托德·韦休斯认为，纽约州基础设施资金缺口很大，约 50% 的桥梁超过了使用寿命期限，但很难让国外资本进入，尽管市场是开放的，由于投资回报率不高，国外资本更多进入了房地产领域。史塔克认为，资金是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很大问题。美国没有基础设施建设长期规划，纽约州也没有，很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需从州其他预算拿钱进行临时救急。基础设施建设很难由私人部门提供，私人投资、使用者付费模式的难点在于：私人部门以赢利为目的，不会满足于收支平衡，而是希望增加收益，因而会推迟维护。德布鲁·诺曼博士认为，美国联邦层面对外国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没有专门规定和要求，由于不盈利，很难有国外资本能够进入美国基础设施市场。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减免鼓励高收入者购买政府债券，但对企业并无多大好处。凯莱博士认为，美国基建建设资金主要来自汽油税，但美国汽油税自 1993 年后没有任何变化。由于科技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汽油税总额不增反降。州的公路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采用用户付费的方式来融资，也开始有一些公私合营项目，但紧密合作的并不多。

应高度重视美国对中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关切。汤姆森认为，私人部门和国外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要确保能够满足公众利益。比如，中国投资者要想以公私合作（PPP）模式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就必须说服公众，项目符合社会公众利益。政府也会监督项目是否满足公众需求，以及价格是否合理。中美基础设施合作应在开放、透明以及国际规则约束下进行。亚投行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融资，公开透明，也不会让其他国家负债严重，就是一种很好的模式。此外，中国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应加强对劳工权利的尊重和保护环境，以确保所投资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美国新的投资审查法案不利于中国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

近年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了国外赴美投资的安全审查。据统计，2011 年至 2016 年，CFIUS 审核的交易数量增长了 55%。2018 年 8 月 13 日，特朗普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正式生效。该法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批权限。一是定义和审查交易的内涵扩大。在新的定义中，法令明确提

出，“国家安全”一词应解释为包括与“家园”有关的那些问题安全性，包括其在关键基础设施中的应用。任何非附属美国企业的人“拥有，经营，制造，供应或服务关键基础设施；管理，运营，制造，或提供关键基础设施”等都属于 CFIUS 审查交易的范畴，与关键基础设施有关的美国企业广泛包括拥有、运营、制造、供应或服务于关键基础设施的企业。二是审查交易的范围从“控制”到“非被动投资”。在原有的 CFIUS 结构下，一般认为低于 10% 的所有权，同时没有特殊的股东否决权或董事指定权，可以算作“安全港”而不受 CFIUS 审查的限制。可在 FIRRMA 的结构下，本来已经涵盖很宽泛的“控制”被进一步扩大。对于特定类型的投资，只要不是“非被动性投资”，就要受 CFIUS 的审查。这些被格外关注的交易类型包括：（1）外国人买卖或者租赁军事基地和国家安全设施附近的地产；（2）外国人对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保存或搜集美国人个人信息的美国公司等。三是从自愿申报到强制申报。FIRRMA 颁布前，对外国投资采取的是自愿申报的原则，CFIUS 有事后追查的权利。FIRRMA 则进一步规定，对于特定的交易，交割前必须强制性提交简易审查。可以看出，FIRRMA 显著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管辖范围以包含所有其他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对涉及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敏感个人信息的美国企业的投资。可以预见，未来中国企业在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过程中会遭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及其其他相关机构的严格审查。这无疑会提高我国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门槛，并增加相关成本。

三、中美基础设施合作的可能领域

中美基础设施合作既面临挑战，也有机遇。调研发现，中美可从 3 个领域开展合作。一是航空领域。美国航空协会全球政府事务协调官布雷加莱诺认为，中美建交后，1981 年中美签订航空合作协议，双方领空相互开放，最开始只有两个航班互飞，随着经济和中美经贸往来加深，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开始，为满足中美之间货运、航运需求，中美签订新的民航合作协议，美国航空公司开始在中国落户。2004 年联邦快递在广州投资 10 亿美元建立货运中心，之后在上海也建立了货运中心。2007 年后中美航空领域有更大的合作开放，目前中国每周有 168 个航班飞往美国，美国进入中国的也很多。中国航空公司与美国航空公司已有深厚合作基础，如国航与美联航都是星空联盟会员。特别地，自 2000 年早期美国航空公司进入中国，到今天中美航线 65% 都由中国航空公司运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航空公司发展很快，购买了很多波音飞机，中国航空需求不断增加成为最大市场。此外，我们还了解到除了中国国航与美联航的合作，上海东方航空公司与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南方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也与美国的航空公司有合作。因此，中美航空领域

的合作有助于中国参与美国民用航空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中美基础设施合作的亮点。二是能源领域。美国能源主要由私人部门主导。2017 年特朗普访华达成的 2000 多亿美元的合作清单中，有很多项目涉及中美能源基础设施合作。可以看出，只要中美关系大环境能有所好转，中美能源合作面临的障碍可能相对较少。美国能源发展很快，能源供应格局和环保政策的变化等还带来了中美能源领域合作的巨大潜在需求，特别是美国需要建造新的 LNG（液化天然气）和原煤出口终端等以满足美国能源供给和发展的重大变化。还有一些燃煤电厂的更新改造等，也将成为中美合作的潜在市场。三是港口、铁路和城市地铁运输方面。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货运铁路系统，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目前货运铁路主要由私人企业主导。美国客运铁路极不发达，公众大多依靠公路和航空出行。在交流访问期间，我们先后从纽约州奥本尼到芝加哥，芝加哥到底特律往返，两地距离都在 500 公里左右，由于客运铁路不发达，我们都是飞机往返。中国有高铁建设的技术、人才、运营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可以通过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西雅图港港务局国际商务办公室代表卡琳表示，西雅图港与中国上海港、天津港是友好港，与上海友好港口已 40 年。目前中国与西雅图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参与还很少，运营方面有一些合作。她了解中国在非洲、亚洲都有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某铁路知名企业在美国南加州投资了轻轨建设，以后中美相关合作会越来越多。

四、几点建议

（一）加强中美对话沟通，推动中美关系在良性竞争中相向而行

中美基础设施合作与中美关系紧密相关。2017 年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合作清单中有很一部分涉及中美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后因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而搁置，中美能源贸易更是一度下降至零。美国大量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特朗普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面临巨大资金缺口，中国具有基础设施建设的丰富经验，双方互补性较强，合作潜在空间较大，有望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增量。在调研期间，美国有关政府部门和智库界人士均提出应通过对话交流解决中美贸易摩擦，为中美基础设施合作提供良好的政治舆论环境和民意基础。

（二）进一步加强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美国州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州和地方政府有很大自主决策权，很多州和地方与中国合作意愿和动力较强。调研发现，2011 年至 2018 年 9 月，东南密歇根州州长已先后 8 次访问我

国，该州愿意为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各类资源及相关法律帮助。我们要充分利用美国制度特点和地方发展意愿，加强我国的省市与美国的州和地方的合作，强化中美合作的地方基础。特别是州和地方政府是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主体，比我们能更早识别、研判和应对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可能面临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及合规风险。在我国的省市与美国的州和地方合作背景下，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可能在应对美国政治和监管审核的过程中提供有效帮助。

（三）充分利用华人华侨华裔资源，搭建中美基础设施乃至经贸合作桥梁

调研访问期间，我们访问的华盛顿特区、纽约州政府、劳伦斯学院环境工程学院、密西根州东南政府协调委员会、华盛顿大学、全球汽车协会、通用汽车等政府部门、研究机构和企业中均有华人华侨华裔，他们已深入美国基础设施各层面、各领域，部分大学研究机构工作人员更是与国内大学有深入合作，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重要优势资源。这一群体既对美国当地法律法规和专业领域发展有深入了解，也了解国内相关国情，明白自身发展与祖国发展息息相关。应鼓励国内有关智库、大学、企业等与之开展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合作，强化他们作为中美基础设施合作乃至中美合作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四）中国企业可以多条路径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但应注意规避投资风险

随着美国 FIRRMA 法案的实施，未来中国企业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将面临更大挑战。对此，中国企业对参与美国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一定要有清醒认识，应仔细研究美国当地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多种方式与美国本地企业及其他外国资本开展灵活、多元化的合作，增强我国企业本土化经营能力，同时加强宣传中国企业投资对美就业、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所做贡献，提高投标及投融资成功率，不断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刘勇、刘卫平：《中美基建合作：中美经贸新的增长点》，《学术前沿》2018 年第 2 期。
2. Debra Knopman, Martin Wachs, Benjamin M. Miller, Scott G. Davis, Katherine Pfrommer, Not Everything Is Broken: The Future of U. S. Transportation and Water Infrastructure Funding and Finance Rand corporation. 2017.
3. 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Bureau of Transportation Statistics . Transportation statistics annual report 2017, <https://www.bts.gov/tsar17>.
4.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2017 Infrastructure Report Card—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America’ s infrastructure,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责任编辑：谷 岳

迪拜健康城发展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杜振华

摘要：迪拜的资源并不丰腴，然而迪拜却通过自己的创新发展将世界富豪吸引到自己的城市进行消费和投资，其健康城的发展就是迪拜一贯秉承的奢华理念而拓展“世界第一”的产业，创造了“迪拜模式”。本文在介绍迪拜健康城发展现状基础上，概括了迪拜健康城将健康寓于旅游和享受之中的主要发展特点，并对其“高端、奢华、享受”理念支撑其产业发展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中国产业升级可借鉴迪拜健康城的发展和“迪拜模式”，以高收入弹性的产业和服务引领其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通过更开放的政策运用世界资源发展自己的经济。

关键词：迪拜健康城 医疗保健 奢华理念 产业转型

作者简介：杜振华，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任。

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均寿命的提高，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进而形成了许多世界知名的健康服务集聚区。我国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迪拜健康城（DHCC—Dubai Health Care City）作为世界级的健康医疗保健护理商业中心，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借鉴。

迪拜位于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7个酋长国之一，是全球10大海港城市之一，也是中东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中东最富有的城市。同时，迪拜也是一座不断上演奇迹和刷新世界纪录的城市。迪拜的迅速崛起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其常住人口约280万，本地人口占20%左右，外籍人士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

支柱产业为物流、贸易、金融及旅游业。2017 年迪拜国内生产总值（GDP）达 3890 亿迪拉姆（约合 1060 亿美元）；^① 人均 GDP46000 美元，位居全球第 16 名。其经济实力在阿联酋排在第一，阿联酋 70%左右的非石油贸易集中在迪拜，因此迪拜也被称为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之都”，是阿拉伯湾南岸的一颗“海湾明珠”。

一、迪拜健康城发展状况

迪拜健康城是世界上第一个自贸区健康城。借鉴自由贸易区的定位，健康城实施 100%免税、100%外国所有权。迪拜健康城是典型的资本导入型发展模式，无公司税、无所得税、无关税、无限制的资本、无贸易壁垒和配额等。健康城引进哈佛医学院的高端医疗资源，设有医学院、护士学校、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及诊所，并配备健康疗养院、运动医学馆以及专门的医学实验室等商业医疗护理中心，面积达 12000 平方米（图 1）。

迪拜健康城的前身是迪拜拉希德医院，位于迪拜河左岸，地处迪拜市中心区域，距迪拜国际机场只有 4 公里，距离繁华的商业中心（WAFI 城）仅有五分钟步行距离，靠近城铁站。健康城是 2002 年由阿联酋副总统、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提出并建设的。其理念就是要成为拥有国际标准的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和集成卓越的临床及健康服务、医学教育与研究中心。旨在创建一个健康管理平台，为医疗保健、医疗教育、医疗研究和医疗监管提供服务。以满足当地人和生活在欧洲和东亚之间的 20 亿人口对于高质量医疗和健康管理的需求。迪拜的医疗健康产业在私营部门参与度方面，在中东北非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私营医疗健康服务供应商在迪拜门诊服务中占 79%，住院服务占 74%。^②

在健康城中，有综合性医院如新迪拜医院、拉希德医院、马克图姆医院，90 多家专科门诊及医学实验室，还有 140 多家商业医疗护理中心，更有多个大型商场及豪华酒店，以及融合了东方医学和其他健康计划的中心。目前在这里工作的医护人员达 1700 人。健康城中汇聚了全球各地的治疗方法，比如西医、中医针灸按摩、印度医学、自然疗法、顺势疗法等众多的特色医疗保健和商业零售服务商。病人看病时，会有一名责任护士从问诊、抽血化验到办理住院手续，全程为其提供贴身服务。同时，健康城还定期举办各种活动，向民众宣传疾病的防治知识。

位于迪拜城中心的综合医疗中心配备一个健康疗养院和矿泉疗养浴场、一个运动医学部、一个五星级旅馆和购物中心，以及融合了东方医学和其他健康计划的中心。图 2 为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网站，2018 年 4 月 24 日。

^②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网站，2018 年 11 月 8 日。

迪拜健康医疗组织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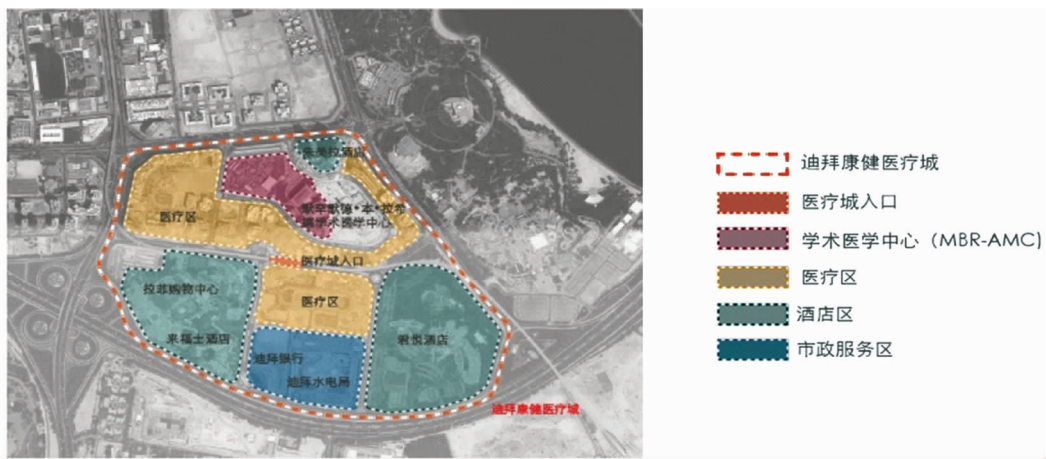


图 1 迪拜健康医疗城的地理位置及功能区

资料来源：Dubai Health Care City Case Stud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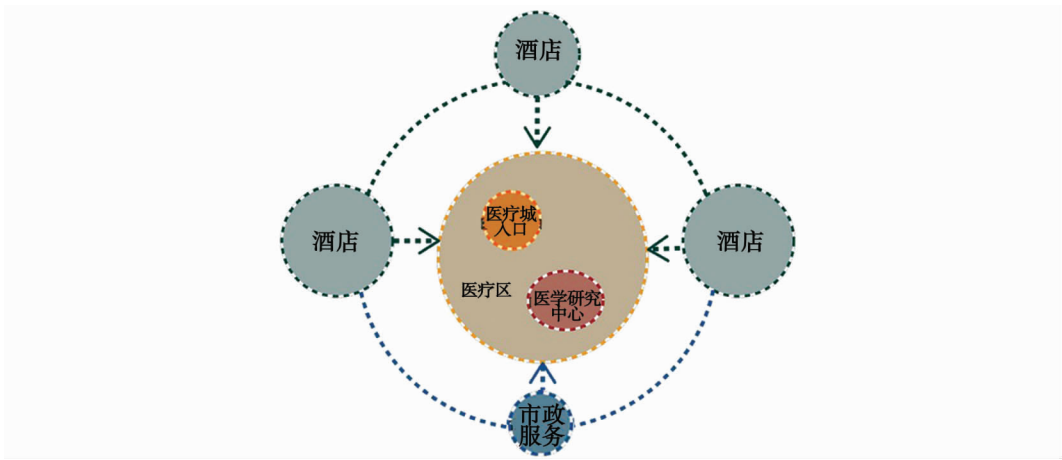


图 2 迪拜健康城医疗组织结构

资料来源：Dubai Health Care City Case Study.

二、迪拜健康城发展特点

（一）健康寓于享受之中

大力发展医疗旅游业。迪拜政府对迪拜的定位就是“高端、奢华、享受”。迪拜健康城秉承这一理念，向全世界展现其医疗健康服务的现代享受与魅力：世界顶级的健康护理中心，世界第一个最全面的医疗保健自由贸易区。总之，是一个给全球富人提供健康享受的地方。迪拜除了拥有世界上第一家七星级帆船酒店、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全球最大的豪华购物中心、世界最大的室内滑雪场以外，还是中东重要的贸易港口和金融中

心。这一切为迪拜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为迪拜健康城提供了高端客户支撑。

迪拜健康城的患者主要来自全球的超级富豪。迪拜市政府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仅 2014 年上半年，来健康城看病的全球患者超过 60 万人。迪拜医疗局（DHA）与健康银行签署了一份旨在促进迪拜医疗旅游发展并实现至 2020 年年均吸引 50 万医疗游客目标的谅解备忘录，为迪拜创造 7.1 亿美元的收入。目前，医疗游客的数量每年增长 12%～13%，预计到 2020 年将超过原计划。据莱坊（KnightFrank）2016 年度《财富报告》，迪拜是全球第五大超级富豪（拥有 3000 万美元以上资产）集聚地，超过 1 万名身家逾 1000 万美元的富豪将迪拜作为第一或第二居住地。进入迪拜的国际资本主要为奢侈消费型资本，因此，迪拜健康城也自然是以高端奢华为主的医疗健康服务。

（二）健康服务与度假服务完美结合

迪拜健康城将医疗健康服务从医疗卫生区域中分离出来，增强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有效带动了周边商业娱乐业态的蓬勃发展。DHCC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健康城，由医疗区和度假疗养社区构成。其中，医疗区占地 38 万平方米（570 亩），重点提供急性医疗护理服务；度假疗养社区占地 176 万平方米（2640 亩），提供完整的医疗保健和持续护理的居家式医院、门诊、豪华温泉度假村和完善的健康服务。

医疗区主要功能包括：传统的医疗服务、替代性医疗服务、^① 医疗教育研究、医疗基础服务和相关的支持系统。其最大的特色在于将可替代性医疗从医疗区中分离，带动周边商业娱乐业的蓬勃发展。针对日益增长的需求，DHCC 提供更多样的医疗保健服务，如针灸、松骨服务等。

度假疗养社区功能包括：健康护理社区医院、社区门诊诊所、疾病预防及疗养中心、美容中心和运动康复中心。最大的特色在于利用医疗中心附属效应带动商业消费。DHCC 利用其美容整容中心与国外高端医疗合作，开展美容与整容项目，提供术前检查、术后整合等服务；利用疾病预防及疗养中心，在疾病预防方面采用创新技术，提供世界级的优质护理，吸引世界各地高收入群体；利用运动康复中心，由世界顶级的运动医学领域顶尖专家为各类型、各年龄、各种不同技能水平的运动员提供运动分析，运动评估等服务，吸引世界各地明星运动员前来进行长期的运动康复，明星效应同时带动周边消费。

2015 年迪拜位列全球医疗旅游目的地第 17 位。2016 年迪拜接待医疗游客约 32.7 万

^①替代性医疗服务，又称医疗监督健康计划，还包括基于具体疾病专家会诊后的物理治疗，严格控制饮食和运动。

人次，同比增长 9.5%，医疗旅游市场总产值达 3.8 亿美元。^① 迪拜旅游局公布的数字显示，2017 年国际游客数量为 15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2%。预计到 2020 年，迪拜国际游客数量将达 2000 万人次。^② 旅游业是迪拜经济的第一大支柱，每年旅游业收入占 GDP30%左右。由旅游业带动医疗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实现旅游服务与健康服务的相互促进，对游客和迪拜双方来说，实现了范围经济的节约和双赢。

迪拜国际机场 2017 年客流总量为 8820 万人次，同比增长 5.5%。同时，国际乘客数量居全球首位。位于拉希德港（Port Rashid）的 Hamdan Bin Mohammed 邮轮码头是全球容量最大的邮轮码头，从 2014 年开业到 2018 年底，已接待旅客总数超 230 万人次。其中，2018 年接待旅客数量达 63.27 万人次，与 2014 年相比增长了 172%。而该码头停靠游轮数量从 2014 年的 94 艘增长到了 2018 年的 120 艘。^③ 统计显示，2017 年阿联酋机场游客总数达 1.23 亿人次；旅游业市场总值达 1541 亿迪拉姆（约合 420 亿美元），占 GDP 比重为 11.3%。

游客赴迪拜进行医疗旅游的项目主要包括整容手术、矫形治疗和不育治疗。其中，矫形治疗是利润最高的项目。游客们通过申请为期三个月的医疗旅游签证赴迪拜旅游，并可延期三个月。

（三）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诊断和治疗服务

迪拜健康城正在向世界 10 大医疗旅游目的地目标努力。迪拜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医疗旅游目的地在国际平台上的知名度，使迪拜更好地向世界分享其医疗方面的发展成果。通过提供符合国际标准、品类齐全的诊断和治疗服务，满足众多需求。DHCC 可提供 12 个领域的健康服务：顺势疗法、印度草医学、中医、尤那尼医学、骨科、治疗性按摩、自然疗法、引导意象、泰志、普拉提、捏脊和瑜伽。具体服务项目包括：（1）传统的医疗服务，提供高度便利的医疗一条龙服务。（2）替代性医疗服务，提供多样化的医疗保健服务如针灸、松骨服务。（3）医疗教育和研究。（4）医疗基础服务。DHCC 设置了一系列的诊断实验室、药房、医疗设备公司、医疗保健公司、医疗咨询公司、制药公司，支持医疗区有效运转。（5）相关的支持系统。为重点客户提供一站式全包服务，例如签证或政府需要的其他文件。

^①迪拜医疗旅游 2020 年或将吸引 50 万医疗游客，<http://tj.global.ihk.cn/Overseasinfo/news.html?id=197>。

^②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网站，2018 年 2 月 8 日。

^③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网站，2019 年 1 月 7 日。

（四）实施严格的医疗质量管理

拉希德·马克图姆的医学研究中心是 DHCC 核心临床和教育机构，包括 6 个组成部分：大学附属医院、哈佛医学院迪拜学院、研究所教育和研究学院、迪拜大学医学研究基金、阿勒马克图姆哈佛图书馆、波士顿大学牙科保健中心（迪拜分所），具备高端的医学教育环境。

迪拜健康城中的医学模拟中心是中东首家引入先进的培训设施的机构，该中心结合最新的教育方法，提供一个真实、无风险的训练环境，提高认知、心理和沟通技巧。

迪拜健康城还与美国哈佛医学国际部合作成立了医疗质量管理中心（CPQ），实施严格的质量临床标准以确保病人安全和护理的质量。此外，该中心还监督医疗保健计划在临床服务中落实的程度。完善的管理系统，严格医疗专业人员操作认证，高质量标准的临床实践。通过细化系统对临床和计划的管理监督，确保病人护理质量和安全性。

三、迪拜健康城发展的原因分析

在阿联酋 7 个酋长国中，迪拜蕴藏的石油最少，石油占迪拜 GDP 的比重不到 3%。但迪拜却是转型最成功的一个，它迅速发展了自己的高端服务业：旅游业、房地产业、航空业和金融业，现在又建立了迪拜健康城，创造了“迪拜模式”。

（一）高端奢华的发展理念

迪拜政府对迪拜的定位就是极致的奢华与享受。酋长穆罕默德曾在书中写道：“谁会记得第二个登月的人呢？”正是这卓而不群的理念使迪拜在短短的 20 年间摆脱“资源诅咒”^① 脱颖而出，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中奢华之都。迪拜追求世界第一的精神贯穿于迪拜的经济、建筑、医疗等方方面面。这些奢华产业相互支撑，形成范围经济型，为全世界高端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最奢靡的服务。

例如，迪拜健康城为战略伙伴与国际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内部培训，为病人的旅游节省成本。医疗和保健服务企业到迪拜具有吸引力，能够吸引高素质的知识型员工，对游客和家庭也具有很强吸引力，发展酒店和公寓设施方便患者和家属住宿，临近地区繁华的零售业和便利的交通，使迪拜健康城形成一站式高端服务。

（二）政府的政策支持

迪拜健康城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在迪拜健康城投资的医疗机构和企业不仅可

^①“资源诅咒”指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

以享受包括 100%免税、100%外国所有权、无限制资本和配额等在内的自由贸易区优惠，还能享受一站式购物的政府服务、无忧公司注册、无忧公司法律和法律框架等优越的投资政策。根据迪拜政府相关规定，自贸区企业可享受 100%外资拥有、50 年免除所得税、期满后延长 15 年免税期、无个人所得税、进口完全免税、资本金和利润允许 100%遣返以及充足的廉价能源等政策。以至于 2017 年 12 月欧盟把阿联酋列入避税天堂黑名单。以上措施为外国企业在本地区投资兴业提供重要的经济激励制度。例如，迪拜经济发展局（DED）2018 年颁发新执照 20467 份，其“商业地图”数字平台处理商业登记和执照业务 248769 份，同比增长 4.6%。新企业主占迪拜经济发展局 2018 年签发执照的 77.8%。妇女在新企业主中的比重从 2017 年的 12%增加到 22.2%。同时阿联酋不断强化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伙伴地位，为迪拜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

（三）地缘政治的优势

迪拜位于东西方交会处，是一个贸易转换地，辐射区域人口达 22 亿，涵盖非洲、欧洲、中东、独联体国家、中亚和印度。尽管地处中东要地，但是两伊战争、海湾战争、“911”都与它无缘，成为中东的避风港。同时，由于靠近南亚和印度次大陆，周边国家为它提供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此外，为了在世界经济中取得一定的地位，迪拜作为主办方举办了许多世界性活动，如世界杯、网球公开赛、2003 年世贸组织会议和世界银行会议，以及即将于 2020 年举办的世博会等，都为迪拜提供了巨大的商机。

（四）自由开放的投资和生活环境

迪拜是一个自由而不受束缚的地方。迪拜在经济开放度方面全球排名第三，仅位于卢森堡和香港之后。2016 年迪拜经济开放度比例为 321%，意味着贸易流是经济净增加值的三倍还多。^①

此外，迪拜是高度国际化的都市。迪拜的国教是伊斯兰教，绝大部分居民是穆斯林，但是其他宗教也同样受到尊重。迪拜外籍人口所占比例大约 80%，其中大部分人来自东南亚和南亚，还有英国等西方国家移民。世界银行发布 2018 年经商便利度（Ease of Doing Business）报告，阿联酋位列全球第 21 位，连续 5 年蝉联中东地区之首。^② 例如，2015 年至 2018 年间，迪拜吸引来自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达 61.2 亿迪拉姆（约合 16.7 亿美元），投资项目总数达 109 个。其中，2018 年印度投资者在迪拜投资项目 31 个，

^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网站，2018 年 1 月 14 日。

^②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网站，2017 年 11 月 1 日。

资本总额达 37.1 亿迪拉姆（约合 10.1 亿美元）。^① 新增外资主要流向物流、旅游、医疗和其他新项目。

（五）不断创新发展

从资源优势到区位优势再到服务优势。迪拜经历了从珍珠和石油贸易到服务贸易的转型。根据迪拜工商会和普华永道 2018 年 2 月联合发布的最新版迪拜创新指数，迪拜位列全球创新城市排名第 14 位。^② 如果将石油出口、发展贸易和旅游产业作为迪拜的第一、第二次转型，那么以迪拜健康城为代表的依靠科技和人才发展的第三次转型，充分展示了迪拜的不断创新。

阿联酋在 2014 年推出“阿联酋 2021 愿景”时就已经确定了国家创新战略，致力于用 7 年时间把阿联酋变成世界最富创新的国家之一。可再生和清洁能源、交通、技术、教育、健康、水和空间技术将是未来阿联酋经济发展的重点，也是投资的热点。迪拜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迪拜 100”“迪拜未来加速器”等，主要针对在数字医疗、新型农业的创新团队。总之，迪拜一直将需求收入富有弹性^③的产业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

中国已成为迪拜入境旅游第 5 大客源市场，针对中国公民的新的落地签手续也使旅游人数不断增加。2017 年接待 76 万多名中国游客，2018 年上半年约 45.3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9%，这其中有许多游客属于健康旅游。迪拜的发展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启示如下。

1. 运用世界的资源发展本国的产业

迪拜的资源并不丰饶，然而迪拜政府却通过一系列自由开放的政策将世界资本吸引过来，在沙漠和海洋中建立极尽奢华的奇迹，以此吸引世界的超级富豪们的奢侈性消费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这种集世界资源于己用的做法，为资源贫瘠国家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我国经济转型和人口老龄化加速，2012—2016 年，我国卫生总支出增长近 1 倍，年均增幅达 13.75%，超过 GDP 的年平均增速 8.74%。^④ 医保基金支出呈刚性增长态势，虽然增速放缓，但医保压力仍在加大。基于此，卫生总费用如果继续维持前几年的高速增长

^①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网站，2018 年 2 月 8 日。

^②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迪拜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网站，2018 年 2 月 25 日。

^③需求收入富有弹性：指当消费者收入增加时，消费者对某种商品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大于收入增加的幅度。这种商品被称为奢侈品。

^④易观、医护到家：《中国互联网家庭健康管理白皮书 2018 年》。

长，将导致医疗卫生制度不可持续。我国是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不妨学习迪拜，通过宽松的政策，发挥国内私有资本和外国资本的能动性，建立一些集旅游、度假与健康医疗于一体的健康城，形成健康服务业集群，作为目前我国分散医疗服务的补充，为不同收入居民提供不同层次的健康医疗和保健服务，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对疾病的预防能力。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既可以将高端服务作为特色，也可以侧重发展基础性健康服务。

2. 将医疗健康作为产业来发展

迪拜通过独树一帜的创新聚焦世界资本，通过“高端、奢华、享受”将世界的富豪集中到自己的7星级甚至10星级酒店，享受着奢华极致的服务。而其他普通大众也普遍存在着朝圣般的心理要到迪拜旅游。这一方面加大了迪拜的旅游收入；另一方面也使迪拜健康城实现其建立的初衷，将旅游与健康发展于一体。迪拜医疗局希望迪拜能吸引更多的医疗游客，而且要为游客提供从查询医生到医疗诊断、住宿、翻译等一站式服务。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很大，各地区在发展自己独具特色产业的同时，可以将医疗健康作为产业来发展，并与地区特点相融合，加大预防投入，通过健康管理，减少人们的医药支出，实现医疗控费，缓解社保压力。

3. 在自由贸易区内设立健康产业集群

迪拜健康城是世界上第一个自贸区健康城，在自贸区内形成健康产业集群。这对我国来说，既是借鉴的，也对我国分散医疗与社会基本保障医疗制度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医疗健康产业在自贸区内使健康产业集群化，可以吸引国内外更多的资本进入医疗健康领域；同时，还可以提高医疗企业的效率，推动医疗产业向纵深发展。此外，健康服务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的特点，对产业整体发展的规模和环境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处理好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与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争夺稀缺资源的关系，这也是发展医疗健康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参考文献：

1. 何达、金春林、陈珉惺、方欣叶、杜丽侠、吴凌放：《健康服务业集群化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中国卫生资源》2016年第2期。
2. 陈德福、车春鹏：《国际健康服务业集群发展经验及启示》，《现代经济信息》2014年第22期。
3. 周迎洁、刘小军、过晓颖：《中国自贸区服务业开放制度创新研究——基于迪拜、新加坡经验的启示》，《当代经济》2016年第1期。

责任编辑：谷 岳

· 宏观 经济 ·

“双轨合一”是我国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杜金富 张红地

摘要：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重大和广泛。推动利率“双轨”合二为一是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最后一个关卡，也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步骤。为了加快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2019 年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提出要稳妥推进利率“两轨并一轨”，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目的是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提高央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利率并轨就是要改变信贷市场价格形成基础，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实现存贷款利率定价基准与货币市场资金定价基准的趋同，即完全由市场资金供需状况决定。

关键词：利率改革 双轨合一 市场化

作者简介：杜金富，北京语言大学商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

张红地，北京语言大学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

2019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稳妥推进利率“两轨并一轨”，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目的是建立健全与市场相适应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提高央行调控市场利率的有效性。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进行多年，推动利率“双轨”合二为一是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最后一个关卡，也是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步骤。利率并轨就是要改变信贷市场价格形成基础，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实现存贷款利率定价基准与货币市场资金定价基准的趋同，即完全由市场资金

供需状况决定。

一、利率市场化道路选择的关键：市场驱动或政府主导

（一）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大多是市场驱动的结果

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尽管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但主要是经济金融发展自然演进的结果，是市场做出的选择，或市场推动政府做出的选择。

从美国的情况看，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随着通胀率不断提高，僵化的 Q 条例导致负利率时常发生。Q 条例的约束和分业经营的限制，使银行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证券市场不断发展、金融国际化和投资多样化，导致大批资金流入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脱媒”现象严重。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还导致美元存款大规模外流。为了应对存款流失，美国存款类金融机构创新了大量金融产品，如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NOW）、电话系统（TTS）、自动转账服务（ATS）和股金提款户（CUSDA）等。这些新型金融产品具有集储蓄和投资于一体的特点，突破了 Q 条例规定的利率上限，受管制的金融机构利用各种方式和手段逃避管制，废除利率管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利率市场化成为大势所趋。

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则是国内外环境倒逼的结果。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政府为了应对滞胀和为财政赤字融资，被迫放开国债利率，以增加国债的容量和流动性。同时，由于实际利率较低，其他融资渠道的发展使得银行存款大量分流，脱媒形势倒逼银行也转而支持利率市场化。另一方面，当时欧美各国积极放松利率管制，利率水平上升，而日本严格的利率管制使其国内利率相比于国外较低，资金出现流出趋势。日本大量购入美元债券。再加上国外对日本的投资有限，日本资本项目出现巨额逆差，日元汇率被压低，日元低估和美元高估导致了美国对日贸易的巨额逆差。最终，迫于现实情况及美国等国施压，日本实行了金融自由化，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利率、汇率自由化。

德国和英国属于在短期内放开利率管制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的利率市场化同样也是市场推动的结果。德国的利率市场化也是由国内外双重因素推动。1958 年，德国恢复了马克的自由兑换，第二年又实行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资金的自由流动使得国外的利率变动对国内的影响增强。德国民众和企业为寻求高利息，纷纷将存款转向欧洲货币市场，导致大范围的存款流出。德国银行为防止存款外流纷纷绕开利率管制，使用全能银行的优势，用其他优惠条件争取存款，形成事实上的高利率状态，使利率管制形同虚设。例如，银行利用兼营证券业务的便利，对客户以低价卖出证券，然后附带条件以高价买进，以此为客户提供较高的利息收益。在内外形势的相互影响下，要求解除利率控制的呼声越来越高，利率市场化成为必然选择。

（二）发展中国家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主要由政府主导

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利率市场化之前一般都存在金融抑制现象，包括压低存贷款利率、信贷配给、抑制直接融资市场发展、保持银行在融资渠道中的主导地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利率市场化时，国内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货币化程度很低。尽管利率市场化大多是在经济金融情况恶化的背景下做出的一种政策选择，但更多是受金融自由化思想影响，以及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引起的。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

二、我国利率体系的特点和现状

我国的利率体系可分为中央银行利率、金融市场利率和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三个层次。其中，中央银行利率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利率，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法定准备金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创新性流动管理工具利率（常备借贷便利 SLF、中期借贷便利 MLF、抵押补充贷款 PSL）；金融市场利率指金融市场上各种产品的利率，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和中长期利率，其中，货币市场利率包括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银行间债券回购利率、短期票据利率、短期融资券利率，中长期利率包括债券收益率和中期票据利率；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是指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与其他机构或个人发生的存款或贷款的利率。

（一）中央银行利率体系

1. 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我国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便利、现券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目前，我国的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同向变动，其下限是央行超额准备金利率，上限为再贴现利率。

2. 存款准备金利率是中央银行支付给金融机构缴存的存款准备金所支付的利率。1996 年之前，我国法定准备金与超额准备金执行相同的利率水平。1996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对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实行差别利率，并分别下调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利率，由原来的 8.82% 分别下调至 8.28% 和 7.92%，1997 年 10 月又分别下调至 7.56% 和 7.02%。1998 年之前，我国将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分为“缴来一般存款”和“备付金存款”，1998 年 3 月将两个账户合并统一为准备金账户，并将缴来一般存款利率 7.56% 和备付金存款利率 7.02%（加权平均 7.35%）统一下调到 5.22%。经过 4 次调整后，至 2002 年 2 月准备金利率下调至 1.89%。2003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改革了准备金存款利

率制度，对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存款和超额准备金存款采取一个账户、两种利率的方式分别计息，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客观上发挥了货币市场利率下限的作用。

3. 再贷款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贷款。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贷款利率可起到向社会和商业银行宣示货币政策变动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预期。为完善中央银行利率形成机制，逐步提高中央银行引导市场利率的能力，理顺中央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资金利率关系，提高再贷款管理的科学性、有效性和透明度，200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在再贷款（再贴现）基准利率基础上，适时确定并公布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再贷款利率加点幅度，以增强中央银行根据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的能力。专项再贷款中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核定限额的部分，及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按发放日前一年的7年期国债加权平均发行利率加0.5个百分点确定，用于金融机构头寸调节和短期流动性支持的再贷款利率统一加0.63个百分点，再贴现利率加0.27个百分点。2014年，为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规范再贷款的功能定位，充分发挥中央银行流动性管理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的功能，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调整再贷款分类，将原流动性再贷款进一步细分为流动性再贷款和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金融稳定再贷款和专项政策性再贷款分类不变。流动性再贷款和2013年创新的常备借贷便利工具一起，用于向符合宏观审慎要求的金融机构按需提供流动性支持；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则包括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即原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

4. 再贴现利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折扣利率。在中央银行再贴现业务起步阶段，再贴现是在同期各档次银行贷款利率的基础上下浮动5%~10%。从1996年5月起，改为再贴现利率在相应档次的再贷款利率基础上下浮动5%~10%。1998年3月起，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再贴现利率和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规定再贴现利率作为独立的利率档次由中央银行确定，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形成。2004年3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行再贴现浮息制度。为提高货币调控效果，有效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增强对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控效力，中国人民银行于2013年年初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SLF。SLO作为公开市场常规操作的必要补充，以7天期内短期回购为主，采用市场化利率招标方式开展操作。SLF的主要功能是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SLF的最长期限为3个月，利率水平根据货币调控需要、发放方式等综合确定。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平稳适度，支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201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了MLF，作为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在2014年6月创设了PSL，即通过商业银行抵押资产从中央银行获得融资的利率来引导中期市场利率。

（二）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

我国的货币市场主要由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和票据市场组成。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构成货币市场交易的主体，其中，质押式回购占最主要部分，同业拆借利率和银行间市场质押式回购利率是中国最主要的货币市场利率。

1986 年我国明确规定允许专业银行相互拆借资金后，以各地各银行组建的融资中心等机构为依托的同业拆借市场迅速发展起来。1996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所有的同业拆借业务均通过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网络办理，从而正式组建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并形成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hibor）。金融机构通过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开展以信用为基础的短期资金借贷，其最长借贷期限一般为 4 个月，2007 年银行同业拆借最长期限延长至 1 年。2007 年 1 月 4 日，全国同业拆借中心正式推出了新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目前，公布的 Shibor 期限品种共有 8 个，分别是隔夜、1 周、2 周、1 个月、3 个月、6 个月、9 个月及 1 年。在运行之初，Shibor 报价团由 16 家银行组成，每日剔除最高、最低各两家报价。2012 年 12 月，Shibor 报价团扩大至 18 家金融机构，并每日剔除最高、最低各 4 家报价。1997 年前，我国债券市场主要分为交易所市场和银行柜台凭证式国债市场。由于建立之初交易所市场监管经验不足，市场风险较大，1997 年 6 月，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商业银行退出交易所债券市场，正式成立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机构主要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现券买卖和回购交易。回购交易又分为质押式回购和买断式回购：前者需将交易方的债券在交易期内质押冻结；后者则很大程度上具有信用交易的特征。质押式国债回购利率有 1 天、7 天、14 天、21 天、1 个月、2 个月、3 个月、4 个月、6 个月、9 个月、1 年共 11 个交易品种。2004 年 5 月开始进行买断式债券回购交易，回购利率有 1 天、7 天、14 天、21 天、1 个月、2 个月、3 个月共 7 个交易品种。

目前，银行间债券市场已经成为我国债券融资的主要渠道，而且银行间市场也是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进行间接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场所。银行间债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市场广度和深度。2013 年 12 月 8 日，人民银行发布《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并于 12 月 9 日正式实施。12 月 12—13 日，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 10 家金融机构分别发行了首批同业存单产品，此后陆续开展了二级市场交易，并初步建立了同业存单双边报价做市制度。同业存单以市场化方式定价，具有电子化、标准化、流动性强、透明度高等特点，可以为中长端 Shibor 提供更透明、市场化的报价参考，对于提高中长端 Shibor 的基准性、拓宽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融资渠道、促进规范同业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

目前，商业银行的定价机制包括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机制及风险定价机制。FTP 是商业银行根据外部定价基准和自身经营导向制定的资金价格，通过内部资金中心与业务经营单位按此价格有偿转移资金的方式，完成外部基础定价、核算业务成本与收益、调控全行资产负债规模与结构等目标的经营管理模式。目前，部分商业银行已建立并应用 FTP，其中大部分银行实行全额资金转移的 FTP 体系，部分银行仍沿用差额转移的方式。就人民币利率产品而言，在利率双轨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一般采用分别构建管制利率产品 FTP 和市场化产品 FTP 的方式实现内部转移定价，其中管制利率 FTP 采用人民银行公布的各期限基准利率作为定价基准，市场化产品 FTP 使用 Shibor、央票利率、国债利率等作为定价基准。外币 FTP 一般采取确定基础 FTP 价格和 FTP 调整项的方式，其中基础 FTP 价格使用各币种的市场收益率曲线，如伦敦同业拆借利率（Libor）、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Hibor）等，FTP 调整项则根据境内外市场之间的差异以及商业银行的管理需要设定。

风险定价就是通过实施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定价管理方法，在风险调整框架下，确定银行应该为其资产组合中包含的信用风险索价的水平。目前，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均在贷款定价中考虑了风险定价的因素，贷款价格考虑资金成本、操作成本和风险补偿三个因素。在贷款定价中，资金成本通过 FTP 定价系统加以控制，操作成本通过作业成本分析方法完成。最核心的部分就在于计算风险补偿，即在内外部评级的基础上，准确估算信用风险的概率分布及敞口，计算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而由于缺乏完整连续的历史数据，我国银行对违约概率和违约损失率的计算尚有待提高。

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国内银行纷纷加强利率定价管理的组织建设，完善利率定价管理制度，研究开发利率定价模型，建设定价支持系统，健全利率定价管理机制。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为代表的大型银行利率定价管理主要由资产负债或财务会计等综合管理部门牵头，制定了统一的利率管理办法、存贷款定价政策，管理制度比较健全，日常定价管理实行统一管理 with 分级授权相结合；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建立了以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计划财务部门为核心的利率定价管理组织体系，统一制定产品定价政策，建立了分级授权体系，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在总行利率授权范围内执行利率定价政策。2013 年 7 月人民银行放开了贷款利率管制后，为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定价机制，建立健全了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并引入了贷款基础利率（LPR）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LPR 是商业银行对其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其他贷款利率可在此基础上加减点生成，实际上为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提供了基准。

三、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及其作用

（一）市场基准利率

市场基准利率指在一国的利率体系中起基础作用、作为市场其他产品利率定价参照系的利率体系，通常由短期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当前各国主要是以报价利率为主的利率体系，如英国的 Libor 和我国的 Shibor）和中长期市场资金基准收益率曲线（主要是国债收益率曲线）共同组成一条完整的利率期限结构。通常来讲，存款利率的完全放开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完全实现。长期以来，我国缺乏一条完整的基准收益率曲线，特别是短期债券品种相对较少，期限品种不健全，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发展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利率市场化等改革的推进。一条完整的基准收益率曲线是由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和中长期基准利率共同组成，而一年期以下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收益率曲线的形状主要反映了市场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因此，作为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和其他金融产品定价的基础，以及货币政策操作重要的参考依据，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更为重要。

Shibor 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作用日趋成熟。从市场基准利率的定义来看，市场基准利率在功能上应具备如下性质：市场代表性、基准性、稳定性、无风险性、期限结构的完整性以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所谓市场代表性（或流动性、相关性）是指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应是市场参与程度高、能够代表货币市场交易的主体，与主要市场利率保持较强的相关关系。基准性是指基准利率在利率体系中居于关键地位并具有主导作用，能够有效影响其他货币市场利率。稳定性（或可控性、抗干扰性）是指在具备较强市场敏感性的同时对短期性因素的抗干扰性较强，波动不应过于频繁剧烈，这样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操作有效影响基准利率，进而实现货币政策意图。无风险性是指理论上基准利率应该具有无风险利率的特征，因为金融产品价格实际上就是考虑到各种不确定条件下对未来现金流的贴现值，也即无风险利率。期限结构的完整性是指基准利率应是一条期限完整的收益率曲线，这样才能成为各期限金融产品定价的基准。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是指基准利率能够对宏观经济变量产生影响，实现物价、产出等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市场代表性和基准性是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核心属性，是市场基准利率重要的必要条件。只有由市场主要参与者共同形成并被认可的利率才有可能成为市场公认基准，可以用来决定金融合约的现金流、进行金融产品定价并评估投资组合的绩效，且能够影响其他主要货币市场利率。其他四个性质对判断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重要性依次递减，是基准利

率核心属性的进一步延伸。

2006 年 10 月 8 日 Shibor 开始试运行并于 2007 年 1 月正式推出。从市场代表性来看，Shibor 是由信用等级较高、信息披露较充分、交易活跃的银行组成的报价团自主报出的人民币同业拆出利率计算确定的算术平均利率。报价团涵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等类型，报价行资产规模、经营模式、竞争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化保证了报价的代表性，有利于充分发现市场价格，全面反映市场流动性状况。据统计，2007 年以来 Shibor 报价行参与了 80%左右的货币市场交易。因此，Shibor 具有较强的市场代表性。与同业拆借利率、回购利率相比，Shibor 在风险性质和期限完整性等方面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同业拆借是信用交易，并非无风险交易。在 1996 年我国银行间同业市场拆借利率 Chibor 推出之初，我国曾有意将其培育成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但由于 Chibor 是根据同业拆借成交记录进行计算的加权平均利率，大多集中于 7 天以内，期限较长的交易不活跃往往没有成交记录，无法体现长端利率的变化。

（二）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作用及传导

1. 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曲线构建日趋完善。从收益率曲线的定义可以看出，市场基准利率应具备期限的完整性。但是，期限结构的完整性主要是出于资产定价和衍生品估值的考虑，需要一条描述不同期限利率水平的完整收益率曲线。然而，在现实交易中并不是所有期限都有现券交易，特别是货币市场交易大多集中在隔夜短端交易，中长端交易（三个月至一年）很少。20 世纪 80 年代 Libor 的推出主要也是为了满足衍生品定价基准问题。一年以上的中长期国债市场利率同样面临交易期限缺乏的困扰。特别是在我国，银行作为资金市场交易的主体，国债持有量占市场约 70%，其中全国性银行又占全部银行持有量约 80%，银行交易行为对国债市场交易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国债主要投资者的保险和养老金等机构，由于长期金融资产配置需要，持有国债在二级市场交易并不活跃，往往是持有到期，这直接影响了国债市场价格发现。另外，与欧美发达金融市场场外利率衍生品交易规模远高于基础资产的交易量相比，当前我国利率衍生品交易市场规模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虽然目前中国的债券市场（特别是国债交易市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广度，但市场的深度仍有待进一步深化。也正是由于市场发展深度的原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今后一项重要的改革内容。

作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提供者，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债登”）利用其数据详实丰富、与市场联系紧密等优势，从 1999 年开始率先编制和发布了人民币国债收益率曲线。中债登利用自身对债券市场每笔交易双方的信息优势，每天都对

当日有可能出现的异常交易进行监测，并将异常交易点剔除后，编制收益率曲线。在具体的曲线编制方法上，2002 年中债登实现了第一次升级，结合中国债券市场的实际情况，于 2006 年开发出全新的基于 Hermite 插值方法的债券收益率曲线构建模型。

2. 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建设和 LPR。首批自律机制成员包括工商银行等 10 家银行。自律机制下设合格审慎及综合实力评估、LPR、同业存单、Shibor 等四个专门工作小组，在建立 LPR 报价机制、发行同业存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014 年 7 月又有 93 家银行成为基础会员，这对银行利率定价能力和市场利率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促进 Shibor 和 LPR 等市场基准利率报价规则及金融产品定价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建设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为有效引导金融机构合理确定贷款利率，顺利实现 LPR 培育和完善的重要过渡，2013 年 10 月 LPR 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LPR 是商业银行对其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其他贷款利率可在此基础上加减点生成。LPR 的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是在报价行自主报出本行 LPR 的基础上，指定发布人对报价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形成报价行的 LPR 报价平均利率并对外予以公布。运行初期向社会公布 1 年期 LPR。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为 LPR 的指定发布人，首批报价行共 9 家银行。每个工作日在各报价行报出本行 LPR 的基础上，剔除最高、最低各 1 家报价后，将剩余报价作为有效报价，以各有效报价行上季度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占所有有效报价行上季度末人民币各项贷款总余额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 LPR 报价平均利率，于每个工作日通过 Shibor 网对外公布。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将按年对报价行的报价质量进行监督评估，促进提升 LPR 的基准性和公信力。

LPR 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作为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Shibor 机制在信贷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和扩充，有利于强化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促进定价基准由中央银行确定向市场决定平稳过渡；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定价效率和透明度，增强自主定价能力；有利于减少非理性定价行为，维护信贷市场公平有序的定价秩序；有利于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制度基础。

（三）市场基准利率的传导机制

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中央银行将主要以短期利率调控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利率，通过影响市场基准利率的变化影响金融产品定价和存贷款利率，进而改变投资、消费等行为，实现物价稳定和产出增长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就市场基准利率与其他市场利率的传导而言，主要是通过流动性和市场估值的变化来实现的。其他市场利率主要是根据对未来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预期和风险的判断，在基准利率体系水平上加上一一定的期限

溢价和风险溢价确定的。

基准利率的调整能够有效影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从而影响固定收益产品和股票价格。金融资产价格变化又会通过财富效应等方式影响居民的储蓄消费行为和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作用于实体经济。这样就形成了“市场基准收益率曲线—金融市场利率（债券和股票市场价格）—储蓄消费投资等实体经济”完整的利率传导链条。利率完全放开后，商业银行将根据中央银行目标利率水平，结合自身的经营情况和具体客户的信用状况，建立健全存贷款等产品定价机制，从而通过价格杠杆实现信贷资源的有效配置。

四、中央银行政策利率调控的基本路径

（一）市场化条件下的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及其调控机制的选择

中央银行政策利率通常是指隔夜水平的短端利率，这主要是因为，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的预期理论，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而利率期限结构则主要取决于市场对未来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短期利率影响长期利率，进而影响实体经济，从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我国利率期限结构的经验分析也表明，预期理论同样适用于我国。事实上，如果中央银行直接决定（盯住）长期利率，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将决定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相当于利率管制），这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可能超出中央银行的能力。从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宏观条件看，我国实施政策利率调控的环境已经基本具备。市场化利率传导环境明显改善，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引导作用逐步增强，央行着力培育的 Shibor 与主要货币市场交易利率的关联度显著上升，央行在与公众沟通和引导预期方面积累了初步经验。

在操作模式方面，目前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货币市场利率下限，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作为货币市场利率上限，一定程度已具备利率走廊功能。我国今后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模式应是，以完善的存贷款便利机制构建利率走廊制度，通过高效的公开市场操作有效开展流动性和预期管理，引导市场利率。随着贷款利率全面放开和负债类理财产品大量增加，参考利率走廊机制建立以均衡利率水平为中心的利率走廊机制。

（二）深化中央银行政策利率调控的相关配套改革

较之利率走廊等政策利率具体实施模式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制度、市场等体制环境是决定政策利率效果、减少其负面影响更为关键的因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无论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还是健全央行政策利率改善金融宏观调控，以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关键都取决于深化相关的配套改革。一是继续坚定不移地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

为增强汇率弹性创造条件。早在 200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确立了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发展目标。应该说这一目标并非当时应对外汇流入大量增加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我国作为大国开放经济这一基本特征，在转变发展方式上的根本决策。相应的，在货币政策上，也要逐步适应这一基本特征，确立以利率调控为核心的调控框架。

五、加快推进利率“双轨”合一，深化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

（一）现阶段我国利率“双轨制”的主要特点

一是存在多重基准利率。我国目前存在着三种基准利率。即中央银行公布的存贷款基准利率（5 年期以下）、银行间市场基准利率 Shibor（1 年期以下）和国债收益率（1～50 年期）。这三种利率是金融机构参照的主要基准利率，作用于金融机构不同的资金来源和运用过程中。其中，存贷款基准利率既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利率，又是商业银行开展业务活动时衡量资金成本的基准利率；贷款利率虽然放开了浮动上下限，但贷款基准利率仍然具有重要的市场影响，是借贷双方谈判利率上浮或下浮的起点。Shibor 和国债收益率目前都是在金融市场特别是银行间市场以存贷款基准利率为参照形成的二级基准利率。此外，作为银行间存款利率下限的超额准备金利率、作为上限的再贷款利率，以及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操作时履行的央票利率、正逆回购利率、SLO、SLF 利率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参照同期存款基准利率，体现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与存贷款基准利率一起构成了广义的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体系。

二是目前任何一种基准利率都是不完全的基准利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只对银行资产负债表内的传统存贷款特别是一般存款有约束力，民间有很多在企业和储蓄者之间牵线规避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办法。Shibor 只是银行间市场部分短期交易的参照，在很多情况下不等于实际交易的利率，在 3 个月以上期限的实际成交很不活跃，国债收益率则主要成为金融市场上中长期交易的有限参照。

三是以银行存款基准利率作为传递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号的工具的合理性受到挑战，操作难度加大。我国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其存款利率应由市场根据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等级来决定，本质上已经不适宜由中央银行来规定。目前，各类银行的理财收益率出现分化趋势，中小银行理财产品利率一般高于大型银行理财产品利率，显示出不同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程度不同，市场对不同银行的信用风险评估也出现了分化。

四是央行确定的存款利率机制具有一定风险。存款基准利率的国家法定性质，使它对于存款人具有某种无风险利率的错觉，而对于金融监管当局来说，则有兑现承诺的压力。在实践中，市场还要生成一个真正的无风险利率。在特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一定

的存款基准利率如果作为无风险或低风险利率可能已经太高，但作为银行在市场上吸引资金的出价可能太低。中央银行因此必须借助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外的手段来表达或实施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其他各种价格和数量工具的使用就成为更加优先的选择。

（二）现阶段我国利率“双轨制”带来的主要问题

一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利率与基于银行间交易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出现明显的“落差”。后者明显高于前者，导致货币政策的意图难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有效影响银行机构的放贷意愿。2018年以来，央行7天逆回购利率基本上明显低于银行间7天质押式回购利率，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是一个明显的套利空间。在实体经济疲软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或更热衷于一手从央行获得低廉资金、一手从货币市场套利，从而使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的效果被削弱。同时，也在信贷市场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之间出现较为明显的“落差”。货币市场利率受市场资金供求影响，而存贷款利率主要受存贷款基准利率影响，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定价。这就使得反映货币市场资金供求变化的利率难以传导到信贷市场，影响信贷市场的资金供需及价格。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存款低利率促使存款资源从银行体系以理财等形式向货币市场溢出，导致存款资源的日渐稀缺化，增加银行负债的压力与成本，压缩商业银行盈利空间。近几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各项存款的增速持续减缓，各项存款低于各项贷款的增速，二者的剪刀差不断扩大，显示银行体系负债端的压力不断增大。

二是利率“双轨制”鼓励商业银行逆向选择。尽管贷款利率已完全放开，但基准利率的“锚”依旧未变。贷款的定价仍是以央行颁布的基准利率为基础进行上下浮动，而浮动的幅度受主客观种种因素的制约，很难“挣脱”基准利率的束缚。主观上，银行不科学的考核激励机制导致“风险厌恶”及逆向选择。在银行收益与贷款风险构成的坐标系中，严厉的问责使基层经营行及客户经理为规避风险宁愿放弃高收益（收益越高风险自然越高）。只要商业银行激励约束机制所形成的逆向激励存在，只要大型国企财务软约束存在，信贷市场的“利率锚”就在那里。这就使得银行贷款的利率难以做到真正、及时地反映资金市场价格的变化而调整，难以体现货币政策导向。客观上，银行贷款利率的上浮幅度要受到来自政府“降成本”等方面的制约，而且也受到来自资金需求方的制约，特别是受大型国企等强势客户的制约。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凭借其信贷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天然”从银行获得基准等优惠利率。银行对国企的追捧客观上铸就了由大型国企构筑的“利率锚”。

三是利率“双轨制”成为阻碍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主要障碍。目前，货币市场

利率对存贷款利率的传导不畅通表现为：在存款端，存款利率隐性上限的存在制约了存款利率的自主调整空间；在贷款端，以贷款基准利率为定价锚，使贷款利率不能充分反映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化。虽然名义上存贷款利率已放开管制，但监管对存贷款利率的实质性约束依然存在，存贷款存在较大利差。为避免银行间过度竞争，在央行窗口指导下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对存款利率上浮上限有明确自律要求（存款利率红线是基准上浮 50%）；而央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七大项考核中的“定价行为”对存款利率上浮也形成明显制约。正是在上述约束下，存款利率管制上限完全放开后，并未出现竞相“提价”、轮番上调的景象，存款利率经历短期的上浮波动之后，上浮到 50%就出现除部分城商行外几乎没有银行顶格上浮。而“利率同盟”及央行 MPA 考核恰是制约存款利率上行之无形的穹顶。

（三）我国利率改革“双轨合一”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一是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加速，既催生了利率并轨的迫切性，也为利率并轨提供了有效缓冲。首先，“双轨制”将使内资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增大去“双轨制”的紧迫性。利率“双轨制”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银行的保护，使其免受负债端成本快速上升冲击，维持比较客观的利差。但是，对利率的保护特别是对存款利率上浮设定的“无形之顶”恰恰又是内资银行的短板所在。在金融加速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继续实行利率“双轨制”，无异于让内资银行自缚手脚与竞争对手搏击。因此，利率并轨的紧迫性也日益凸显。其次，对外开放的加速，势必加剧金融市场竞争，增加金融市场有效供给，从而改变信贷市场供需格局，使企业处于更有利的价格谈判地位，有利于从整体上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这实际上为完全利率市场化即利率并轨提供了催化剂，从金融服务、融资成本等方面形成对利率并轨“负向”效应的抵冲。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金融环境的逐步好转、金融体系的完善与监管体制的成熟，利率“双轨合一”的动能日益集聚，利率并轨的条件基本成熟。首先，目前已初步具备了利率并轨的制度、环境等条件。央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了市场流动性的松紧适度；逆周期因子、外汇风险准备等手段的灵活运用增强了汇率机制的韧性，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通胀总体温温和，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持续维持在控制目标以内；以金稳会为新领导的新监管体制，为熨平不同市场之间监管政策与力度的差异性创造了条件；资管新规下“去刚兑”进程加快，将提升存款人、投资人的理性化与成熟度，加之设定已久、蓄势待发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为利率并轨提供了有效的缓冲和铺垫。其次，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运用，已经为逐步缩小“落差”奠定了较

好的基础。对于银行而言，当存贷基准利率彻底跟市场利率趋同乃至不再存在后，对银行经营精细化的考验才真正到来，银行的利率定价能力、风险定价能力和风险经营能力将是生存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央行通过运用 MLF、PSL、SLF、SLO 等数量型工具，逐步提高了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努力缩小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利率与基于银行间交易的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落差”。尽管这一“落差”还存在，但正在逐步缩小。再次，资管新规及理财子公司等规制与机制的启动，将大大推进了“去刚兑”的进程，进而为缩小银行存款利率与市场利率之间的“落差”创造了条件。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银行理财将向净值化方向转型，“刚兑”将逐渐被打破。限制层层嵌套等监管要求将缩小银行资金的套利空间，推动银行表外资金回表，从而降低银行表内负债端的成本。加之 P2P 网贷风险及整治，实际上也用惨痛的教训推动着投资者渐趋理性和成熟，这也将为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存款利率的真正放开提供了一层缓冲。

（四）促进我国利率“双轨合一”的措施建议

一是解决相关政策和监管措施配套问题。首先，要解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能有机匹配问题。积极财政政策促使国家项目、国企占用过多金融资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使民企融资又短又贵又难。其次，要解决外汇储备对应的央行负债表中基础货币占比过大，真实有效基础货币投放严重不足问题。目前，经济增长靠货币创造支撑，货币乘数过高。货币乘数本身就是金融杠杆，是商业银行超创货币，是金融短期化的表现。再次，要解决货币基金占用居民的银行储蓄，促使金融空转套利、短期化和价格上升问题。第四，要解决前期监管放松，各类新生金融、准金融机构争夺资金，有限的金融资源突然多出几万家金融或准金融机构哄抢，期限越抢越短、价格（利率）越抢越高问题。

二是在当前货币政策框架下，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应进一步放宽存款利率上限，直至完全放开。基于以实体经济为本的经济特征，我国一年期利率站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分界点上，央行宜先将一年期 shibor 作为基准利率，这样就可以把央行利率意图直接传导给资本市场，大大压缩传导路途。以一年期 shibor 作为基准利率进行过渡，待整个利率体系理顺之后，再以 7 天期 shibor 为基准利率。但建议我国不宜采用欧美金融危机之前的做法——以隔夜利率为调节基准。因为金融危机之后，当发达国家开始恢复制造业时，它们更加关注长期利率，更多采取手段直接干预长期债券利率（资本价格）。

三是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让市场配置金融资源，促使信贷资源流向实体经济。解决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贷款难、融资贵问题不能简单粗暴地命令商业银行多放贷款，必须通过理顺机制，除去阻碍银行放贷意愿的根本因素。目前，表面看金融流动性巨大，

但金融流动性无法有效转化为实体经济需要的资本。我国经济尚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进入易发多发期，外部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多，需要积极稳妥和更加精准地加以应对。在流动性总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条件下，面对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必须更加重视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

四是尽快明确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利率。未来中央银行应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窗口及其他各种数量和价格手段的综合运用，在银行间市场决定某种短期利率，通过这种短期利率影响国债收益率曲线，进而影响所有市场利率，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和就业等实体经济目标。对于货币市场利率，建议放弃 LPR 定价考核，允许商业银行探索包括 Shibor、存款类机构间利率债质押的回购利率（DR）、同业存单（NCD）、存款证（CD）利率等在内的多种定价基准；发展利率衍生品市场，丰富衍生品市场交易品种，便利市场化的利率避险；同时，存款利率也要加快推进 CD 利率市场化改革。

五是做好配套机制改革。利率“双轨合一”改革的配套条件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回归正常，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要联动，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预算要硬约束，货币和财政机制的协调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 李明辉、孙莎、刘莉亚：《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的影响——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2014 年第 10 期。
2. 纪洋、徐建炜、张斌：《利率市场化的影响、风险与时机——基于利率双轨制模型的讨论》，《经济研究》2015 年第 1 期。
3. 李宏瑾：《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的挑战及应对》，《国际金融研究》2015 年第 2 期。
4. 曾智、何雅婷：《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结构对资本缓存的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16 年第 9 期。
5. 苏玥：《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对商业银行流动性创造影响的实证研究》，东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
6. 王谔达：《利率市场化与流动性创造》，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年。
7. 邓向荣、张嘉明：《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世界经济》2018 年第 4 期。
8. Saunders, A. And Schumacher, L. The determinants of bank interest rate margins: an international stud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0, 19 (6).
9. Stiroh, K. J. Diversification in banking: is noninterest income the answer.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4 (36).

责任编辑：李 蕊

中国大豆产业发展： 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建议^{*}

肖卫东 杜志雄

摘要：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而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和进口国，大豆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制约着人民日益增长的大豆及加工制品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本文着眼于新时代中国大豆产业振兴，翔实分析大豆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挖原因，提出大豆产业振兴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大豆产业 进口依存度 精深加工 科技创新 产业政策

作者简介：肖卫东，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杜志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公元前 11 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种植大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且直到 1995 年，国产大豆基本上能满足消费需求。^①而自从 18 世纪 60 年代大豆被引入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国后，中国大豆生产量及其在全球大豆总产量中的所占比重逐步下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大豆消费量、进口量及其全球占比却呈逐步上升趋势。^②美国农业部（USDA）《全球农产品供

^{*}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财政研究专项《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8CCZJ2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农业地理集聚的生产率效应及其增进路径研究——基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视角》（编号：71473153）的成果。

①黄宗智、高原：《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开放时代》2014 年第 1 期，第 176～188 页。

②王绍光：《大豆的故事——资本如何危及人类安全》，《开放时代》2013 年第 3 期，第 87～108 页。

需平衡表》2018 年 12 月预估值显示：2018—2019 年度，中国大豆生产量 1600 万吨，占全球大豆总产量（36920 万吨）的 4.33%；大豆消费量却达 10960 万吨，占全球大豆总消费量（35153 万吨）的 31.18%；大豆进口量 9000 万吨，占全球大豆总进口量（15246 万吨）的 59.03%。^①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消费国和进口国，大豆产业发展面临诸多突出问题，制约着人民日益增长的大豆及加工制品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必要翔实分析大豆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挖原因，从而破题定向，精准施策，推动大豆产业振兴发展。

一、大豆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大豆国内产量不足、进口持续增长，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

国内大豆供给主要由国内产量、进口量组成。在国内生产上，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2001—2015 年，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大豆产量呈现整体上的“双下降”态势，分别由 2001 年的 1.42 亿亩、1540.56 万吨下降到 2015 年的 0.98 亿亩、1178.50 万吨；由于国家政策提倡粮豆轮作、引导减少玉米种植面积，使得大豆种植面积、产量在 2016—2018 年连续明显增加，分别增加 0.18 亿亩、306.30 万吨。但在 2001—2017 年，大豆进口量快速持续增长，由 2001 年的 1394 万吨快速增长到 2017 年的 9553.42 万吨（见图 1），进口量与国内产量之比由 2001 年的 0.90:1 扩大到 2017 年的 6.42:1。2018 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非洲猪瘟导致肉禽消费需求下降，从而饲用蛋白需求和豆粕需求下降，以及国产大豆政策性供应明显增加等因素影响，大豆进口量自 2011 年以来首次下降，但仍达 8806 万吨。大豆进口持续增长使大豆进口依存度不断提



图 1 2001—2018 年中国大豆种植面积、产量及进口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2001—2017 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7 年），2018 年数据来自农业部和海关总署。

^①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World Agricultural Supply and Demand Estimates*, <https://www.usda.gov/oce/commodity/wasde/>.

高，大豆进口量占国内消费量^①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47.92% 上升到 2018 年的 84.73%。显然，中国大豆属于生产不足型农产品，国内需求面临巨大供给缺口，供给缺口全部由进口大豆填补，大豆需求主要通过进口满足。由此，国内产量不足、进口持续增长导致中国已基本形成进口主导的大豆供给格局。

（二）国产大豆精深加工水平低

豆制品加工包括传统豆制品加工（豆浆、腐乳、豆腐、豆干等）、新兴豆制品（包括冲调饮用蛋白制品、添加剂用蛋白制品、磷脂制品和副产物加工制品）和油脂制品加工。到目前为止，在国际市场上，以大豆为原料的加工制品已达 1.2 万种；在美国，大豆已广泛应用于食品尤其是保健食品、医药和化工等领域，仅添加大豆蛋白的食品就达 2500 种，^② 大豆精深加工程度、副产品综合利用水平高、终端产品种类丰富。在中国，国产大豆主要集中在传统豆制品和冲调饮用类大豆蛋白制品的加工上，精深加工水平低。2016 年，中国用于食品工业的国产大豆 1200 万吨。其中，直接食用（包括家庭自制豆浆等）的大豆 300 万吨，占国产大豆产量的 25%；用于传统豆制品加工的大豆 660 万吨，占比 55%；用于其他食品加工的大豆仅为 240 万吨，占比 20%。^③ 近年来，生产添加剂用类大豆蛋白制品、大豆磷脂制品和副产物加工豆制品类的企业不断增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新兴豆制品加工的品类、数量和质量等相距甚远。满足不同类型食品加工需要、能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高端大豆蛋白制品偏少，例如（半）活性蛋白粉、水解蛋白粉、大豆蛋白肽、大豆食用纤维、功能性蛋白粉等；食品级、保健级大豆磷脂制品偏少，例如大豆磷脂胶囊、磷脂片、磷脂冲剂、磷脂脂肪营养乳等。在大豆副产物加工制品方面，由于受限于研发投入不足、加工技术水平低，国产大豆在精细化工、医药、保健、美容等领域的开发应用滞后。

（三）转基因大豆可能存在的不安全性给食品安全带来一定风险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转基因大豆进口国，且进口转基因大豆只批准用于压榨，但仍有少部分流入食品领域，2016 年流入量约 200 万吨。^④ 到目前为止，全球仍没有完全公

① 由于缺乏大豆期初库存量数据，消费量为表观消费量，表观消费量=产量+进口量-出口量。

② 王薇：《高值化利用实现大豆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多重延伸》，《中国食品报》2016 年 8 月 2 日，第 004 版。

③ 吴月芳：《中国大豆食品行业状况及对食品大豆发展的建议》，《大豆科技》2016 年第 6 期，第 30～36 页。

④ 崔伟杰：《国产大豆：种植有望大增 供需尚难改变》，《粮油市场报》2017 年 1 月 12 日，第 A03 版。

开转基因物种的详细报告，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否对人体有害。所以，社会各界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一直在持续进行，时刻拨动着公众敏感的神经。关于转基因大豆的进口、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持续争论，加上近年来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引发了人们对进口转基因大豆及其压榨制品的疑虑，以及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担忧。最近一项调查表明，人们普遍认为转基因食品会危害人体健康和生态安全，72.80%的受访者不愿吃转基因食品，31.30%的受访者相信“吃了转基因食品的人会‘被转基因’”。^①

（四）国际资本控制使大豆产业安全面临较大风险

一是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来源国高度集中，贸易波动风险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是全球最主要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中国大豆进口主要来源地。2001—2011 年，中国从上述三国进口的大豆量平均占比分别为 42%、33%、23%，合计占比达 98%，^② 2018 年这一合计占比仍高达 95.40%。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来源国高度集中，在来源国气候变化、大豆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将面临较大的大豆进口贸易波动风险。

二是跨国粮商掌控进口大豆货源和采购权，大豆长期供给安全潜在风险大。跨国粮商直接投资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的大型大豆种植农场和种植园，通过合约种植模式向大量个体豆农提供贷款、种子和化肥等，间接控制大豆供应链上的种植环节，控制了全球 70%以上的大豆货源。在中国，跨国粮商通过独资或者参股的形式掌控大豆压榨企业，获得进口大豆的采购权和话语权，垄断中国大豆进口贸易。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ADM）当年收购华农集团湛江油脂厂 30%的股份时，获得了其 70%的大豆原料采购权。^③ 跨国粮商控制着中国 80%以上的大豆进口量。^④

三是跨国粮商控制大豆压榨产业，面临安全风险。中国加入 WTO 后，跨国粮商通过参股、控股、收购、新建等方式大举快速进入并整合中国大豆压榨业。外资企业大豆压榨产能、实际大豆压榨量全国占比迅速攀升，内资企业的全国占比下降。相较于 2000 年，2007 年内资企业大豆压榨产能全国占比下降 26.40 个百分点、实际大豆压榨量全国占比下降 39 个百分点，而外资企业实际大豆压榨量全国占比却由 9%快速上升到 48%。^⑤

①刘垠：《转基因认知为何“错位”》，《科技日报》2016 年 5 月 17 日，第 001 版。

②徐宏源、刘武兵：《中国大豆产业发展危机及警示》，《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 年第 10 期，第 37～39 页。

③王鹏：《“跨国粮企”的全球定价战略》，《中国经贸》2010 年第 5 期，第 64～67 页。

④王旻、王思学、闫德华：《开放战略下中国大豆产业的困境与对策》，《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191～194 页。

⑤王绍光：《大豆的故事——资本如何危及人类安全》，《开放时代》2013 年第 3 期，第 87～108 页。

二、大豆产业发展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国产大豆种植成本持续上升，种植收益低

国产大豆种植成本持续快速上升，由2001年的217.58元/亩上升到2017年的668.80元/亩，年均上升7.46%。其中，生产成本由174.87元/亩上升到417.51元/亩，年均上升5.81%；土地成本由42.71元/亩上升到251.29元/亩，年均上升11.99%。2010—2016年，国产大豆的平均种植成本为618.89元/亩，是同期美国转基因大豆平均种植成本（460.38元/亩）的1.35倍。2013年，国产大豆的种植成本（625.90元/亩）是巴西转基因大豆种植成本（400.98元/亩）的1.56倍。^① 种植成本持续快速上升的直接结果就是大豆绝对收益和比较收益偏低，导致市场竞争力弱。2001—2017年，国产大豆的平均净利润为54.94元/亩，2008年的净利润最高，为178.45元/亩；2014—2017年连续4年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从比较收益看（见表1），与玉米相比，在产值上，大豆种植明显不具有比较优势。2001—2017年，大豆亩均产值始终低于玉米，大豆年均亩产值比玉米低259.12元。在净利润上，大豆种植与玉米相差不大，大豆种植年均亩净利润仅比玉米低24.31元；但两者净利润差额的波动较大，其变异系数达-258.23%。与小麦相比，在产值上，大豆种植不具有比较优势，2001—2017年，大豆亩均产值仅在2002年和2003年两年略高于小麦，其他年份均低于小麦，年均低204.29元，两者产值差额的变异系数较大，达-78.37%。在净利润上，大豆种植与玉米基本持平，大豆年均亩净利润仅比小麦低4.64元，但两者净利润差额的波动幅度非常大，其变异系数高达-1894.96%。与水稻相比，在产值上，大豆种植劣势较为明显且呈增强趋势，大豆亩均产值一直低于水稻，其低出额由2001年的257.76元持续增长到2017年的804.83元；平均看，大豆年均亩产值比水稻低496.13元。在净利润上，大豆亩均净利润仅在2002年、2003年和2017年略高于水稻，其他年份均低于水稻，年均低146.08元，两者净利润差额的变异系数为73.40%。可见，在产值和利润上，大豆种植收益持续处于低水平，导致比较收益很低，而且大豆亩均产值与亩均净利润波动较大，很不稳定。这直接影响豆农种植积极性，最终影响大豆供给的稳定性和充足性。

^①张云华：《中美农业基础竞争力对比与建议（上）》，《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5月9日，第5版。

表 1 2001—2017 年中国大豆种植比较收益变化情况

	产值差额（元/亩）			净利润差额（元/亩）		
	大豆—玉米	大豆—小麦	大豆—水稻	大豆—玉米	大豆—小麦	大豆—水稻
2001	− 168. 04	− 72. 05	− 257. 76	− 37. 74	54. 01	− 54. 87
2002	− 73. 30	19. 04	− 144. 29	40. 99	124. 48	34. 26
2003	− 44. 03	57. 02	− 147. 58	48. 95	142. 01	14. 43
2004	− 130. 53	− 145. 39	− 359. 62	− 7. 88	− 42. 52	− 158. 03
2005	− 135. 80	− 116. 94	− 334. 00	− 14. 06	2. 13	− 111. 23
2006	− 221. 16	− 187. 09	− 385. 23	− 76. 92	− 49. 85	− 134. 53
2007	− 183. 56	− 96. 95	− 317. 33	− 25. 61	49. 91	− 53. 92
2008	− 156. 23	− 136. 62	− 374. 28	19. 23	13. 94	− 57. 17
2009	− 240. 76	− 231. 80	− 448. 61	− 67. 85	− 42. 99	− 143. 68
2010	− 285. 93	− 164. 45	− 490. 10	− 84. 54	22. 98	− 154. 67
2011	− 416. 60	− 219. 48	− 657. 53	− 141. 14	4. 03	− 249. 32
2012	− 415. 07	− 144. 90	− 634. 00	− 69. 05	107. 34	− 157. 10
2013	− 429. 98	− 242. 35	− 646. 32	− 43. 84	46. 46	− 121. 11
2014	− 504. 10	− 411. 35	− 739. 77	− 107. 55	− 113. 56	− 230. 56
2015	− 389. 92	− 442. 09	− 817. 90	19. 09	− 132. 50	− 290. 49
2016	− 297. 26	− 461. 73	− 875. 14	89. 89	− 127. 66	− 351. 77
2017	− 312. 78	− 475. 83	− 804. 83	44. 90	− 124. 79	1. 66
平均值	− 259. 12	− 204. 29	− 496. 13	− 24. 31	− 4. 64	− 146. 08
变异系数（%）	− 52. 79	− 78. 37	− 47. 21	− 258. 23	− 1894. 96	− 73. 4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2002—2018 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计算整理而得。

注：产值差额、净利润差额分别指大豆亩均产值、净利润与相比较农产品（主要是玉米、小麦、水稻）的差。产值差额、净利润差额为正，表示大豆种植收益高于相比较农产品；产值差额、净利润差额为负，则表示大豆的种植收益低于相比较农产品。

（二）国产大豆小规模分散种植、管理粗放，单产水平低

国产大豆种植以农户个体模式为主，种植分散且规模较小，自然经济特征明显。在大豆主产区，常见情况是大片玉米种植区之间或者稻田田坎上零星散落着一小片大豆种植区，全国大豆种植户的户均规模只有 1~2 亩。黑龙江省大豆种植主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分散种植，实行自耕、自种、自收的分散、传统生产方式，林口县大豆规模化

种植的比例不足10%。^① 在山东省鲁西南地区，大豆种植主体大都为分散、小规模的一般农户，济宁市任城区、梁山县的户均大豆种植面积为4.65亩，滕州市、巨野县的户均大豆种植面积仅为1.5亩。^②

大部分中国豆农认为，大豆是低产非粮食作物，无需大投入、细管理，这造成大豆种植管理粗放。一是豆农不注重大豆品种更新，品种多、杂，串种、混种、满贯品种种植现象突出。在河南省永城市，豆农连续5年不换品种的大豆种植面积占比达21.3%。^③ 二是种植方式以小麦—大豆连作为主，未合理轮作倒茬，大豆种植重茬、迎茬现象严重。在黑龙江省克山县，大豆种植重茬、迎茬面积占比高达92.40%，严重地块上的重茬、迎茬年限达20年之久。^④ 三是耕作管理粗放。大多豆农采用人工播种或者小型机械播种方法，大豆精播机推广应用滞后，播种质量差，缺苗断垄现象严重。在施肥、除草、病虫害防治等环节投入不足。

小规模分散种植、管理粗放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国产大豆产出水平偏低且远低于大豆主产国，大豆产业竞争力低下。2001—2017年，国产大豆平均单产133.10公斤/亩，最高单产为2010年的148.03公斤/亩。2006—2009年，国产大豆平均单产126.75公斤/亩，仅为同期美国（188.63公斤/亩）的67.20%、巴西（177.07公斤/亩）的71.58%、阿根廷（172.01公斤/亩）的73.69%。^⑤ 2010—2016年，国产大豆平均单产140.17公斤/亩，仅为同期美国（206.85公斤/亩）的67.76%。

（三）大豆产业科技创新不足，科技支撑乏力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大豆产业发展，财政资金支持大豆产业科技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但因财力限制和农业科研体制机制的束缚，科技创新不足、产品技术含量低、科技支撑乏力已然成为大豆产业升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1983—2007年，中国大豆技术进步率仅为2%，这使得大豆投入产出率平均下降了0.5%，大豆效益仅增加了1.6%左右。^⑥ 在大豆育种环节，基础研究与新品种培育脱节、种质创新能力低，导致突破性育种

①徐茂财：《林口县大豆生产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农业开发与装备》2017年第5期，第3~4页。

②钟文、黄新阳、赵云、周静、徐冉：《鲁西南大豆生产现状及发展对策》，《安徽农业科学》2017年第21期，第228~230、238页。

③刘坤侠：《永城市大豆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与对策》，《农业科技通讯》2014年第9期，第14~17页。

④王淑荣：《黑龙江省西部大豆重迎茬问题调查与思考》，《黑龙江农业科学》2010年第3期，第30~31页。

⑤徐宏源：《中国大豆走向何方——关于中国大豆产业发展的若干思考》，中国农业外经外贸信息网，http://www.moa.gov.cn/sydw/mczx/myyj/201504/t20150423_4542883.htm。

⑥曹茸：《中国大豆：可持续发展靠自强》，《农民日报》2009年8月22日，第001版。

技术和关键育种材料缺乏，适应不同区域栽培的高产、优质、抗病虫害、抗逆、广适性、适宜机械化、轻简化生产的主栽品种、突破性品种及技术储备不足。^① 在大豆种植环节，多数种植户以传统经验及人工栽培技术为主，栽培技术老化。机械栽培、免耕栽培、绿色生态栽培、等距穴播栽培等技术创新滞后，技术到位率和普及率低。在大豆加工环节，传统豆制品加工技术普遍落后，缺乏大豆蛋白加工领域的前沿、关键和核心技术，^② 导致大豆及加工副产物实现梯次、循环、高值利用的实现程度较低。

（四）大豆产业政策的保护作用和支持力度小，缺乏面向整个大豆产业链的系统化支持政策

近年来，中国支持、振兴大豆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日趋增强，政策含金量不断提高，但仍存在缺乏全面而又系统化支持政策、政策保护作用和支持力度小的突出问题。一是大豆关税政策与大豆产业发展的基础竞争力不相适应，未能起到应有的“门槛”保护作用 and “防火墙”作用。加入 WTO 后，中国取消关税配额管理，统一征收 3% 的低关税，且不设过渡期、没有进口数量限制、不能使用特殊保障机制，大豆市场近乎完全开放。

二是大豆种植政策效果不明显。为调控大豆市场，稳定、增加国产大豆种植面积，保护大豆种植者利益，2008—2013 年，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四省（区）实行大豆临时收储政策；2014 年开始改为启动实施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期限为 2014—2016 年。顺序实施的两项大豆种植政策在保护大豆种植者利益、增强大豆市场活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暴露出了突出问题，政策效果不明显：两项政策只在四省（区）实施，其他省（区）大豆种植者无法得到政策实惠；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标准不固定、补贴面积和产量数出多门、补贴款发放晚于国家规定，导致大豆种植者难以获得稳定的收益预期。上述两方面突出问题使得大豆种植者的积极性并没有实质性被激发，政策的引导种植作用不强。在实施大豆临时收储政策的 6 年间，大豆种植面积不仅没有稳住，反而逐年减少，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由 2008 年的 1.37 亿亩减少到 2013 年的 1.02 亿亩，四省（区）大豆种植面积由 2010 年的 0.73 亿亩减少到 2013 年的 0.50 亿亩。实行大豆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政策后，大豆种植面积持续下降的势头有所缓解，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性增长，全国大豆种植面积由 2014 年的 1.02 亿亩增长到 2016 年的 1.08 亿亩，四省（区）大豆种植面积由 0.51 亿亩增长到 0.53 亿亩，但增幅均不高。

①本刊辑：《大豆良种科技创新规划（2016—2020）》，《中国农业信息》2017 年第 2 期（上），第 18～21 页。

②潘文华、许世卫：《黑龙江省大豆产业困境与差异化发展战略》，《农业经济问题》2014 年第 2 期，第 26～33 页。

三是缺乏面向整个大豆产业链的系统化支持政策。为促进大豆产业发展，中国目前出台实施的专项政策包括种植业政策、进出口政策、转基因大豆管理及流向控制政策，主要聚焦于大豆产业链的生产、贸易环节。而在大豆的储运、加工、科技创新等环节，鲜见专门、具体的支持政策。这是一种以“保面积、保产量”为核心目标的增产导向型支持政策，以“优化结构、提质增效”为主要目标的支持政策不足，缺乏面向整个大豆产业链、增强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系统化支持政策。而且，目前的各项支持政策之间缺乏整合性、衔接性，大豆贸易与国内大豆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政策体系尚未有效建立，政策创新滞后，导致大豆产业发展缺乏整体配套的组合式政策和整体政策合力。

三、推动大豆产业振兴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从国家战略高度全面系统规划大豆产业发展

一是明确大豆产业的战略定位。在全球化与贸易保护的复杂背景下，大豆不仅是农产品，也已成为垄断经营品、金融与投机产品、国际与地缘政治产品、国家战略产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能轻言放弃大豆及其产业发展。无论从近期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看，都必须把大豆定位于攸关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资源，大豆产业定位于国家战略性产业，大豆产业振兴确定为产业兴旺的重点领域。

二是合理调整粮食统计口径，单列大豆基本自给目标。在实际工作中，中国现行粮食统计口径基本沿用 1993 年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计口径：粮食为谷物、豆类、薯类合计项。为服务于“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国家新粮食安全战略，接轨于国际粮食统计口径，适应于大豆用途变化和大豆产业振兴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应贯彻执行 2010 年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合理调整粮食统计口径，将谷物、豆类、薯类并列统计，即谷物为粮食，同时单列大豆基本自给目标。根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乡村振兴战略任务，大豆基本自给目标应包括底线自给率、安全自给率和可持续发展自给率三个层次（见图 2），每个层次自给率目标值的确定要综合考虑国内农业水土资源承载力、大豆及其制品市场需求规模、大豆产业科技创新、大豆产业政策等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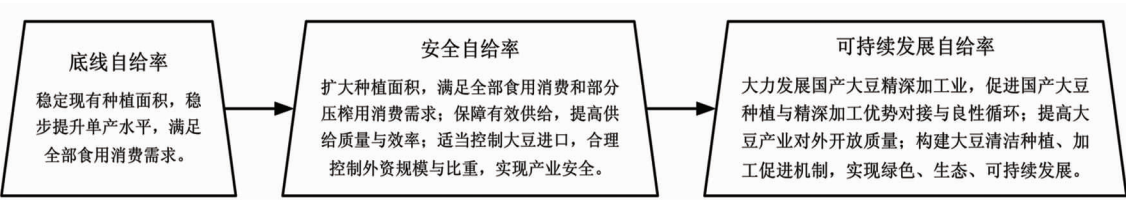


图 2 大豆基本自给目标的三个层次

三是制定实施大豆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现有关于大豆产业发展的规划，大都散见于全国农业、粮食产业、种植业、农产品加工业等总体规划和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且大都是关于大豆产业链某一个环节、某一重点方面的专项规划，缺乏面向整个大豆产业链的整体性、综合性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行动纲要。为振兴大豆产业发展，应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尽早制定、实施大豆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对大豆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关键任务、政策支持、战略举措、重点项目和工程、行动纲要等进行全面而统一的规划。

（二）优化国产大豆生产体系、区域布局 and 经营体系，增强国产大豆供给能力和效率

一是以提升生态价值、推进节本增效为重点，推广作物轮作种植模式，优化大豆生产体系。在大豆主产区着力推广以 3 年为周期的作物轮作种植模式，构建合理轮作体系，减少重茬、迎茬。支持引导农民实行“玉米—小麦—大豆”“杂粮—玉米—大豆”“玉米—杂粮—大豆”轮作模式，以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优化作物种植结构，促进用地养地相结合。支持引导豆农积极应用节本增效技术，集成应用节种、节肥、节药、节水等适用技术，提高大豆种植投入品利用效率，降本增效。

二是以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建设为重点，优化大豆生产区域布局。巩固提升东北优势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大豆种植面积和产能，稳步提高大豆散播区^①种植面积和产能。把建设好大豆生产保护区作为提高大豆自给水平的重要手段，大力实施“藏豆于地、藏豆于技”战略，加快推进东北地区、黄淮海地区大豆生产保护区具体地块的划定工作，将产豆大县作为大豆生产保护区划定的重点县，建立科学合理的区域分工体系。^②引导资金、技术、人才向大豆生产保护区集中。

三是以发挥适度规模经营的引领作用为重点，优化大豆经营体系。通过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培育壮大大豆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植企业、经营性服务组织等新型大豆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发展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型等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支持引导新型大豆经营主体建立规模化、标准化的大豆专用品种（食用大豆、油用大豆、有机大豆等）种植基地，带动专用品种区域化和差异化种植，以及专种、专收、专储、专销、专运，促进国产大豆优质

①东北优势主产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和内蒙古，主要种植春大豆；黄淮海主产区包括河北、河南、安徽和山东，主要种植夏大豆；散播区包括江苏、陕西、山西、湖北、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主要种植夏大豆。

②生延超：《适宜要素、适宜分析与后发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学刊》2017 年第 11 期，第 71～80 页。

优价。加快推进大豆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发展“家庭农场+社会化服务”的大豆经营模式。实施国产非转基因大豆保护战略和产地标识制度，鼓励地方特色国产大豆或者大豆制品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品牌。

（三）做强做优大豆精深加工业，推动产业升级、增强独特竞争优势和整体竞争力

在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营养和食品安全的今天，以及全球主要产区都转产转基因大豆的新趋势下，国产大豆及其加工制品拥有大好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中国大豆产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因此，振兴大豆产业，必须牢牢把握国产大豆的非转基因和高蛋白比较优势，实施国产大豆差异化发展战略，做大做足非转基因文章，走“食用、特用、专用”之路，做强做优大豆精深加工业，形成国产大豆与进口大豆错位竞争、相互补充的格局，推动大豆产业升级、增强独特竞争优势和整体竞争力。

一是明确国产大豆现代食品工业、新型营养健康产业的战略方向和发展定位。按照“吃干榨净”思路，做强做优国产大豆精深加工和副产品综合开发利用，促进大豆加工产业链纵向延伸、横向拓展、整体升级，形成“一粒大豆、多种产品、综合效益”的多元化产品结构。重点发展添加剂用大豆蛋白制品、终端消费类大豆磷脂制品的生产，推动大豆低聚糖、大豆皂甙、大豆异黄酮、大豆膳食纤维等食用制品的规模化生产和品牌化经营，加强国产大豆在营养健康、医药、保健、美容、精细化工等领域的规模化、高值化、梯次化、循环化应用。强化大豆产业绿色安全发展体系建设。^①

二是支持内资大豆加工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做精，增加中高端供给。整合区域大豆加工资源与能力，集中关停、淘汰一批日加工能力低、技术落后、设备陈旧、能耗豆耗高、卫生质量安全和环保不达标、经济效益差的大豆加工企业和落后产能，减少无效产能和低端产品供给。引导和推动企业强强联合、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育一批布局优、效益好、竞争力强的大型大豆加工领军企业。鼓励有特色的中小型大豆加工企业充分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加快物质装备改造升级和科技创新，构建绿色加工体系，创新现代经营模式，主动拓展发展新空间，形成大、中、小型大豆加工企业合理分工、协调发展的格局。引导支持大豆加工企业不断丰富、发展和宣扬大豆文化，用大豆文化引领科技创新和品牌培育，提升企业、产品和品牌的文化内涵和附加值；鼓励大豆加工企业在大豆种植、加工环节与农耕体验、文化教育、健康养生等领域深度融合，提高优、特、新产品比例，增加中高端供给。

^①赵丽娜、吕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与构建产业新体系》，《理论学刊》2016年第11期，第54～62页。

三是严格控制大豆油脂产能盲目扩张，避免无序竞争，优化大豆加工业区域布局。严格控制区域低水平重复、过密化建设，把产能控制在合理规模范围之内，防止产能盲目扩张带来的恶性、无序竞争与资源浪费。准确把握大豆及其加工制品市场发展趋势，加快调整优化大豆加工业的选址分布，加强区域协调，深化产销区合作，形成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有侧重、特色鲜明的区域布局。在东北、黄淮海大豆主产区，重点发展国产非转基因大豆的食品、油脂制品精深加工；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主销区，重点发展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油脂制品初级、精深加工，并鼓励大豆加工企业收购、采用国产大豆作为加工原料，发展建设一批国产大豆食品深加工基地。

（四）推进大豆产业科技创新、加强科技有效供给，提高大豆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一是面向生产和市场需求，加强非转基因大豆种质和品种创新，完善大豆技术创新体系。研发、选育目标性状突出、高产高油高蛋白、满足大豆生产转型发展、综合性状优良的突破性大豆新品种和优势大豆杂交品种，重视加工型、食用型、鲜食菜用型等优质专用新品种选育，提高统一供种率、良种覆盖率和品种优质率，以扩大国产大豆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优化产品结构和品质结构。在大豆育种方法、杂交制种、材料创制、种质资源鉴定、新基因发掘、种质创新、品种测试、良种繁育、种子加工贮藏、质量检验和控制等关键环节，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大豆种业技术创新链。

二是健全大豆栽培、管理技术创新体系。组织开展协作研发攻关，集中力量攻克技术瓶颈，集成创新高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大豆栽培和管理技术模式。在大豆主产区和保护区实施大豆栽培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项目，制定技术规程，因地制宜推广应用“垄三”、等距穴播、窄行平作以及“大垄密”“高垄平台”“深窄密”等大豆栽培技术模式，重点推广精量播种、覆膜、少免耕、秋深松整地、分层施肥等生产技术，建立病虫害综合治理技术体系，着力提高大豆单产水平。

三是加强大豆精深加工制品、技术及装备研发，健全大豆制品技术创新体系。应用生物技术、食品干燥技术等加强传统豆制品工艺创新和新品开发。加快研发改性大豆蛋白、活性蛋白粉、大豆肽粉、大豆食用纤维等新兴食品基料及关键技术。加强大豆功能因子研究，深度研发各类大豆保健食品、大豆营养强化食品及关键技术。注重大豆副产物的综合开发利用，加快研发大豆甾醇、大豆干酪素、大豆维霉素等医药类制品和大豆活性炭、大豆脱模剂、大豆脂酸、大豆干酪素等精细化工类制品。开展信息化、智能化、成套化、大型化、精密化大豆精深加工装备研制，逐步实现关键、核心精深加工装备国产化。

（五）统筹用好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断提高大豆产业对外开放质量，构建大豆新型供给格局

一是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确保大豆产业安全。其中的关键是平衡好大豆进口、外资进入与国内大豆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国产优势非转基因大豆出口、国内大豆加工企业“走出去”争取有利的国际市场准入条件。加强大豆生产保护区建设及管护、大豆加工业空间布局调整优化、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布点之间的有机衔接，增强大豆贸易、对外投资政策等与国内支豆、强豆、惠豆政策及大豆产业政策之间的衔接度和政策作用目标的一致性，提升大豆进口调控与国内大豆供需趋势之间的协调度。

二是适当控制大豆进口、外资进入节奏，建立健全大豆进口、外资金控长效机制。实施“优进”战略，调整大豆总量平衡思路，变保障“产需”两元平衡的思路为确保“生产、需求、进口”三元平衡的思路，着力确保大豆进口适度适当可靠。建立进口大豆原产地标识制度和产地预检机制，有效追溯其用途和流向，严把进口大豆质量关。严格落实转基因大豆进口和加工许可制度，加强流向检查与监管，重点严查大豆进口商和加工企业的安全控制、档案记录及标识管理等措施的落实情况，确保进口转基因大豆全部用于压榨加工，控制进口转基因大豆流向任何非压榨环节和种用市场。建立内资大豆加工企业联合采购机制，增强国际市场大豆定价话语权。健全大豆贸易、产业损害监测预警体系，探索建立损害补偿机制。完善大豆产业领域外商投资市场准入制度，实施“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减轻外资进入对大豆产业的冲击。

三是围绕“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大豆产业“走出去”，强化国际产能合作。当前，重点拓展对转基因大豆及制品消费有所限制的欧盟、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逐步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市场，努力塑造中国非转基因大豆的全球品牌形象。重点支持有条件的国内大豆种植企业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国内大型粮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大豆主产国（主要包括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战略布局大豆科技创新、种植、加工、港口码头、仓储物流等产业链关键环节，逐步建立境外大豆“产、销、加工、储运”基地，推进大豆进口渠道多元化，不断增强大豆供给能力、效率和安全。

（六）构建竞争力导向的大豆产业支持政策体系，促进大豆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是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坚持把大豆产业作为财税支持的重要领域，确保财政投入适度增加，着力优化财务投入结构，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着力提升支豆效能。全面实行“市场化收购+生产者补贴”政策，重点补保护区、适度规模经营、生产者收入和绿色生态，率先在大豆生产保护区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借鉴美国等大豆主产国的经验，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探索设立促进大豆产业发展的专项基金支

持，例如大豆产业发展基金、大豆科技创新基金、大豆种质资源专项资金、大豆产业园区和示范基地建设专项基金等。调整大豆加工企业税收政策，对加工国产大豆的企业增加补贴或者税收优惠。支持地方将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列入增值税进项税额核定扣除试点行业范围，落实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所得税优惠政策。

二是创新金融支持政策。鼓励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创新面向大豆产业发展的专项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信贷抵押物、质押物范围，在大豆生产保护区内探索开展大豆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试点，完善优化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模式与运作机制，增强信贷对大豆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支持、引导国内大豆种植企业、加工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资本运作模式，提高资本运营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完善国内大豆期货市场体系，积极开发具有能充分发挥国产大豆比较优势的大豆期货新品种，形成品种齐全、功能完善、接轨国际的大豆系列期货交易链。适时扩大大豆价格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推动大豆生产保护区内大豆保险全覆盖，健全大豆大灾风险分散机制。鼓励、支持大连商品交易所创新升级服务模式，持续创新、稳步扩大大豆“保险+期货”试点和场外期权业务。

三是加强一般服务^①支持。创新大豆生产保护区农业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支持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方式参与高标准农田、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中小型农业用水设施等项目建设运营。支持新型大豆经营主体率先实行良好生产规范、生产记录台账制度，加快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申请“三品一标”认证，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利用大数据、互联网增强消费者信任度，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追溯监管综合服务平台。建立大豆商业周转储备制度，在国家储备库之外增加新的大豆公共储备源，对收储国产大豆的大型国有控股粮油加工企业给予倾斜支持政策。

四是调整支持政策范式，实现由支持产业环节向支持产业链转变。由重点支持大豆种植环节、加工环节向支持整个大豆产业链转变。建立统筹大豆研发、种植、加工、营销贸易、仓储物流、公共储备等环节的一体化、一揽子财政补贴制度和税收优惠体系。鼓励、支持正规银行机构推广大豆产业链金融模式，促进大豆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构建多元化金融支持新路径。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积极发展大豆产业领域中的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责任编辑：李 蕊

^①2016 年经合组织（OECD）将农业政策分为三类：生产者支持、消费者支持和一般服务支持。其中，一般服务支持包括农业知识与创新系统、检验与控制、基础设施维护和发展、市场营销和推广、公共储备费用和其他。大部分一般服务支持属于 WTO 口径下的“绿箱”政策。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9年3月中旬以来，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9年4月2日在华盛顿美国商会发表讲话时表示，全球经济越来越不稳定，IMF对全球经济的预测将从2019年1月的水平下调。她警告称，多数国家将无法通过降息来抵消经济下行的影响，而是需要在未来“更明智地运用”财政政策。许多经济体的韧性不足。当下一场经济低迷不可避免地到来时，高额公共债务和低利率将导致政策行动空间有限。

2019年1月IMF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5%，2020年将增长3.6%。尽管IMF预计2019年晚些时候世界经济表现将出现起色，但拉加德表示，这一预测“不保险”，容易受到多种风险的影响，使全球经济处于“微妙”状态。“仅在两年前，全球75%的经济体经历了上升趋势。对于今年，我们预计全球70%的经济体将经历增长放缓。”IMF建议的财政政策是解决当下的赤字和债务问题，使政府有能力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减税或增加公共支出，以抗击经济衰退。

对于新兴经济体，IMF的建议是加强企业税的协调，以阻止企业将利润转移至避税天堂。据IMF估计，这类做法每年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约为2000亿美元。在美国和中国仍在就解决贸易争端进行谈判之际，拉加德重申了IMF早些时候的警告，即对美中贸易征收关税，有可能导致美国和中国的年增长率分别下降0.6%和1.5%，影响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

（二）世贸组织大幅下调 2019 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

世界贸易组织 2019 年 4 月 2 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将 2019 年全球贸易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3.7% 大幅下调至 2.6%。受贸易摩擦升级和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等因素影响，2018 年全球贸易增长 3.0%，远低于预期，而且 2019、2020 年全球贸易增长仍将面临巨大压力。

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表示，在当前贸易形势下，应该没有人会对本次下调预期感到意外。全球经济正面临诸多方面的挑战，解决眼下的贸易纠纷并保证未来贸易增长的积极态势是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世贸组织还在报告中预测，2019 年发展中经济体贸易有望保持强劲增长，出口和进口预计将分别增长 3.4% 和 3.6%；发达经济体出口和进口增速预计为 2.1% 和 1.9%。世贸组织同时表示，如果未来贸易摩擦有所缓和，2020 年全球贸易增速有望回升至 3.0%。

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指出，全球贸易和英国“脱欧”带来下行风险，如果 2019 年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汽车关税，将为全球贸易带来更坏的影响。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最坏场景出现，2019 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跌至更低，全球贸易增速可能跌至 1.3%，这是 WTO 预测区间的底部，并为英国 GDP 抹去 7.6 个百分点。

（三）博鳌论坛：三大变数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向

进入 2019 年，多个国际机构下调了对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步履蹒跚的世界经济又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金融政策、全球化进程、技术革命这些变数如何左右世界经济未来走向成了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关注焦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指出，尽管美联储近期已透露 2019 年不再升息和 2019 年 9 月份停止缩减资产负债，但美国整体货币政策仍处于利率中性的道路上，这是否意味着其货币政策未来会出现逆转、又重返宽松，而这对全球经济、资产价格、大宗商品走势、发展中国家债务等方面的影响都必须加以关注。IMF 副总裁张涛则认为，全球可能会面临一种金融政策上的收紧，若以一种急剧的方式来实现收紧的话，可能会使得全球经济增长减少 0.75%。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受阻，单边主义有所抬头。波士顿咨询全球主席博克纳说：“我们看到全球化只是现在众多变化中的一个，民粹主义、单边主义的人们缅怀过去，对全球化强烈反对，但全球化对世界发展的助推作用很大。”全球化自身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以商品交易为主的国际贸易转变为以服务和信息交易为主的国际贸易，所以各国政府要做的是让企业和人们去适应这样的变化，“而不是回到过去，抵制全球化，这样没有好处”。各国贸易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要超过确定性，而改变贸易政策可能带来紧张局势，

各方必须对此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好预案准备。

日本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铃木人司指出，技术革命是双刃剑。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是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日本失业率已低至 2.3% 到 2.5%，但未来十年，日本人口每年将减少 50 万人，意味着失业率可能进一步下降到 2%，甚至 1.5%。这在经济学上是看似很棒的失业率数字，却恰恰暴露了日本人口缩减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就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但这个度很难掌握，因为人工智能发展过头可能“反噬”劳动力市场，造成“机器取代人”的大规模失业。

（四）亚洲开发银行下调亚洲经济增长预测

亚洲开发银行 2019 年 4 月 3 日发布《2019 年亚洲发展展望》称，大部分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势头依然强劲，但随着全球需求放缓和贸易紧张局势持续，2019 年和 2020 年的增长速度将会放缓。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之下，亚行报告预计 2019 年和 2020 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长率将分别放缓至 5.7% 和 5.6%，低于 2018 年的 5.9%。除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北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外，其他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 2019、2020 年将分别达到 6.2% 和 6.1%，低于 2018 年的 6.4%。

亚洲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的消费强劲或逐步扩张，整体增长仍然稳定，削弱了出口下降的影响。然而，各类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为亚洲经济发展前景蒙上阴影。贸易摩擦依然是该地区经济前景面临的主要风险，旷日持久的谈判加剧了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其他风险则包括该地区主要经济体潜在的增长放缓以及金融波动等。

虽然下调了亚洲经济增长预期，但亚行维持了对 2019 年中国经济增长 6.3% 的预测值不变。亚行首席经济学家泽田康幸认为，尽管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但中国经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中国年初宣布的财政改革，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保改革等利好消息，将有助于缓解预期工资增速疲软的不利影响，并刺激国内消费增长。亚行预计，尽管随着家庭收入增长下滑，消费预计将有所放缓，但未来几年，消费仍将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报告认为，印度政策利率下调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将刺激国内需求增加，消费量攀升，从而有望使印度经济增长率从 2018 年的 7.0% 上升至 2019 年的 7.2% 和 2020 年的 7.3%。受此带动，南亚总体表现优于其他次区域，预计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增长率分别达到 6.8% 和 6.9%。

（五）联合国报告：全球每年产生电子垃圾资源价值 625 亿美元

联合国电子垃圾联盟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全球范围内产生的电子垃圾已多

达 4850 万吨，相当于 12.5 万架大型宽体客机的总重量，或相当于 4500 座埃菲尔铁塔的重量。换句话说，这些电子垃圾的总重量，超过了全球 100 多年来生产的所有民用飞机总重量。如此天文数字般的电子垃圾，至今只有约 20% 得到了规范回收，其余 80% 或被焚烧，或被填埋，或散落各地。而且，电子垃圾的数量还在与日俱增。预计到 2050 年，全球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总重量将增加到 1.2 亿吨。

众所周知，电子垃圾中含有丰富的可回收物资，包括贵金属、塑料、玻璃以及一些能再利用的零部件，是一笔不折不扣的巨额财富。研究认为，通常在 1 吨电路板中，可以分离出 286 磅铜、1 磅黄金、44 磅锡。1 吨智能手机中的黄金含量比 1 吨金矿石的含金量要高出 100 倍。联合国的报告指出，全球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资源价值高达 625 亿美元，相当于世界上所有银矿年总产值的 3 倍。如果将电子垃圾的价值比作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那么 625 亿美元这一数据与肯尼亚的 GDP 相仿，甚至比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GDP 还要多。电子垃圾的价值已经“富可敌国”。

更重要的是，从电子垃圾中提取金属资源，比从矿石中提取要更加节能环保。专家指出，从资源勘探、开采到运输和提炼加工，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其排放的二氧化碳要远远高于从电子垃圾中提取。另外，电子垃圾无法在自然界被生物降解，其内含的有害物质会污染土壤、空气、水资源，给人类和动植物带来危害。因此，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本身就是环境友好行为。

世界经济论坛与埃森哲战略咨询最近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概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提供解锁电子垃圾价值的工具，指出“材料互联网”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跟踪、回收并循环利用电子垃圾。该报告认为，在食品体系中建立循环经济有助于让塑料经济实现转型。一项调查结果发现，食品循环经济每年可为社会和环境带来 2.7 万亿美元的效益，同时预计到 2050 年可避免 500 万人死亡。

（六）国际能源署：未来 5 年亚洲能源需求依然强劲

国际能源署 2019 年 4 月 11 日在美国南部城市休斯敦开幕的“剑桥能源周”会议上发布石油市场展望报告，尽管全球经济出现放缓迹象，但未来 5 年亚洲能源需求依然强劲。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说，中国仍是重要能源消费国。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24 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平均每日增加 710 万桶。近年来，美国页岩油气产量不断上升，预计 2021 年美国将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国际能源署预测，未来 5 年美国新增石油产量将占全球新增石油产量的 70%，新增天然气产量将占全球新增天然气产量的 75%。

地缘政治因素正在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委内瑞拉、伊朗、利比亚等国局势是目前业界关注的重点。环保问题是重大挑战，需要引起能源企业的足够重视，

应加强科技创新投入，改善生产环节，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增加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使用。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增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国经济政策研究室主任马吉特近期表示，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发展势头较为稳定并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此次中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2019年GDP的增长设定在6%至6.5%之间，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推进国内改革持续走向深入的坚定决心与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将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具韧性与可持续性。中国政府近年来在经济领域推行的结构性改革正发挥着积极作用，改革政策更侧重于效率、稳定和包容性，中国经济也走上了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加强公平竞争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亮点，公平竞争机制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十分明显的提振效果。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有序展开，并在区域发展进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中亚与东南亚地区，加速了当地基建与贸易发展。对此，马吉特表示，她曾去过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边境，看到那里的贸易非常繁荣，这将积极促进区域间的互联互通，有效提振经济发展。同时，区域间的交通连通也带动了中欧深化双边贸易合作，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开通使中欧间的距离进一步拉近，经贸交往更趋密切。

在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时，马吉特充满信心。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国政府近年紧抓改革机遇，持续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与转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在经济金融治理、贸易与投资、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积极成就与发展模式为全球治理提供了良好范本，相信中国经济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将继续在全球发挥引领作用。

经合组织在最新公布的季度展望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增长在2019年放缓的速度将比预期更快，二十国集团（G20）国家经济增长也普遍弱于预期，这将对全球经济中期增长的韧性与可持续性造成冲击。中国凭借其庞大的经济体量、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与对世界经济的高贡献率，将继续在可预见的未来发挥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

（二）亚行预测中国经济增速2019年放缓至6.3%

亚行2019年4月3日发布《2019年亚洲发展展望》称，伴随全球增长放缓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对贸易和投资造成的压力，中国GDP增速将在2019年和2020年分别放缓至6.3%和6.1%，低于2018年的6.6%。亚行建议，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将有助于

中国经济转向消费主导模式。

亚行在报告中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风险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加剧，这将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意向。其他中国国内的下行风险还包括：政府出台的稳增长措施不足；放弃稳定地方贷款的举措；放松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以及允许非银行融资债务激增等。

亚行预计 2019 年及 2020 年，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将宽松，但政府不会采取与 2009 年类似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亚行认为，2019 年如果中国与美国能够达成协议，将减轻不利影响，并有助于重振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影子银行的持续管制，将继续制约信贷扩张；虽然该影响可能会被财政支持局部抵消，但经济增速仍将进一步放缓。

进出口方面，报告预测 2019 年中国经常账户将处于平衡状态，并在 2020 年转为轻微逆差。受 2018 年中期集中提前对美出口，加上因欧洲经济增长预期放缓，导致其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的下降，预计 2019 年中国的货物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需求增长不断放缓，预计 2019 年进口增速将出现明显下滑。2020 年，由于全球经济增长不断放缓影响出口需求，服务贸易逆差依然持续，预计经常账户将转为逆差状态。

（三）美智库称中国 AI 研究有望领跑全球

美国西雅图艾伦人工智能（AI）研究所的最新分析报告称，中国在 AI 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有助其在重要的 AI 相关技术研究方面超越美国，中国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 AI 领域的全球领跑者。

艾伦人工智能研究所的报告显示，在已发表的 AI 论文数量方面，中国已超越美国。研究人员称，尽管其中一些论文的质量差强人意，但在数量方面，50%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中国将在 2019 年超越美国；10%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中国将在 2020 年超过美国；1%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中国将于 2025 年超过美国。

华盛顿和硅谷一直担忧，中国在自动驾驶汽车、虚拟现实和第五代无线网络等关键技术领域会领先于美国，最新报告凸显了这一担忧。

研究人员指出，中国 AI 投资激增始于十多年前。2017 年，中国政府宣布计划到 2030 年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从大多数衡量标准来看，中国不仅在提交和出版的论文数量方面超越了美国，而且高影响力论文的数量也与日俱增。”

（四）美银美林：中国经济增速将在第二季度触底，需较长时间复苏

美国投资银行美银美林的最新报告预计，中国经济增速最快会在 2019 年第二季度触

底，货币宽松措施则可能延续两至三季度。美银美林中国及亚洲经济师乔虹在报告中指出，虽然中国曾在 2009 年和 2015 年迅速扭转经济下行格局，但由于 2019 年开局缓慢以及部分政策工具效用下降，中国经济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复苏。报告认为，“很可能出现的结果不是 L 型缺乏回升动力或者是 V 型反弹，而是渐进的 U 型复苏”“实体经济可能在第二季度触底，但亦有可能延至第三季度才触底”。乔虹指出，由于政策放松带来的经济效应显现缓慢，实质经济增长数据很可能进一步转弱，尤其是 2019 年第一季外贸环境更为严峻。

由于市场利率迅速下调，当前货币宽松的关键是把流动性从金融机构转移到实体经济，预计央行将放松信贷控制并推动扩张信贷。已见底的社会融资总量增长可能于第一季度后逐渐回升，金融和房地产放松措施很可能会支持房地产投资反弹，缓解经济下行风险。如果房地产投资放缓情况比预期更严重，政策层面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去推行由上而下的放松措施，使经济触底的时间延至第三季度。

（五）史蒂芬·罗奇：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唯有依靠高质量发展

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董事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S·罗奇近期撰文称，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时，生产率增长远比 GDP 增长重要。他更担心中国陷入生产率陷阱，而不是 GDP 增长陷阱。但他对此持有乐观的态度，因为根据一项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的研究显示，过去 5 年中国的基本趋势令人鼓舞，TFP 年增长率约为 3%，其中第三产业增长尤为强劲。他认为如果中国能够保持最近的 TFP 增长轨迹，并享受资本存量持续升级的好处的话，未来 5 年中国潜在 GDP 增长率可以保持在 6% 附近。

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当服务业比重超过 50% 并成为主要产业后，也是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阶段的开始，这也与中国 2012 年来的表现大体一致。因此，想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高质量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当在三方面发力。首先，要逐步摆脱信贷扩张而将过多资源投入到基建和地产的做法，因为这些低效率的部门占用太多资源，大幅提升经济成本，会对高效率部门产生挤出效应。其次，创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在教育、科技研发、基础设施等领域进行制度改革，增加投入，促进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尤其是教育和研发方面的投资能够转化为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其三，扩大服务业开放。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增长空间很大，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服务业开放程度较低，相当多领域还存在垄断。在最近几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提升了商业效率。但是，大部分服务业开放依然进展不够大。只有打破垄断，并对外开放，才能通过竞争提升效率。

责任编辑：沈家文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估计值	2019 年 预测值	2020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 年 4 月)				
世 界	3.8	3.6	3.3	3.6
发达国家	2.4	2.2	1.8	1.7
美 国	2.2	2.9	2.3	1.9
欧元区	2.4	1.8	1.3	1.5
日 本	1.9	0.8	1.0	0.5
发展中国家	4.8	4.5	4.4	4.8
印 度	7.2	7.1	7.3	7.5
俄罗斯	1.6	2.3	1.6	1.7
巴 西	1.1	1.1	2.1	2.5
世界银行(WB,2019 年 1 月)				
世 界	3.1	3.0	2.9	2.8
发达国家	2.3	2.2	2.0	1.6
发展中国家	4.3	4.2	4.2	4.5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2019 年 4 月)				
世 界	3.2	3.2	2.7	2.8
美 国	2.2	2.9	2.4	2.0
欧元区	2.5	1.8	1.1	1.3
日 本	1.9	0.8	0.6	0.5
印 度	7.2	7.1	7.2	7.3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估计值	2019 年 预测值	2020 年 预测值
世 界	5.4	3.8	3.4	3.9
进 口				
发达国家	4.3	3.3	3.0	3.2
发展中国家	7.5	5.6	4.6	5.3
出 口				
发达国家	4.4	3.1	2.7	3.1
发展中国家	7.2	4.3	4.0	4.8

注: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 年 1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7 年	2018 年 估计值	2019 年 预测值	2020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9 年 4 月)				
世界				
发达国家	1.7	2.0	1.6	2.1
发展中国家	4.3	4.8	4.9	4.7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Forecasts,2019 年 4 月)				
世 界	2.5	2.9	2.5	2.6
美 国	2.1	2.4	1.9	2.2
欧元区	1.5	1.7	1.3	1.4
日 本	0.5	1.0	0.6	1.0
印 度	3.6	3.5	3.9	4.3

注: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8 年		2.3	1.7	3.2
	3 月	2.4	1.4	2.9
	4 月	2.3	1.5	2.9
	5 月	2.3	1.9	3.2
	6 月	2.4	2.1	3.2
	7 月	2.4	2.2	3.1
	8 月	2.5	2.2	3.2
	9 月	2.4	2.0	3.3
	10 月	2.5	2.2	3.5
	11 月	2.2	2.0	3.1
	12 月	2.0	1.6	2.5
2019 年	1 月	1.9	1.4	2.6
	2 月	1.9	1.3	2.6
	3 月	2.2	1.6	3.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8 年		4.0	1.9	5.2			
	3 月	4.3	3.3	5.2	53.2	53.4	53.6
	4 月	4.3	2.6	6.3	53.4	53.8	53.7
	5 月	3.6	2.7	5.4	53.0	53.3	53.3
	6 月	3.6	2.6	4.7	52.9	53.2	52.9
	7 月	4.2	2.2	5.6	52.7	52.9	52.5
	8 月	3.6	2.4	4.8	52.5	53.2	52.4
	9 月	3.6	2.2	4.8	52.1	52.3	51.9
	10 月	3.6	2.3	5.3	52.0	51.8	51.8
	11 月	1.8	0.7	3.8	51.9	51.8	51.8
	12 月	1.8	0.1	3.4	51.4	51.9	51.1
2019 年							
	1 月	2.4	1.1	3.1	50.8	50.8	50.1
	2 月	1.8	0.9	3.0	50.6	50.6	50.0
	3 月				50.6	50.5	50.0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7 年		2.2	2.5	-0.1
	2 季度	3.0	2.9	0.0
	3 季度	2.8	2.2	-1.0
	4 季度	2.3	3.9	2.4
2018 年		2.9	2.6	1.5
	1 季度	2.2	0.5	1.5
	2 季度	4.2	3.8	2.5
	3 季度	3.4	3.5	2.6
2019 年		2.2	2.5	-0.4
	4 季度			
	1 季度	3.2	1.2	2.4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4.8	3.0	4.6
	2 季度	4.3	3.6	2.5
	3 季度	2.6	3.5	2.8
	4 季度	6.2	6.6	11.8
2018 年		5.2	4.0	4.5
	1 季度	8.0	3.6	3.0
	2 季度	6.4	9.3	-0.6
	3 季度	1.1	-4.9	9.3
2019 年		3.1	1.8	2.0
	4 季度			
	1 季度	1.5	3.7	-3.7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7 年		2.2	2.5	-0.1
	2 季度	2.1	2.5	0.1
	3 季度	2.3	2.4	-0.4
	4 季度	2.5	2.7	0.1
2018 年		2.9	2.6	1.5
	1 季度	2.6	2.4	0.7
	2 季度	2.9	2.6	1.3
	3 季度	3.0	2.9	2.2
2019 年		3.0	2.6	1.5
	4 季度			
	1 季度	3.2	2.7	1.8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4.8	3.0	4.6
	2 季度	4.7	2.7	4.6
	3 季度	4.6	2.1	4.1
	4 季度	5.7	4.7	5.4
2018 年		5.2	4.0	4.5
	1 季度	5.2	4.3	5.0
	2 季度	5.8	5.7	4.2
	3 季度	5.4	3.5	5.8
2019 年		4.6	2.3	3.4
	1 季度	3.0	2.3	1.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8 年		1.3		3.9	267.9
	3 月	0.6	1.0	4.0	18.2
	4 月			3.9	19.6
	5 月			3.8	27.0
	6 月	2.8	1.3	4.0	26.2
	7 月			3.9	17.8
	8 月			3.8	28.2
	9 月	1.8	1.2	3.7	10.8
	10 月			3.8	27.7
	11 月			3.7	19.6
	12 月	1.9	1.8	3.9	22.7
2019 年					
	1 月			4.0	31.1
	2 月			3.8	2.0
	3 月			3.8	19.6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8 年	25469		4.0	34591		4.5	-9122
	2 月	2047	1.7	2604	2.4	10.1	-557
	3 月	2092	2.2	2567	-1.4	8.6	-474
	4 月	2091	-0.1	2556	-0.4	7.3	-465
	5 月	2129	1.8	2564	0.3	7.4	-435
	6 月	2111	-0.8	2580	0.6	7.7	-469
	7 月	2090	-1.0	2604	0.9	8.8	-514
	8 月	2075	-0.7	2623	0.7	9.4	-549
	9 月	2106	1.5	2663	1.5	9.7	-557
	10 月	2107	0.0	2672	0.3	8.8	-565
	11 月	2093	-0.7	2599	-2.8	3.4	-505
	12 月	2054	-1.9	2653	2.1	3.3	-599
2019 年							
	1 月	2074	1.0	2585	-2.6	1.6	-511
	2 月	2097	1.1	2591	0.2	-0.5	-494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7 年		2773	3004	-231
	1 季度	897	1263	-366
	2 季度	856	431	425
	3 季度	646	703	-57
	4 季度	374	608	-234
2018 年		2518	-635	3154
	1 季度	572	-1232	1804
	2 季度	-21	-778	756
	3 季度	1175	805	370
	4 季度	792	570	222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7 年		2.4	1.6	1.1
	1 季度	0.7	0.4	0.2
	2 季度	0.7	0.5	0.4
	3 季度	0.7	0.5	0.5
	4 季度	0.7	0.2	0.2
2018 年		1.8	1.3	1.0
	1 季度	0.4	0.5	0.0
	2 季度	0.4	0.2	0.4
	3 季度	0.1	0.1	0.1
	4 季度	0.2	0.2	0.7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2.6	5.2	3.9
	1 季度	-0.7	1.8	0.6
	2 季度	2.2	1.0	1.2
	3 季度	-0.1	1.3	0.4
	4 季度	1.1	2.1	1.5
2018 年		3.3	3.1	3.1
	1 季度	0.2	-0.6	-0.5
	2 季度	1.6	1.1	1.1
	3 季度	0.5	0.2	1.1
	4 季度	1.3	1.2	1.1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	失业
		环比	同比	比增加(万人)	率
2018 年		0.3		8.2	1340.0
	2 月			8.5	1389.9
	3 月	-0.1	0.5	8.5	1378.9
	4 月			8.4	1366.1
	5 月			8.2	1345.1
	6 月	0.0	0.6	8.2	1339.6
	7 月			8.1	1323.9
	8 月			8.0	1312.1
	9 月	-0.1	0.2	8.0	1311.9
	10 月			8.0	1312.6
	11 月			7.9	1298.4
	12 月	0.0	0.1	7.9	1286.0
2019 年					
	1 月			7.8	1280.7
	2 月			7.8	1273.0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7 年		2.4	1.6	1.1
	1 季度	2.1	1.6	0.9
	2 季度	2.5	1.9	1.1
	3 季度	2.8	2.0	1.4
	4 季度	2.7	1.6	1.2
2018 年		1.9	1.3	1.1
	1 季度	2.4	1.7	1.1
	2 季度	2.2	1.4	1.2
	3 季度	1.6	1.0	0.8
	4 季度	1.2	1.0	1.2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2.6	5.2	3.9
	1 季度	2.7	4.9	4.2
	2 季度	3.6	4.8	4.4
	3 季度	2.8	5.7	4.1
	4 季度	2.6	6.4	3.7
2018 年		3.3	3.1	3.1
	1 季度	3.4	3.9	2.9
	2 季度	2.8	4.0	2.8
	3 季度	3.4	2.8	3.6
	4 季度	3.5	1.9	3.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进口额	增长	增长	减进
月份		(%)	(%)		(%)	(%)	口额
2018 年	22776		3.7	20842		6.6	1934
2 月	1843	-3.0	1.9	1663	-2.8	2.5	181
3 月	1870	1.5	-3.1	1666	0.2	-2.2	204
4 月	1877	0.3	8.3	1698	1.9	8.7	178
5 月	1878	0.1	-0.8	1710	0.7	1.0	168
6 月	1910	1.7	6.2	1747	2.1	9.1	164
7 月	1892	-0.9	9.4	1770	1.4	14.4	122
8 月	1927	1.8	5.5	1763	-0.4	8.8	164
9 月	1907	-1.0	-0.5	1777	0.8	7.9	130
10 月	1941	1.8	11.1	1808	1.7	15.0	133
11 月	1927	-0.7	2.3	1774	-1.9	5.5	153
12 月	1932	0.3	-1.9	1773	0.0	2.6	159
2019 年							
1 月	1948	0.8	2.5	1774	0.0	3.2	174
2 月	1921	-1.4	4.4	1726	-2.7	4.0	195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8 年		- 2729	- 2202	- 526
	2 月	227	250	- 22
	3 月	- 411	407	- 818
	4 月	1	257	- 256
	5 月	- 122	- 134	12
	6 月	333	269	63
	7 月	498	459	39
	8 月	- 414	- 478	65
	9 月	- 1107	- 1143	36
	10 月	146	336	- 189
	11 月	- 705	- 1061	356
	12 月	- 788	- 1357	569
2019 年	1 月	155	- 30	185
	2 月	74	205	- 131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7 年		1.9	1.1	0.3
	1 季度	0.9	0.6	0.3
	2 季度	0.4	1.0	- 0.1
	3 季度	0.6	- 0.8	0.3
	4 季度	0.4	0.5	0.0
2018 年		0.8	0.4	0.8
	1 季度	- 0.1	- 0.2	0.2
	2 季度	0.5	0.6	0.1
	3 季度	- 0.6	- 0.2	0.2
	4 季度	0.5	0.4	0.7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3.0	6.8	3.4
	1 季度	1.2	1.7	1.3
	2 季度	1.5	- 0.1	1.9
	3 季度	0.3	2.5	- 0.6
	4 季度	0.0	2.2	2.3
2018 年		1.1	3.1	3.3
	1 季度	0.3	0.4	0.0
	2 季度	1.3	0.4	1.3
	3 季度	- 2.2	- 1.4	- 0.7
	4 季度	1.5	0.9	2.7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 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 消费支出
2017 年		1.9	1.1	0.3
	1 季度	1.4	0.6	- 0.2
	2 季度	1.8	2.1	0.4
	3 季度	2.1	0.7	0.4
	4 季度	2.4	1.3	0.5
2018 年		0.8	0.4	0.8
	1 季度	1.3	0.3	0.5
	2 季度	1.5	0.1	0.6
	3 季度	0.1	0.6	0.6
	4 季度	0.3	0.6	1.3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7 年		3.0	6.8	3.4
	1 季度	1.8	6.6	1.3
	2 季度	3.9	6.9	4.4
	3 季度	3.3	7.0	2.7
	4 季度	3.0	6.6	5.3
2018 年		1.1	3.1	3.3
	1 季度	1.9	5.1	3.7
	2 季度	2.5	5.6	3.0
	3 季度	- 0.9	1.6	2.8
	4 季度	0.9	0.4	3.6

资料来源:日本内閣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8 年		0.6	1.61	2.4
	2 月	1.7	1.59	2.5
	3 月	2.1	1.59	2.5
	4 月	2.2	1.60	2.5
	5 月	0.8	1.61	2.3
	6 月	- 2.4	1.61	2.5
	7 月	1.8	1.62	2.5
	8 月	- 1.0	1.63	2.4
	9 月	- 0.7	1.63	2.4
	10 月	3.9	1.62	2.4
	11 月	- 1.1	1.63	2.5
	12 月	- 0.5	1.63	2.4
2019 年	1 月	1.6	1.63	2.5
	2 月		1.63	2.3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亿日元								单位:%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月份								2017 年		3.1	2.0	3.8	3.1	5.9	5.1
2018 年	814848		4.1	826911		9.7	-12063	2 季度	2.8	1.9	4.0	2.5	5.8	5.0	
3 月	65912	-2.5	2.1	65010	-8.4	-0.4	902	3 季度	3.8	1.5	3.6	3.4	6.2	5.1	
4 月	68701	4.2	7.8	63742	-2.0	6.0	4959	4 季度	2.8	1.5	3.5	3.5	5.9	5.2	
5 月	68510	-0.3	8.1	70506	10.6	14.0	-1996	2018 年	2.7	2.0	3.1	2.7	4.8	5.2	
6 月	67826	-1.0	6.7	67268	-4.6	2.5	558	1 季度	2.8	1.2	4.6	3.2	5.4	5.1	
7 月	68361	0.8	3.9	69348	3.1	14.6	-987	2 季度	2.8	2.6	3.5	3.3	4.5	5.3	
8 月	68502	0.2	6.5	70029	1.0	15.4	-1527	3 季度	2.0	2.5	2.8	2.4	4.4	5.2	
9 月	67427	-1.6	-1.4	69259	-1.1	7.1	-1833	4 季度	3.1	1.7	1.3	1.8	4.7	5.2	
10 月	70114	4.0	8.2	73843	6.6	20.0	-3729	2019 年							
11 月	67522	-3.7	0.1	71751	-2.8	12.5	-4228	1 季度	1.8						
12 月	66818	-1.0	-3.9	68739	-4.2	1.9	-1920								
2019 年															
1 月	62460	-6.5	-8.4	65320	-5.0	-0.8	-2860								
2 月	66691	6.8	-1.2	66426	1.7	-6.6	265								
3 月	66050	-1.0	-2.4	67828	2.1	1.1	-1778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8 年		28590	175788	-147198					
	2 月	1473	10492	-9019					
	3 月	5073	13112	-8039					
	4 月	-770	9965	-10735					
	5 月	7966	13456	-5490					
	6 月	2365	18887	-16522					
	7 月	3592	14899	-11307					
	8 月	-356	13329	-13685					
	9 月	5807	17588	-11781					
	10 月	428	8197	-7769					
	11 月	4223	27158	-22935					
	12 月	1277	11285	-10008					
2019 年									
	1 月	710	71847	-71137					
	2 月	2393	12899	-10506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7 年		3.0	1.8	1.3	1.0	6.7	1.6								
	1 季度	2.2	1.8	1.1	0.1	6.1	0.6								
	2 季度	3.8	1.9	1.6	0.6	6.0	2.5								
	3 季度	3.0	2.0	1.6	1.4	6.8	2.2								
	4 季度	2.9	1.6	1.4	2.2	7.7	0.9								
2018 年		1.9	1.4	0.8	1.1	7.3	2.3								
	1 季度	2.2	1.2	0.7	1.2	7.7	1.9								
	2 季度	1.7	1.4	0.1	0.9	8.0	2.2								
	3 季度	1.9	1.6	1.3	1.3	7.0	2.2								
	4 季度	1.6	1.4	1.1	1.1	6.6	2.7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7 年		3.1	2.0	3.8	3.1	5.9	5.1								
	2 季度	2.8	1.9	4.0	2.5	5.8	5.0								
	3 季度	3.8	1.5	3.6	3.4	6.2	5.1								
	4 季度	2.8	1.5	3.5	3.5	5.9	5.2								
2018 年		2.7	2.0	3.1	2.7	4.8	5.2								
	1 季度	2.8	1.2	4.6	3.2	5.4	5.1								
	2 季度	2.8	2.6	3.5	3.3	4.5	5.3								
	3 季度	2.0	2.5	2.8	2.4	4.4	5.2								
	4 季度	3.1	1.7	1.3	1.8	4.7	5.2								
2019 年															
	1 季度	1.8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8 年		5.8	4.1	27.1	12.3	4.1	4.8								
	3 月	5.8	4.2	26.7	13.1	3.4	5.0								
	4 月	5.8	4.2		12.9		4.9								
	5 月	5.8	4.2		12.7		4.7								
	6 月	6.0	4.0	27.2	12.4	3.5	4.7								
	7 月	5.8	4.0		12.3		4.7								
	8 月	6.0	4.0		12.1		4.6								
	9 月	5.9	4.1	27.5	11.9	3.5	4.5								
	10 月	5.8	4.1		11.7		4.7								
	11 月	5.6	4.0		11.6		4.8								
	12 月	5.6	4.0	27.1	11.6	6.1	4.8								
2019 年															
	1 月	5.8	3.9		12.0		4.9								
	2 月	5.8	3.9		12.4		4.9								
	3 月	5.8					4.7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 尼西亚								
2018 年		3.9	3.3	2.8	3.7	3.3									
	3 月	4.0	2.9	2.9	3.7	3.3	5.1								
	4 月	3.8	3.4	2.8	3.7	3.3									
	5 月	4.0	3.2	2.8	3.7	3.3									
	6 月	3.7	3.4	2.8	3.7	3.4	5.3								
	7 月	3.8	3.5	2.8	3.7	3.4									
	8 月	4.1	3.5	2.8	3.7	3.4									
	9 月	4.0	3.6	2.8	3.7	3.3	5.3								
	10 月	3.9	3.2	2.8	3.7	3.3									
	11 月	3.8	3.3	2.8	3.7	3.3									
	12 月	3.8	3.4	2.8	3.7	3.3									
2019 年															
	1 月	4.4	3.6	2.8	3.7	3.3									
	2 月	3.7	3.3	2.8	3.7	3.3									
	3 月	3.8	3.2	2.8	3.7										

注:(1)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4502	4704	-202	4857	6735	-1891
2 月	336.6	360.7	-15.2	383.2	529.9	-147.9
3 月	384.6	416.5	-21.8	441.6	605.6	-164.6
4 月	373.1	403.8	-21.2	395.4	556.5	-162.0
5 月	394.5	422.8	-17.7	407.0	541.9	-136.5
6 月	399.4	411.3	-1.7	422.3	556.5	-135.5
7 月	374.9	388.1	-3.2	420.3	556.9	-139.2
8 月	386.7	409.9	-12.1	403.4	535.4	-133.1
9 月	372.9	384.6	-3.1	419.9	541.5	-123.0
10 月	396.9	406.1	-0.9	431.9	605.4	-175.7
11 月	371.9	383.1	-8.1	394.6	598.5	-204.0
12 月	345.9	355.8	-9.9	334.0	506.8	-172.6
2019 年						
1 月	340.6	368.6	-28.0	371.9	593.5	-221.6
2 月				378.4	562.3	-184.0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940	931	9	2397	1887	510
3 月	82.8	75.1	7.8	200.9	144.3	56.7
4 月	73.1	71.5	1.0	198.4	144.1	54.2
5 月	81.6	77.9	2.8	192.4	138.3	54.1
6 月	82.7	73.5	8.5	202.1	149.0	53.1
7 月	80.0	83.4	-3.8	228.7	193.2	35.6
8 月	82.8	76.6	6.1	216.1	194.5	21.5
9 月	76.2	78.9	-2.6	190.6	147.1	43.6
10 月	82.8	86.9	-4.1	220.0	167.4	52.6
11 月	83.9	81.6	2.3	209.2	176.2	33.0
12 月	72.0	60.3	12.1	195.6	135.0	60.6
2019 年						
1 月	64.0	73.4	-9.5	186.1	171.3	14.8
2 月	71.1	68.2	2.9	162.9	131.9	31.0
3 月				181.2	137.2	44.0

表 33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3248	5080	-1832	4440	2491	1950
3 月	291.1	428.0	-136.9	366.3	216.4	149.9
4 月	259.1	396.3	-137.2	359.7	209.7	150.0
5 月	288.6	434.8	-146.2	364.8	213.1	151.7
6 月	277.0	443.0	-166.0	362.7	210.8	152.0
7 月	257.7	437.9	-180.2	343.9	212.2	131.7
8 月	278.4	452.4	-174.0	375.7	216.7	158.9
9 月	279.5	419.3	-139.8	386.4	198.1	189.1
10 月	269.8	441.1	-171.3	413.7	215.1	197.0
11 月	265.0	431.7	-166.7	402.9	212.5	189.8
12 月	279.3	410.1	-130.8	405.7	223.5	188.6
2019 年						
1 月	263.6	410.9	-147.3	301.4	165.0	136.5
2 月	266.7	362.6	-95.9	340.4	183.7	156.7
3 月	325.5	434.4	-108.9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6052	5350	702	4506	4766	-260
3 月	513.2	448.9	64.3	394.5	387.0	7.4
4 月	498.6	436.2	62.5	371.8	384.4	-12.6
5 月	507.0	443.7	63.3	391.8	418.3	-26.6
6 月	511.0	450.1	60.9	374.8	394.0	-19.1
7 月	518.1	449.6	68.5	367.2	396.1	-28.9
8 月	511.8	443.5	68.4	395.4	412.3	-16.9
9 月	506.5	410.1	96.4	378.1	380.0	-1.9
10 月	548.6	484.8	63.8	413.5	442.9	-29.4
11 月	514.8	468.1	46.7	385.4	409.3	-23.8
12 月	482.1	440.2	41.8	375.3	356.9	18.4
2019 年						
1 月	463.3	450.3	13.0	324.5	372.6	-48.1
2 月	394.4	364.6	29.8	363.0	350.7	12.2
3 月	471.1	418.9	52.2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5313	6030	-717	3361	2863	494
3 月	443.5	514.2	-70.8	299.9	239.7	60.1
4 月	420.8	480.6	-59.8	267.3	225.6	41.7
5 月	447.7	502.8	-55.1	291.2	246.9	44.1
6 月	433.7	502.7	-69.0	282.4	230.0	52.1
7 月	457.6	517.6	-60.0	283.6	260.5	22.8
8 月	479.4	545.9	-66.4	282.8	236.7	45.3
9 月	478.5	539.4	-60.9	296.2	252.5	43.4
10 月	489.5	546.3	-56.8	295.5	261.6	33.4
11 月	465.4	522.8	-57.4	277.8	231.1	46.5
12 月	434.7	500.3	-65.5	285.6	238.9	47.1
2019 年						
1 月				272.9	263.8	9.1
2 月				203.9	154.7	49.3
3 月				286.8	255.6	31.2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8 年	2474	2175	298	1802	1887	-85
3 月	216.4	178.8	37.6	155.9	144.6	11.2
4 月	216.8	183.3	33.5	145.4	161.6	-16.3
5 月	207.2	186.7	20.5	162.1	176.6	-14.5
6 月	196.5	181.5	15.0	129.7	112.7	17.1
7 月	212.8	192.2	20.6	162.9	183.0	-20.1
8 月	199.9	196.0	3.9	158.7	168.2	-9.4
9 月	200.4	163.6	36.8	149.2	146.1	3.1
10 月	231.7	192.5	39.2	158.9	176.7	-17.7
11 月	202.7	184.0	18.7	149.1	169.0	-20.0
12 月	200.2	174.6	25.0	143.3	153.6	-10.3
2019 年						
1 月	207.5	179.5	28.0	139.3	149.9	-10.6
2 月	163.5	136.3	27.1	125.1	122.0	3.1
3 月				140.3	134.9	5.4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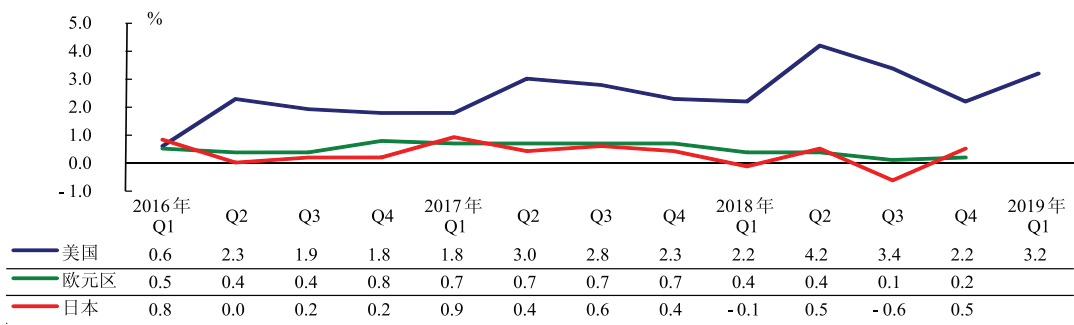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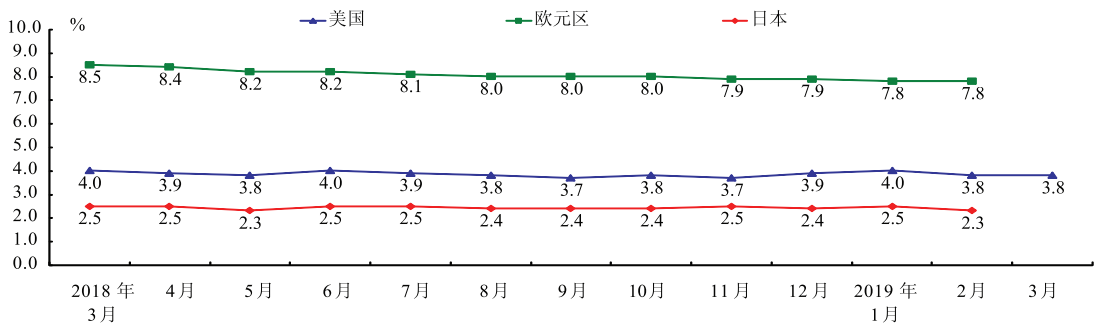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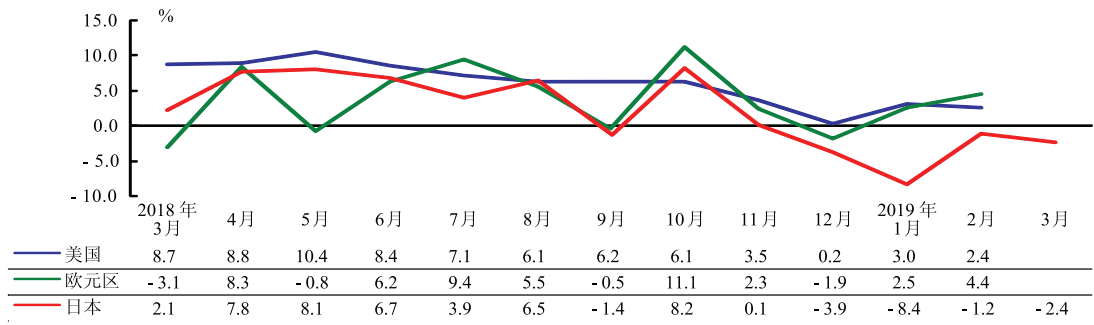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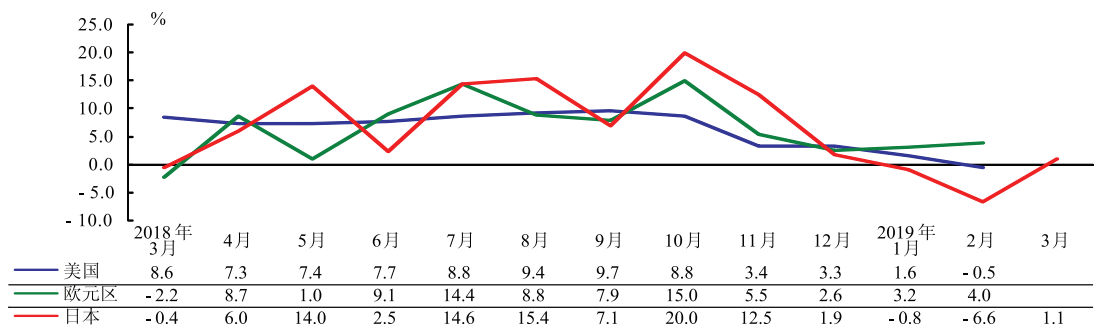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ABSTRACTS

(1)Think-tanks should provide strong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Zeng Peiyan

When the world is in an unprecedented change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an effective new path to promote the orderly,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for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 to jointly pay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further gathering the consensus of co-negotiating, co-constructing and co-sharing,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transparency of policy information, improving rules involving the planning standards and agreements, adhering to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Global think-tanks should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raising their sights, keeping their feet on the ground, eliminating the false and retaining the true.

(2)Giving play to the leading and radiating rol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n Yongwe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its development planning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s the inevitable trend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to a higher stage, and the inevitable product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a huge driving and radiating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s an important eng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shoul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and promote large urban agglomerations such as Beijing-Tianjin-Hebei, Yangtze River Delta,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to become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lead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should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the guiding plan for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ctively follow up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o form an effective system suppl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guide and promote the driving and radiating role of central citi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3)The world economy is at the historical crossroad

Chen Wenling

At present, in the world there are deep-seated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which are the common challenges facing human society, and also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affecting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world economy is at a historical crossroad which is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the past 100 years we are facing, where countries reach the era of global resonanc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 the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ing pattern, the global energy pattern,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nd pattern being undergoing profound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Looking at the current and future periods, the driving force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The biggest

variable affecting the world economic pattern is China, which will maintain the status of “anchor of stability” of the world economy for a long time.

(4) The momentum of economic recovery weakens and the future operation becomes more difficult——World Economic Review in 2018 and Prospect in 2019

Interpretation Group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8 is the tenth year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also a very unusual year when by adopting the policy combination of “tax reduction + interest rate increase + balance sheet contraction + trade protectionism”,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eatly hit the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 With the rise of anti-globalization trend, global trade, investment,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so on all show varying degrees of fatigue. In 2019, a series of U.S. policies will remain the biggest uncertainties, together with the impact of a series of negative factors, such as the high level of global debt and geopolitical conflicts, the downside risks of the world economy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and global economic growth is expected to slow down further.

(5) Evolution and trend of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opening global service market

Yang Yuying and Ren Anyu

In order to study the ideas, steps and tasks of further opening up of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n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opening up of global service marke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trade rules, analyzes the trend of opening up and development of global service industry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rules of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rules, which will accumulate sufficient realistic basis for further deepening service industry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6) Analysis on the feasibility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China’s proposal to join the CPTPP

Liu Xiangdong and Li Haodong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PP in 2017, 11 member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continued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PTPP. Some member countries expect China to join in 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open to this. Some think tanks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be ready to join as soon as possible. Some scholars are worried about the negative impact on China. In general, it is in China’s long-term interest to join CPTPP,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regulatory challenges.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i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not only deal well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motion of RCEP and the maintenance of WTO rules, maintain close communication with Japan and other member countries, but also handle we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epening reform and expanding opening-up at home. Joining the CPTPP will not be a one-step process which urgently needs clear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road maps, for example, adopting parallel strategies to promote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FTA negotiations, accelerating RCEP negotiations and WTO modernization reform, actively making room for the participation in CPTPP negotiations, striving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Japan and other member countries, and accelerating BIT or FTA negotiations with developed econom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Europe and Japan.

(7) Investigation and suggestions on Sino-US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Yan Shaojun

Increas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pillar of Trump’s strategy of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Revitalizing American infrastructure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nd many

domestic scholars have analyzed the potential and huge space of Sino-US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vit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author conducted a 23-day special exchange visit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basis of the investigation, the author forms some view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ospect of Sino-US infrastructure cooperation.

(8)Enlightenment of Dubai Healthy City Development on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u Zhenhua

Dubai’s resources are not abundant, but Dubai attracts the world’s richest people to its cities for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through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its healthy city is the industry for which Dubai always upholds the concept of luxury to expand the “world first” and creates the “Dubai model”.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Dubai Health Cit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ubai Health City, which integrates health into tourism and enjoyment, and deeply analyses the reasons why Dubai Health City supports it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cept of “high-end, luxury and enjoyment”. It points out that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can learn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Dubai Health City and Dubai Model, take high-income resilient industries and industries and services as examples to lea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ts industries, and use world resources to develop its own economy through more open policies.

(9)“Two-track integr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reform in China

Du Jinfu and Zhang Hongdi

As the price of capital, interest rate has a very important and extensive impact on the whol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two-track” integration of interest rates is the last hurdl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in China, and also the key step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speed up the process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in China, in 2019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clearly put forward that it should properly promote the “two to one track” of interest rate, and improve the formation, regulation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interest rate marketization. The purpose is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terest rate formation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market, and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entral bank in regula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market interest rate.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est rates is to change the basis of credit market price formation, remove the deposit and loan benchmark interest rates, and realize the convergence of deposit and loan interest rate pricing benchmark and money market capital pricing benchmark, that is, it is entirely determined by the market capital supply and demand.

(10)Development of China’s soybean industry: Main problems, reasons and suggestions

Xiao Weidong and Du Zhixiong

China is the home of soybeans. By World War II, China had been the world’s largest soybean producing and exporting nation. At present,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nation of soybean consumer and importer with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ybean industry restricting the people’s growing demand for soybean and processed product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s soybean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ybean industry, digs deep into the causes,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ybean industry.

Editor: Huang Yongfu